



# 香港百人上冊

一百個觸動人心的香港故事。

亞洲電視 編著



董建華  
首任香港行政長官

梁愛詩  
香港首位律政司司長

黃宏發  
港英立法局的末任主席

劉千石  
香港工運領袖

范徐麗泰  
相信香港會更好

詹培忠  
潮州怒漢

張敬儀  
不做政府的喉舌

曾鈺成  
民建聯創辦人

鄭耀棠  
「打工仔」發言人

李麗娟  
眾人契媽

何俊仁  
民主黨的領頭人

梁錦松  
銀行家出身的財政司司長

梁振英  
做大事當仁不讓

陳智思  
香港公職王

饒宗頤  
香港國學之寶

胡鴻烈、鍾期榮  
合力創辦私立大學





# 香港百人 上冊

亞洲電視 編著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胡卿旋  
□ 裝幀設計：甄璟嫻  
□ 本書部分插圖由被訪者提供

# 香港百人·上冊

---

□

編著

亞洲電視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新藝工業大廈 6 樓 G, H 座

□

版次

2012 年 6 月初版

© 201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10 mm × 170 mm)

□

ISBN：978-988-8148-19-6



亞洲電視  
www.atv.com

© 亞洲電視有限公司正式授權

# 序

香港開埠百多年，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聞名的旅遊勝地，「HONG KONG」已幾乎成為無人不曉的名字。香港的奇蹟，全靠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自強不息、努力奮鬥，締造而成。撫今追昔，鼓勵新一代港人努力創造新的輝煌。

亞洲電視新聞部的大型重頭節目「香港百人」，是一個一百多集的巨製，由新聞部採編人員，深入浩瀚的香港歷史和當今社會，選取了超過一百位對香港有貢獻的人物，以每集半小時、一人一個故事的紀錄片形式，重點介紹他們不平凡的經歷。

「香港百人」，他們來自不同階層、從事不同的行業，但皆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其中有個人奮鬥的成功歷程，亦有對社會無私的奉獻，更包括感人至深的勵志故事。「香港百人」描繪了一個個觸動心靈的香港故事，正是從歷史的縱深、社會的橫切面，交織出一幅香港百年的畫卷。

亞視新聞部除了為觀眾提供深入明快的新聞資訊，亦製作高質素的資訊節目，並屢獲國際獎項。今次傾力製作「香港百人」，自推出以來備受好評，觀眾反應熱烈。根據亞洲電視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推算全港有超過一百一十五萬人收看，欣賞指數高達七十分以上，節目獲得本港市民大眾的良好口碑。

現經中華書局將節目內容編輯成書出版，相信能夠成為一本瞭解香港歷史、香港精神、香港人物的另類教科書。

# 香港百人

上冊

## 第一部分：政治界

002 首位華人大律師 伍廷芳

008 辛亥革命的滄海遺珠 楊衢雲

012 跨代政壇元老 鍾士元

016 貼著左派標籤的校長 吳康民

020 與人民一起工作 鍾逸傑

026 站在運動前頭的強人 司徒華

030 愛國的領帶大王 曾憲梓

036 新界官民之間的橋樑 劉皇發

042 香港首位女衛生福利司 黃錢其濂

046 首任香港行政長官 董建華

052 香港首位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

056 港英立法局的末任主席 黃宏發



060 香港工運領袖 劉千石

064 相信香港會更好 范徐麗泰

070 潮州怒漢 詹培忠

074 不做政府的喉舌 張敏儀

080 民建聯創辦人 曾鈺成

084 「打工仔」發言人 鄭耀棠

088 眾人契媽 李麗娟

092 民主黨的領頭人 何俊仁

096 銀行家出身的財政司司長 梁錦松

102 做大事當仁不讓 梁振英

108 香港公職王 陳智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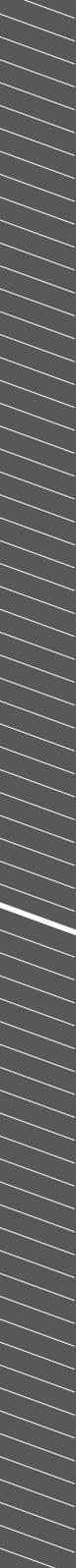
## 第二部分：學術教育界

- 116 香港國學之寶 饒宗頤
- 122 合力創辦私立大學 胡鴻烈、鍾期榮
- 128 光纖之父 高錕
- 134 第一代環保先鋒 周兆祥
- 140 從基因研究學者到港大校長 徐立之
- 146 樹博士 詹志勇
- 152 兩次成功「救校」的校長 梁紀昌
- 158 從「沙士英雄」到中大校長 沈祖堯
- 164 「女性諾貝爾獎」得主 任詠華
- 168 香港之星 陳易希、李安琪

## 第三部分：文化藝術界

- 176 九龍皇帝 曾灶財
- 180 香港樂壇教父 Uncle Ray
- 184 播音皇帝 鍾偉明
- 188 武俠大師查大俠 金庸

- 194 粵語流行曲貝多芬 顧嘉輝
- 198 唐山大兄 李小龍
- 204 拼合畫面的音樂裁縫 鄭國江
- 210 香港設計界「一哥」 靳埭強
- 216 集體回憶的紀錄者 水禾田
- 220 香港平民影后 鮑起靜
- 224 勇闖地球四極的第一個中國女性 李樂詩
- 230 香港劇壇教父 毛俊輝
- 236 名人幕後的形象軍師 張瑪莉
- 240 為音樂而生 閻惠昌
- 246 德國首席華人男高音 莫華倫
- 250 以藝術製造人生時刻 金培達
- 254 年輕的鋼琴大師 李雲迪



第一部分

# 政治界



# 伍廷芳

## 首位華人大律師



### 踏上英倫求學路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人在中環安頓好軍政機關之後，開始著手維多利亞城的建設，聖約翰座堂也是此時期所建，在 1849 年正式投入使用。英國聖公會的史丹頓牧師祝聖了聖約翰座堂後，立即投入聖保羅書院的籌建。聖保羅書院是香港最早招收華人學生的英語學校。1855 年，十三歲的伍廷芳在其信奉基督的父親安排下，入讀了聖保羅書院。

畢業後，伍廷芳成了香港首批精通英文的華人，並擔任高等法院審判庭翻譯之職。另外，根據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李國成的研究，伍廷芳曾參與創辦香港首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伍廷芳在聖保羅修讀了英文後，就在英國人創辦的《孖刺報》擔任兼職翻譯，後來為了工作也為了學習外語的關係，慢慢就參與了這份《中外新報》的創辦工作。《中外新報》本是逢星期二、四、六隨《孖刺報》附送的，後來才獨立經營。

可是，身兼兩職仍未能給伍廷芳帶來豐足的收入，留學英國似乎不太可能。直到 1864 年，他娶了當時香港首位華人牧師何福堂女兒何妙齡，得到何家的資助，才得以踏上英倫求學路，取得林肯法律學院法學博士學位。回來後，就成為前香港博物館館長丁

伍廷芳由沒官階的洋務委員做起，負責翻譯外國法律規章，後來因為輔助李鴻章進行棘手的中法談判，處理清朝水兵與日本長崎兵捕鬥毆事件，及北京蠶池口教堂搬遷事宜有功，清廷賞二品官銜。身為李鴻章的重要助手，伍廷芳不但輔助李鴻章修鐵路、辦兵工廠，也參與清朝的洋務運動，毫無保留地將在香港和英國的所學貢獻給朝廷，更於八國聯軍攻入京城時，被派出使西方多國進行交涉談判，斡旋於列強之間，維護清廷利益。



# 香港百人

004

新豹口中的吃香人材，丁新豹指出，伍廷芳未畢業就有人搶著聘請他，包括幾個中國官員。因為他讀的是法律。當時中國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後，當與其他國家談條約時，中國往往因缺乏擁有國際法律知識的談判專家而吃虧，所以伍廷芳一畢業就很受器重。

## 為港人爭取應有待遇

伍廷芳取得大律師資格，當時清朝首位駐英國大使郭嵩燾，以及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都想招攬他，但伍廷芳並沒立即接受邀請，而是回香港擔任執業大律師。不久，又做了定例局（即後來的立法局）議員。

成為議員後，伍廷芳為華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華人爭取在香港應有的待遇，向一直同情華人的總督軒尼詩提出廢除對華人的笞刑，結果他成功了，而且成為香港第一位華人太平紳士。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趙雨樂認為，當時英國政府眼見東華三院和保良局都需要華人的通力合作才做得好，所以也很樂意有這樣的華人參與港英政府的政策制定，彼此合作，從而建立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

伍廷芳在香港還有另一項重要成績，就是向政府提出創建港島電車路。伍廷芳在香港政途可謂平步青雲。可是，後來他卻在定例局的任期未完結，就決定北上京師追隨李鴻章，箇中有甚麼原因？

## 邁向中國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越來越多的華人於中上環聚居，伍廷芳收到港英政府會對舊唐樓進行收購改建的消息，於是提前入市，結果消息並沒有成真，因而導致投資損失慘重，所以希望離開香港。但亦有歷史研究指出，伍廷芳願意放棄在香港的社會地位，轉投沒落的滿清王朝，是出於愛國心。事後證明他並無選擇錯誤，他在中國外交及法律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足以名留青史。

伍廷芳是繼容闈之後，被晚清重臣李鴻章招攬入北洋幕僚中，最具堅實西學背景的廣東人。他為李鴻章做事，一做三十幾年，雖然站在歷史舞台前面的是李鴻章，但伍廷

芳實際上是他身後的出謀獻策者，清政府和西方列強簽訂的多條條約，很多談判及起草的工作都是由他經手。

據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梁美芬分析：「當時中國需要與許多國家商討外交，以及國際條約的問題，每一項條約都牽涉一塊土地、一個歷史、一場戰爭，要真正明白這些項目在國際法裡面是怎麼回事就需要借調人才。而這種專業的普通法人才在當時來說，只能到香港去找。找一位對國家有感情的，而最後挑選了伍廷芳先生，我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曾經以血腥手段鎮壓「戊戌變法」的慈禧感到政權有危機，終於下詔變法推行「新政」，伍廷芳被委任為修律大臣，對「大清律例」進行改革，他極力主張引入西方法治中的一些程序，如律師制、陪審團制等，接著他又研究民法和刑法。可見，中國的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可以確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伍廷芳加入李鴻章的系統，改革才得以實現。

## 觀渡廬老人重出江湖

1909年，六十七歲的伍廷芳對清廷的熱情逐漸退卻，歸隱上海自命「觀渡廬老人」，但辛亥革命又重燃起他的政治熱情，他回到南方追隨孫中山，在南北和談中，達成迫清室退位的協議，一做又做了十幾年，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伍廷芳服務清廷時，雖然只是官至二品，但多次出使歐洲和美洲推動外交政策，這影響了中國日後政局的發展。辛亥革命之後，伍廷芳追隨孫中山，曾經出任中華民國政府總理，兼任廣東省省長。民國建立後，伍廷芳出任過司法總長參與司法建設，協助孫中山制定法令。趙雨樂認為伍廷芳在商法的貢獻很大，除了擔任駐外公使以外，在1902年回到中國後又從事商務改革，他和沈家本等一眾法律專家，共議了中國第一部商法。對於他的功績，廣東省文史館會長張磊也不禁讚嘆：「他當司法總長，只當了兩個多月，居然可以制定和頒佈三十幾條具民主色彩的法令。」

1912年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伍廷芳又即刻隱退，袁世凱想委任他為高等顧問，但

是伍廷芳不為所動。1916年初袁世凱稱帝，伍廷芳撰文斥責洪憲帝制如同兒戲，勸進團、請願團絕不代表民意，並對袁氏派去遊說他支持帝制的使者作出請「袁某切勿置身火爐之上」的忠告，他表示要維護民主共和國制度至萬萬年。

洪憲帝制覆滅後，伍廷芳再度受邀出任外交總長，總理段祺瑞專橫跋扈，作出種種軍人干政之事，總統黎元洪在外界壓力下，解除段祺瑞的總理職務，由伍廷芳出任代理總理副署總統命令。後來，黎元洪借助張勳的力量，平息段祺瑞作亂，張勳乘機擁兵要脅，強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黎元洪懼於武力的淫威而屈服，伍廷芳拒絕副署解散國會令，帶著官印回南方隱居。

1917年張勳復辟，孫中山號召護法運動，組織臨時軍政府，由伍廷芳出任軍政府外交部長，其子伍朝樞任外交部次長輔助父親。1922年6月廣東軍閥陳炯明叛變炮擊總統府，令年事已高的伍廷芳受驚病倒。張磊補充說：「叛軍還派了一些人到他門口去，威脅他，向他喊叫，令他感到生氣。當時天氣很熱，加上他因為沒有完成任務，對孫中山懷著歉意，所以七天後老人家就過世了。」

伍朝樞在一次隨父出使美國時，留在美國受教育。回國後不久獲公派赴英倫敦大學學習法律，三年後考取第一名獲學士學位，再轉入林肯研究院深造，畢業後參加英倫敦大律師考試又獲第一名。他後來承繼了父親的使命，接任孫中山政府的外交部長一職，1924年伍朝樞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1934年1月，伍朝樞在香港病逝，國民政府將伍氏父子安葬在廣州黃花崗。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州市政府專門在越秀山劃出一塊數千尺的山地，作為伍廷芳父子的墓園，讓世人憑弔，墓誌銘更是由孫中山親手書寫。廣東省文史館研究員黃焱章覺得伍廷芳父子的墓園很特別。墓穴以麻石建成，從平面來看，像一個十字，在廣州是獨一無二的。可見，廣州市政府在保護伍廷芳墓穴方面是花了點心思的。

## 伍氏的文物珍藏

伍廷芳逝世大半個世紀之後，其後人曾捐贈價值數億元的文物予中國政府，當中有甚麼因由？他的曾外孫趙泰來是內地著名文物收藏家及嶺南畫派畫家，1976年只有二十多歲的趙泰來突然收到一份在英國倫敦的神秘遺產。據他透露，這批文物其實一直由他的姨媽、伍廷芳的外孫女鄭月娥管理，因為怕後輩年少不懂世故，愛出風頭，所以直至七十年代姨媽知道自己有病時，才透露有這批文物，專家估計這些文物價值達到八億元人民幣。趙泰來謹記家族祖訓，孫中山的名言——「天下為公」，希望學習國父胸襟，為老百姓做一點事。他耗費了十年時間，終於整理好這批埋藏了半個多世紀的遺產。由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二十年間趙泰來馬不停蹄，奔走中國各地處理文物捐贈事務。

伍廷芳是文物收藏愛好者，他在清朝末年和北洋政府都身居要職，出使歐美多年，但文物為何最終留在英國倫敦則始終是一個謎，而數以萬計的文物也很難逐一去追溯來龍去脈。

# 楊衢雲

## 辛亥革命的滄海遺珠



### 楊衢雲之死

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中國民政部表示由革命開始以來，先後有二千萬名烈士獻出寶貴的生命。辛亥革命在香港蘊釀萌芽，云云人物當中，除了國父孫中山以及教科書中提及和孫中山議事論政、人稱「四大寇」的尤列、陳少白和楊鶴齡之外，還有一名革命先烈至今仍安葬在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他叫楊衢雲，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文社組織——輔仁文社的創辦人，以及近代首個革命團體——興中總會的首任會長。他的墓沒有名字，只有簡單的一個編號「6348」，百多年來一直代表著楊衢雲。

楊衢雲的後人楊興安說：「楊衢雲被刺殺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他是一個會黨的領袖，而這裡是英國殖民地。當時，很多人來祭奠送殯，但是怕清廷認人追究，於是在送殯行列離離合合，有些更扮作路人。但是他們計算過，從派出去的吉儀數目來說，當時應該有二千多人，場面一定很震撼。」

香港電影《十月圍城》中，張學友飾演那位被槍殺的楊教授就是楊衢雲，不過真正的他並不是在輔仁文社被暗殺的。其實，結志街 52 號才是楊衢雲被清廷暗殺之處，也是他生前的居所。當時他正在等學生來補習，殺手衝上去向他開了三槍，他滿身鮮血，頭也中槍了，用絲巾包紮頭部，被送到上環國家醫院急救，翌日清早便去世了。

一百多年前，中環的嘉咸街和結志街是一班革命志士的活躍地區，於是香港便被視為「革命基地」。他們如何推翻滿清封建帝制，創建共和，奮鬥的足跡都遍佈在這裡。

## 無名烈士

已故的近代史學家唐德剛說過：「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起。」楊衢雲是近代革命先驅，比孫中山還要早搞革命，且影響更為深遠。1895年，楊衢雲和孫中山組織的興中總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清廷認定楊衢雲為主謀，所以1901年派人暗殺他。

楊興安表示不列出名字其實是有保護作用的：「因為鑑於太平天國被清廷剿滅後，清廷不但挖掘洪秀全的墳，更去他的家鄉金田村殺他的後人。若墓碑上沒名字，那隱蔽性就強很多，清廷即使派人去找，亦是困難重重。」

《無名碑》是由楊興安編寫的舞台劇，講述楊衢雲及孫中山等人的革命事蹟。香港脫離了滿清統治，是一個孕育革命的理想地方。昔日楊衢雲所住的屋子已經拆卸重建，現時樓下豎立了楊衢雲的介紹牌。不過，從附近的街道及環境，不難想像出當時中環的面貌。距離楊衢雲舊居不遠的百子里一號二樓，就是輔仁文社的社址。輔仁文社在1892年創立，比興中總會還要早。當年楊衢雲以及社員選擇了在這裡暗地談論革命，

# 香港 百人

010

百子里四通八達，實在是一個理想的開會地點。

輔仁文社聚集著一班志同道合的人，表面看是搞文學活動，其實暗地傳播革命思想。楊衢雲任社長期間，透過尤列認識了當時就讀西醫書院的孫中山，彼此多次來往建立交情，關係直到革命時才起變化。1895年，楊衢雲和友人謝纘泰，將輔仁文社和孫中山的興中會合併，成立興中總會，楊衢雲就任會長，所有輔仁文社社員都改入興中會，「革命」正式由紙上談兵轉化為行動。不過，單靠一班文人並不足夠，還要有良好的社交網絡，以籌集資金，楊衢雲、孫中山及謝纘泰等漸漸發揮作用，例如通曉英語的謝纘泰成為了英國與中國人溝通的橋樑，革命勢力也就日益坐大。

1895年楊衢雲等人策動第一次廣州起義，但因洩漏風聲而失敗。楊衢雲1901年被暗殺，孫中山亦被清廷通緝流亡海外，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即是楊衢雲死後十年，革命之士才能成功推翻滿清。不過之後就有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抗日戰爭等事件，中國又再陷入混亂局面。楊衢雲在辛亥革命的角色，亦被歷史洪流沖淡。百多年來，幾乎只剩下一座「無名墓碑」。

## 滄海遺珠

嶺南大學歷史系劉智鵬教授致力研究香港以及華南地區歷史，最近在報章撰文，簡述辛亥革命的主要人物。他形容楊衢雲是辛亥革命的「滄海遺珠」，事隔一個世紀，這段經歷後人很容易忘記，加上楊衢雲的資料不多，要研究非常有難度。劉智鵬說：「搜集楊衢雲的資料極難，因為清廷廣東政府派人暗殺他，他們家人害怕留有麻煩，於是沒有去跟進。後來政治上的需要是要將孫中山事蹟放大，將孫中山前面的人縮小，所以他的資料就更少了，很多都要憑空估計，運用邏輯來將它們貼在一起。」

楊衢雲後人楊興安趁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出版的《楊衢雲家傳》，是根據他父親楊拔凡五十多年前手寫的資料，再加以考證，希望填補歷史空白，以及糾正一些誤傳。楊拔凡是楊衢雲的堂弟，楊興安說他父親生前亦有提及楊衢雲的事蹟，表示楊衢雲獻身革命，死後好像被人遺棄般，才下決心寫《楊衢雲家傳》。

楊興安說：「父親在 1955 年已經在寫，但他不讓我們看，並很慎重地跟我們說，要待他過身後才拿出來。」

楊衢雲被暗殺，政治氣氛一度緊張。楊興安說當時很多革命黨親屬，例如謝纘泰弟弟謝纘業無故暴斃，楊氏家族都擔心家族成員安危，故楊衢雲的事蹟幾乎只是在家族中口耳相傳。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又出現國共問題，在政治陰影下，後人都三緘其口。

劉智鵬認為：「楊衢雲為人遺忘是因為國民黨要將孫中山捧為一個正統人物，而與孫中山同期的革命人士就往往受到冷漠對待，甚至在歷史上的貢獻也完全被抹煞，特別是比孫中山更早的楊衢雲等人物更加要處理得『妥當』一點，不然若演變成孫中山原來是受楊衢雲影響，革命思想才如此熾烈的話，對孫中山的形象可能有點不好的影響。」

百年過去，香港不少文人學者都期望可以讓香港人重新了解這段被遺忘的歷史。香港作家吳萱人鍾情研究香港文社運動，他認為楊衢雲創立的輔仁文社令整個香港的革命意識增加了，吳萱人說：「輔仁文社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的斷代前一部分，是開埠以來第一間文社，很值得進一步去探索。」雖然吳萱人擁有一些文社的文獻珍藏，不過楊衢雲及輔仁文社的資料和文物甚少，希望極力保存現有文物，包括楊衢雲的「無名墓碑」。楊興安透露：「這個墓碑據我所知，是由謝纘泰設計的，以『天圓地方』的概念設計，全個墓碑沒有字，但是有『青天白日』的標記，柱型斷碑的不完整感表示這個人是死於非命的。」2011 年，兩岸四地全球華人一起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率先帶領活動。

過去十年，楊興安和吳萱人一直與政府有關部門聯繫，希望將楊衢雲墓列為古蹟，令更多人了解楊衢雲以及無名墓碑背後的歷史。康文署轄下的古蹟辦 2011 年 2 月回信吳萱人，承諾最快 2011 年年中在墓旁立說明牌，令香港人重新認識辛亥革命。劉智鵬就此提出意見：「香港特區政府不應有任何政治上的考慮。事件已經過了一百年，當時怎樣發生的，應該要還歷史一個清白。楊衢雲在這裡發動革命，楊衢雲被刺身亡，之後在香港下葬，整件事都是我們值得正面去確認的。」

# 鍾士元

## 跨代政壇元老



### 香港工程師

鍾士元生於中產家庭，在香港土生土長，中學就讀於聖保羅書院，畢業後去上海讀大學，恰巧碰上日本侵華，上海被佔領。於是，他回港在香港大學修讀機械工程。

1941年香港淪陷，鍾士元逃到澳門避難，寄居女朋友張蓉馨家中。1942年，二人在江西結婚，鍾士元在內地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覺得需要取得更高學歷才有競爭力，所以再度回港進修。到了1948年，鍾士元獲取獎學金到英國深造，三年後在英國昔菲路大學取得工程博士學位。當時鍾士元認為能夠獲發獎學金到英國深造，便有責任回港工作，加上太太希望在港定居，所以他毅然拒絕英國公司的聘任，回港做回工程師。

由於他當時任職的工廠，業務發展迅速，有良好信譽，故獲得香港政府邀請擔任公職。到了1965年，鍾士元正式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七年後更被委任為行政局議員，成為當時香港政府最高決策的核心人物，亦是香港政壇中職位最高的華人。

### 九七過渡的關鍵人物

踏入八十年代，中英兩國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以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為



鍾士元爵士回歸前是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回歸後亦被委任為首屆行政會議召集人，回歸前鍾士元經常穿梭倫敦及北京，為香港前途問題奔波，幫香港人爭取利益。香港能夠順利過渡九七，鍾士元功不可沒。

首的兩局議員代表團，在 1984 年 5 月 9 日啟程前往倫敦，就香港前途問題反映意見。代表團在機場發表一份立場書，表示對香港的未來依然有很多疑慮，他們認為英國有責任確保中國在過渡期內，不插手香港的事務，同時亦要監察《基本法》的草擬工作。

鍾士元等一眾議員抵達倫敦後，與五十多名英國國會議員，包括前港督麥理浩及嘉道理勳爵會面，表達有關的問題。眼見英國即將要將這隻「會生金蛋的鵝」交還中國，但這隻「鵝」卻又要面對很多不明朗的因素，鍾士元作為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不得不周旋在中英兩國之間，為港人爭取最有利的條件。

一個多月後，鍾士元、利國偉及鄧蓮如，以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的身份訪問北京，與中央領導人商討香港的前途問題，並獲得當時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接見。當時香港前途問題相當敏感，他們在訪問完倫敦時發表的立場書中表示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依然有很多疑慮，引起中方強烈不滿，所以當天鄧小平接見他們時非常嚴肅，強調三位議員只是以個人身份訪問北京，不代表香港人的意見，情況相當尷尬。

面見完鄧小平後會見記者時，鍾士元說：「鄧主任對我們講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前途的

政策，我們就很忠實地反映了香港人就前途問題的心理及信心狀況，還有香港人的意願及焦慮。」

雖然他們事前已預料到鄧小平的態度會較為強硬，但估計不到鄧小平在會談一開始，就在記者面前立即表態，所以三名議員都十分詫異。當記者問到被鄧小平教訓一頓心情如何時，鍾士元表示自己並不是第一次給人罵，他說如果一個人做順民的話，就不會有人罵，但如果在某些大事情上堅持爭取，不怕被人罵的話，最終一定會得到朋友支持的。記者當時又問他是否以捨身的精神去達到目的，鍾士元表示從事實可以看到，如果他們有害怕的話，在倫敦回來後，便不會再去中國。

到了 1988 年，當時七十一歲的鍾士元宣佈退休，然而，他沒有真正退下來，心中仍然記掛著香港的前途問題。到了 1991 年他又獲聘為港事顧問，在回歸前更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九七過渡的關鍵人物。

## 政壇元老

踏入九七回歸，鍾士元得到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邀請加入行政會議，並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繼續服務香港。作為政壇元老，鍾士元地位舉足輕重，董建華完成五年任期後，民望下挫，但鍾士元依然「挺董」，支持董建華連任。鍾士元認為：「董先生很不幸地遇上亞洲金融風暴，而且同時香港的經濟、政治都要轉型。可惜，在過渡九七的最後那幾年的中英爭拗，沒有機會看得更長遠，來預算這些轉型的問題。董先生當時因為香港人及中國政府都希望能夠平穩過渡，故此所有事情都保持不變，全班人馬照收。即使是這樣，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大家才了解彼此的工作興趣，做到同心同力。故此若董先生做第二任，我希望他會比第一任做得好很多。」

講過只是做兩年行政會議召集人的鍾士元，在 1999 年正式宣佈退休，由梁振英接替。1999 年 6 月 15 日，董建華說出對鍾士元的看法：「回歸兩年以來，特區政府的確面臨了很多不同的挑戰，但憑他的經驗，以及政治觸覺，他為香港的平穩過渡，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鍾士元亦讚揚梁振英是合適的繼任人選，他十分欣賞梁振英的分析能力和政治智慧。

1999年6月行會休會，鍾士元出席完他最後一次的行政會議後，便功成身退。他說回歸後兩年來，最值得安慰的是香港能夠平穩過渡，又表示香港的民主已踏入發展階段，一定要給予時間和耐性，讓民主發展進入更成熟的階段。

## 高徒輩出

人稱「大 Sir」的鍾士元在政壇打滾了那麼多年，是經歷過五朝港督，還有兩位特首的元老，他在為香港前途問題奔波之際，亦不忘提携後輩，由他訓練出來，在政壇具有影響力的人多不勝數，當中有些已成為政府高官，有些是前立法局議員，到現在更過渡成為立法會議員。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李麗娟是鍾士元的愛徒之一，政務主任出身的她與鍾士元特別有緣，期間有不少合作機會，久而久之，她在鍾士元身上學到了怎樣從政，以及凡事都要看遠一點。

鍾士元除了在政壇擁有崇高的地位，他亦是一位傑出的專業工程師，曾在六十年代擔任工程師學會會長，之後更將學會引領到法定組織的道路。

另一個深受鍾士元影響的高徒，就是工程界立法會議員何鍾泰。他們兩人在七十年代的工程師學會相識，何鍾泰指出鍾士元在學術方面貢獻非常大，對很多的大學來說，他是開山鼻祖。「大 Sir」目光深遠，各方面都很看重他的投入參與，以及他提出的意見。

擁有五個名譽博士學位及多個名譽院士銜頭的鍾士元，學歷很高，所以十分重視本港的高等教育。過去幾十年來在他領導下，香港籌建了三間專上學府，即是現在的理工大學、城市大學和科技大學，並曾經擔任這三間大學的管治委員會創校主席，令不少學生受惠。

鍾士元花上畢生精力積極貢獻香港，為港人謀福祉。除了在港英時代獲封爵外，回歸後亦獲頒特區政府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 吳康民

## 貼著左派標籤的校長



### 少年時期

1926年，吳康民在廣東惠來縣一條鄉村出生。少年時期經歷戰亂，一直流離失所，深感民族苦難之痛，他說這對日後確立自己的政治信仰和人生抉擇，起了很大作用。八十六歲的吳康民，憶起戰時的遭遇，仍然歷歷在目。吳康民讀中學時，因為打仗，警報一響就要躲進地下室逃避敵軍轟炸，上課不得安穩。他說：「民族苦難我們經歷過很多，那時在鄉下，常見官僚欺負平民百姓，官僚大魚大肉，平民就連烤蕃薯也吃不上。十一、二歲時，我開始參加劇團宣傳抗日，去鄉下寫標語、發傳單，介紹抗日戰爭的必要性。上大學時，又參加過反飢餓反內戰的大遊行，尤其是1946、1947年時，更是參加這些活動的高峰期。」

他十六歲剛考入廣州國立中山大學，還沒有享受到多采多姿的校園生活，便又遇上湘桂大撤退，當時日軍即將從長沙打到廣東，大學全體教職員要疏散到梅縣一帶，即使是年紀較大的教授，亦要和一眾年輕人連夜趕路，一直前進。吳康民回憶道：「當時很艱苦，11月的粵北很冷，我們這班十六、七歲的年輕人，背著棉被和教科書，一直往前走。夜深了，便在中途鋪開棉被，穿著衣服蹲在那裡睡，醒來又繼續前進。」



卸下做了七屆的全國人大代表之職，離開了奮鬥大半輩子的校長生涯，吳康民又再成為傳媒焦點，是因為 2011 年 4 月與總理溫家寶的一次見面，他們倆單獨談了一個多小時，並共晉午餐。吳康民表示和溫總理的交談只屬朋友式的溝通，沒有特殊的政治意義。

## 以港為家

雖然吳康民大學畢業時滿腔熱誠，但命運的安排卻令他有點意外。1947 年，他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畢業，本來是讀化學工程，一心準備投身工業建設國家，但因為當時認同中共政權的香港培僑中學正尋覓大學生擔任教師，從此他便踏上教育之路。吳康民記得當時很多來自內地的移民，都來培僑接受教育。當時要在香港大學裡找畢業生來就職是很困難的，大學生都是天子門生，都要去做官，前景很好，所以要找大學畢業資格的老師很困難。一開始，他內心也有動搖，因為 1949 年解放後，國家要從國民黨手裡接收很多工廠，國家缺乏技術員，很多同學打電話叫他回去。但是學校的領導就說人人都回去，學校難以維持，所以勸他留下。結果一留就是六十多年。

一個甲子過去了，吳康民說沒有後悔以香港為家的抉擇，但坦言這個選擇令他與同期同學走上了一條很不同的人生道路。

吳康民說：「新中國一成立，我們看到一片光明燦爛的好景，想不到之後會一直鬥下去，特別是知識份子經常都是鬥爭的對象。後來發生的一連串政治運動，我並沒有參

與其中。然而，我既不覺得這是一個幸運，又不覺得這是一個損失，只知道我在香港已經站穩腳了。」

## 教育六十載

1958年，吳康民擔任培僑中學的校長，不單需要處理教務，而且要應付港英政府，因為當時的政府對有政治立場的學校很敏感，因此吳康民說日子過得並不輕鬆：「當時警察局政治部的特務，差不多每天都跟著我，每天都派兩個人跟著我。跟著我的目的，便是警告我不要亂來，也盡量不要和其他人來往，一來往可能就害死對方。所以老實講，我一方面覺得生活受到拘束，完全沒有隱私，但另一方面也覺得是一種光榮，因為我是多麼的重要，值得花這麼多人力來跟蹤。我視此為一種鍛煉，鍛煉自己碰到困難和問題時，能夠臨危不亂。」

新知舊友，五百多名培僑中學校友，有些已經散居海外，一天為了為老校長祝壽，也為了祝賀他榮獲教育學院榮譽院士，大家又聚首一堂。聚會中吳康民兒子作出一段發言，對父親的功勞作出肯定：「這個榮譽頒予他，是獎勵他沒有功勞都有苦勞，其實他說功勞他不敢當，他不敢當，我代表他當吧。因為我爸爸數十年來教育了那麼多英才，培育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包括在座的多位校友。難道這些不是功勞嗎？作為學生，作為校友，作為他的子女，我覺得這是他的功勞，而且是實至名歸的。爸爸我以為你為榮。」

雖然無心插柳從事教育工作，一晃六十多年，吳康民說這一刻真正體會「桃李滿天下」，他感慨地說：「回首這六十多年，我無愧無悔。我現在覺得最欣慰的，就是我教育出來的過萬名學生，現在都很尊敬我。現在我基本上半退休，除了社會活動，學校的事情都不用我去管理，現在很多校友不單請我吃飯，而且很關心我，這種校友比自己子弟更親。這種滿足感，我覺得不是這一行的人，是很難想像的。我們做了幾十年，教了這些多學生，今天他們都事業有成回來學校探望，請吃飯也好、聊天也好、請你去度假也好，我都有很大的滿足感。」

## 左派標籤

在被視為左派的學校任職，亦長期擔任全國人大代表這些公職，吳康民因而被外界稱為「左派」的代表人物，他自己又如何看待這個標籤呢？

吳康民說：「如果用思想來劃分，我覺得『左派』這個詞並沒有惡意，自始至終我們都是愛中國，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左派』未必有太多的貶義，有些人說你是開明左派，即是說有一些左派比較頑固，而有一些左派則比較開明，這些我覺得沒有所謂，怎樣說都可以。不過，我覺得我們幾十年來都沒有變過，既是左派又比較開明，並不是上頭說甚麼就跟著說甚麼，我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無論吳康民如何看待這個說法，他一直以來與北京聯繫密切，早年已經參與內地的社會政治活動。1975年開始出任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親身經歷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後內地政治氣候的大轉變。吳康民表示：「這個變化很大，因為我做第四屆人大時四人幫都還在台上，去開會都只是有些人在講門面話，我執著的不講門面話，沒有發過言。那時，整天都在高呼萬歲，有一次江青來接見我們，在那裡歡呼，我就不理睬。我也不能夠反對她，因為當時的氣氛就是這樣。1975年來說，進去人民大會堂議政，就是去做舉手機器。人們說你是橡皮圖章，就真是橡皮圖章。後來，第五屆、第六屆開始好一些，接著逐漸進步，而進步得比較明顯的是法治，即是我們每年都制定很多法律，使國內的法律基本上完備。那現在問題在哪裡？問題就是有法不依，有些地方幹部就不理法律，置法律於度外，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有些人知法犯法，這個還要慢慢糾正。」

2007年3月的北京，與往年一樣乍暖還寒，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最後一次會議，人民大會堂響起國歌。對吳康民來說一切都那樣熟悉，但又總感到有些不同，因為經歷了七屆，他的全國人大代表生涯，將在這一個春天畫上句號。

退下政壇，吳康民並沒有停下來，反而享受自己的另一個身份。他現在以寫作為樂，希望別人當他是一位作家，一位評論家，以寫文章為生。

# 鍾逸傑

## 與人民一起工作



### 踏上香港政途

鍾逸傑生於英國一個工匠家庭，十七歲就在船務公司當學徒，四年間周遊印度及泰國等國家，亞洲文化令他大開眼界。完成學業之後，二十七歲的鍾逸傑決定到亞洲工作，首先是到馬來西亞的英國殖民地當地方官。鍾逸傑在 1954 年元旦日，抵達了吉隆坡，度過了幾年，學得一口福建話，然後到馬六甲擔任理民官。

馬來西亞獨立後，三十歲的鍾逸傑在非洲及香港之間選擇了後者，這是他人生其中一個最重要決定。鍾逸傑說：「因為我熟悉香港多於非洲，我已經學會福建話，所以選擇來香港。」

鍾逸傑在 1957 年抵達香港，在工商業管理處工作兩年。由於具有地方行政經驗，他很快便調任到荃灣當理民官，那是 1959 年。其後，鍾逸傑曾經調任離島。由 1962 年起，鍾逸傑出任元朗理民官五年之久，期間元朗發生了一次十分嚴重的水災，所以要推行防洪計劃。

鍾逸傑說：「那是我第一次需要搬遷鄉村以進行工務的經驗，搬遷鄉村、寮屋、臨時房屋，安置市民，就像用火洗禮一樣。幸運地，我熬過這火，我想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

這位老人家大半生貢獻香港，他離開政府機構前的職位是布政司，退休後依然心繫香港，希望留港終老。他就是現年八十四歲的鍾逸傑爵士，很多人也會尊稱他為「Sir David」，他在香港已經五十四年，比不少香港人更熟悉香港，這位來自英國的前高官，是如何來到他的「第二故鄉」呢？



光是在元朗度過。」

在政府賠償等方案的配合下，拆遷工程沒有令鍾逸傑與元朗居民對立起來，反而成為朋友，甚至到現在仍有元朗居民暱稱他為「鍾叔」、「傑叔」。後來，鍾逸傑亦促成元朗大球場的興建，元朗「農夫」足球隊更是當年球壇勁旅。

在多個地區出任理民官，大約十年光景後，鍾逸傑累積了大量經驗及人脈網絡，他後來調任副新界民政署長以及首席助理輔政司。至 1973 年，四十六歲的鍾逸傑獲委任為新界政務司，管理整個新界的事務，他的下屬包括今日的特首——當年是沙田理民官的曾蔭權。

## 與人民一起工作

大埔元洲仔吐露港海邊有一座超過一百一十年歷史的前新界政務司官邸，是香港法定古蹟。鍾逸傑在這裡住過十二年，他仍記得當時這裡是個小島，只有一條海堤與大埔連接，是自成一國的世外桃源。

舊官邸的花園原本是一片草地，鍾逸傑以前種下很多樹苗。今日重回舊地，花園已成樹林，昔日菜田及農村處處的新界，今日居住了超過三百萬人。

當年有很多香港人仍住在寮屋或徙置區，他任內其中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參與落實港督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發展屯門、沙田及大埔等新市鎮。鍾逸傑覺得：「麥理浩是最偉大的港督之一，他展開了很多大型計劃，打擊罪案、打擊貪污、整頓市內衛生及污染問題，還有執行房屋計劃。他喜歡作一些充滿激情的演說，其中一次他說房屋短缺是香港不快樂的最大單一來源，我個人相信這仍是香港今日不快樂的一大來源。」

鍾逸傑在新界的政績，贏得港督尤德的信任。1985 年，五十八歲的鍾逸傑出任布政司，踏上他的仕途高峰，但他說沒有計較職位高低，因為擔任不同的官職都是服務市民的機會。

鍾逸傑說：「擔任布政司職務是個挑戰，由我十七歲第一次出海直至今日，昨日是個挑戰，明天將會是挑戰，今晚也是個挑戰。我從來沒有任何特別的野心，我只做被委派去做的事，我從來沒有計劃我的事業。」

尤德是回歸前最受歡迎的港督之一，任內繼續發展代議政制。不過，在 1986 年 12 月，尤德在訪問北京期間突然病逝，這消息震驚了香港以至英國各界。身為港督副手的布政司鍾逸傑，亦臨危受命出任署理港督。鍾逸傑憶述：「有一個早上醒來，我便是署理港督了，是十分突然而且不愉快的事件。當時要處理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遷拆九龍城寨，協調雙方達成共識，到執行遷拆寨城，整個過程都十分順利。」

四個月過後，新一任港督衛奕信抵港，六十歲的鍾逸傑亦宣佈榮休，結束三十年公務員生涯，但仍繼續出任港督特別顧問，又擔任房委會與醫管局主席。鍾逸傑在政府的生涯，由元朗防洪到清拆九龍城寨，棘手難題從來沒停過，但他相信無論問題多棘手，社會如何轉變，從政者只要以正確的方法處事，最終定可得到支持。就像今日元朗的高鐵工程，最終也會找到解決辦法的。

1997 年 6 月 30 日，隨著英國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汽笛聲響起，六百萬香港人送別了「末代港督」彭定康，同時亦告別了百多年的殖民地時代。與很多香港人一樣，鍾逸傑當晚見證了整個主權交接儀式，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及香港區旗徐徐升起，身為英國人的鍾逸傑，依然下定決心留在香港：「我花了這麼多時間，與人民一起工作，也為人民工作。我仍然在做這些工作，是沒有回頭的。」

## 治大國若烹小鮮

鍾逸傑在回歸之前十年，已經決定留在香港終老。回歸前，中方邀請他出任港事顧問，即使承受著來自英國的輿論以及種種非議，他也毫不猶豫地接受邀請，視之為幫助香港邁向回歸的工作。他對輿論感到震驚及失望，覺得傳媒對情勢是多麼無知才有那樣的立場。他說：「你可以見到一直以來，直到 1997 年，他們形容是『紅衛兵進城』，『共產主義者收回主權』等，這些形容來自英國及西方傳媒，其實他們是無法明白真實情況的。而我明白當時的情況，後來也證明我是對的。」

回歸十四年，香港社會急劇變化，回歸前的布政司，回歸後改名為「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曾蔭權、許仕仁至唐英年，一任又一任，要處理的棘手問題似乎愈來愈多，但鍾逸傑認為今日在香港做官，不一定比起在港英年代困難，關鍵是從政者的處事手法，他引用了中國老子《道德經》的「治大國若烹小鮮」，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名句——「摸著石頭過河」，寄語官員凡事要謹慎。

新一屆行政長官將於 2012 年誕生，鍾逸傑希望新特首可以優先改革公務員體系及問責制。年過八十的鍾逸傑退而不休，他離開公務員體系後投身商界，又是智庫組織工商專業聯會主席，希望利用他公共行政的經驗，繼續為香港出力。採訪當日他便與幾位商界會員討論對未來特首工作的看法，鍾逸傑認為新一屆特首不一定要有多年做官的經驗，反而能否做到一個強勢領袖更加重要，因為特首要帶領香港走在正確方向，作出正確決定，令市民跟隨領袖，令市民確信他所作的都是正確決定。

鍾逸傑在 2011 年初開始，亦為前高官葉劉淑儀創立的「新民黨」出任顧問。鍾逸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參與推行代議政制，包括在立法局引入功能界別，推行首次間接選舉。社會上一直討論的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存廢，鍾逸傑認為實行「一人兩票」，可以是未來出路。

## 以香港精神克服困難

鍾逸傑為香港作出無數貢獻，2002 年特區政府亦向他頒發「大紫荊星章」以示表揚。除了政界外，鍾逸傑亦在多個非政府組織擔任公職，包括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及女童軍總會，他亦是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創辦人之一。

早年船務學徒的刻苦歲月，鍛鍊出鍾逸傑的堅強鬥志。他在七十年代初參與創立外展訓練學校，希望讓香港的年輕人接受短期訓練，學習野外生活的各種求生技能，培養「自強不息」的態度。鍾逸傑認為這種面對逆境的信念，對香港也有一定幫助，無論是發生在個人，或一群人，以至整個國家身上，都可應用「外展精神」。「服務人群，自強不息」，無論面對甚麼挑戰，不讓步，不放棄，其實就是「香港精神」。

眼見香港近年的發展似乎欠缺方向，好像一艘帆船，在無風的海面上一樣，鍾逸傑認為香港人固然要有危機感，但同時亦要對自己有信心，也不必太執著把香港與新加坡、台灣，或上海進行比較，如果看看周邊地區，就可見到香港已做得非常好，不應該太著迷於統計數字，應該準備自己，面迎挑戰，然後克服這些挑戰。鍾逸傑有信心香港一定會克服所有的困難。

在香港住了超過半世紀，還會說廣東話，鍾逸傑算不算地道的香港人呢？鍾逸傑表示：「我不會以那種方式去想，我是英國人，住在香港。我愛香港，我愛香港人，我也愛英國。」

回顧在香港的生涯，鍾逸傑無悔無憾，他熱愛生命：「無論你在任何地方，我認為我們都要熱愛生命，我在香港可以說是過了一個最刺激，及值得享受的人生，有時會有麻煩及煩惱，但經常也是有樂趣及享受的。」

# 司徒華

## 站在運動前頭的強人



### 走在前線身體力行

司徒華作為支聯會主席，每年都會出席「六四」燭光晚會，風雨不改。在一次公開的講話中，他表示雖然他已老了，但支聯會不是老人政治，他霸著這個位置，只是想霸著一種危險讓自己去承擔。司徒華的這份堅持，感動了不少人，包括早於七十年代跟他相識的朱耀明牧師。司徒華與朱牧師兩人於參與社運時認識，1987年一同到北京與港澳辦官員會面，討論香港政制發展，直到八九「六四事件」，兩人的合作關係更是密切。

共事多年，華叔最令朱牧師感動的是他的身體力行，尤其在「八九」期間。朱牧師憶述：「他腰骨痛，走路有困難。我記得李卓人被扣查在北京時，我們要去救人，一直由新華社走到港督府。我問他要不要推車，或坐車上去，他說要走路。於是我就在旁邊扶著他，感受到他的辛苦，他的痛楚，但他堅持要走下去。他在會議內做領袖，也不單單是做政治研判，發表一些理論，他還是所有人的同行者，走在前線身體力行。」

在司徒華離世後，朱牧師擔任治喪委員會發言人，替華叔處理後事。回想華叔當日的託付，朱牧師百感交集：「當他彌留之際，他突然說你們一定要彼此相愛，之後他說『支聯會的義工，我愛你們，所以你們都要彼此相愛』，這震撼了我們的心，我們幾個人在他床邊非常的感動。」



本著「對的事就要支持，不對的就一定要反對」的信念，司徒華一生堅持為爭取民主而奮鬥，即使民主路漫漫，但他仍不懈地努力，他認為：「我並非孤獨作戰，而且成功不必在我，因為功成自然有我，有我一份力量在內。」詩人們會將詩寫在紙上，讓世人見證。可是，有些人雖然沒有寫過詩，但他們卻將自己的生命塑造為一首詩，為世人、為社會、為國家民族作出有意義的事，這也是其生命的意義。

朱牧師感慨地說：「在政治舞台上，或者在電視機螢幕上，有運動時往往站在前頭的，都是這一個強人，他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究竟他的力量來源是甚麼？我想就是來自他心底對國家的愛，對社會的一種卑憫之情，以及對個人的一種關心。」

華叔離世前心繫家鄉廣東開平，他的戰友亦特意回內地把開平的情況拍攝下來，播放給在病榻中的華叔細味，在這裡亦正正是司徒華愛國心的孕育地。司徒華曾說：「我愛國的起步點，就是戰爭。因為抗日戰爭，我要離開香港返回家鄉，我見到很多人在街

上走過時，都要向日軍鞠躬，稍微慢一點就被拳打腳踢。當時，我便產生一種信念，就是國家民族一定要興盛，一定不能夠做亡國奴。」

## 獻身教育

來到香港後，司徒華入讀皇仁書院，中學畢業後，入讀葛量洪教育學院，並投身社會運動，1985年開始從政，循教學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局。同年更獲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為香港回歸祖國出一份力。不過八九「六四事件」令他離開草委。司徒華的民主路，便是由這裡開始，除了爭取民主，華叔亦獻身教育。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本港其中一個最大的工會，由司徒華於七十年代「文憑教師事件」後成立。他擔任會長多年，即使晚年患上癌症，亦經常參與會務。教協奠定了司徒華在教育界的影響力，亦令他與「徒弟」、「戰友」張文光結下不解緣。司徒華在一個訪問中透露：「『文憑教師事件』取得勝利後，我覺得需要乘勝追擊，成立一個強大獨立，能夠自力更生的教師工會。教協初期，怎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這個經營的過程我亦投放了不少心血。我這一生最好的朋友，都是在教協會裡認識的。」

張文光於「金禧事件」時結識華叔，亦建立了一生的友誼。「金禧事件」是香港於七十年代末發生的一次學生運動，以寶血會金禧中學的財政混亂為導火線，引發教會上層與「國粹派」教師間的衝突而引致轟動全港的學潮。張文光憶述：「當時我跟華叔出現一個很大的分歧，我覺得既然金禧被封校，我們當然要爭取復校，校名一定要叫做金禧，否則就是失敗。但華叔就說這個是妥協，雖然名字叫五育，但始終老師學生可以復課，應該接受。當時我還是大學生，覺得華叔這個妥協很不應該。但是華叔跟我說作為理想的話，當然可以要求到盡，但在這個事件中決定權應該是掌握在金禧的師生手中。又過了一段時間，我也想通了，覺得雖然是妥協，沒有回復金禧校名那樣漂亮，但仍算是一個勝利。」

## 風雨同路

當年的張文光仍未大學畢業，但已積極參與社運。張文光又道出一件往事，令他對華

叔另眼相看：「當時有份報紙叫《中運報》，意即中文運動的報紙。教協當時沒有資金，很多報紙都是我跟他兩人合作捲起來去寄。我仍記得在一個很寒冷的晚上，我們二人抬著一大網報紙到郵筒投寄，怎料郵筒滿了，有一些寄不出去，要抬到另一個郵筒，後來來到華叔的家樓下。因為天氣很冷，我跟華叔說請他先回家睡，餘下的由我自己去寄，但他就是不肯，說要寄就一起去寄。之後很幸運地，再走過一條街，竟然有個郵筒還有很多空位，終於將所有郵件都寄出去，我們才各自回家。當時我開始對司徒華這個人另眼相看。」這難忘的經歷，加深了張文光與華叔的感情。

張文光大學畢業後，仍然熱衷於社運，沒有正職，當時是小學校長的司徒華，不但替他擔心，還為他作出打算：「華叔跟我說有理想是沒有用的，經濟如此緊絀，根本不可以做得長久，建議我去他的學校教書。我一當上老師，他就叫我加入教協會做會員，接著做工作人員，然後做理事，再過一段日子便做到副會長，到他從校長一職退下來後，我就已當上教協會會長了。所以後來我走上教育界議員之路，便是由我當教師開始的。」

從在教育路上結伴，到一起在民主路上打拼，張文光跟司徒華一直並肩作戰。民主黨創黨，為教師爭取權益，走進議會，以至在政改一役，反對五區請辭，贊成改良方案，兩人風雨同路，民主黨及司徒華飽受批評，司徒華當時一直積極樂觀面對：「要將這些事情的出現，作為一個考驗，然後沉著積極樂觀地去面對克服。通過這樣的考驗，整個政黨會更加成熟，根本不需要害怕，考驗和困難遲早都會出現。」

作為華叔的好友兼後輩，張文光到今日談到市民和其他反對者對司徒華的攻擊時依然激動。張文光說：「我最傷感的是他在七一遊行時，因為要坐輪椅的關係，不能夠來到我們的隊伍而留在帳篷下。他被很多反對他的市民辱罵，我看著他被人侮辱，我心裡非常難過。只是隊伍還是要向前行，我們也受到很大的侮辱，我們自己也寸步難行，更加不可以將華叔的輪椅推著前進。」

2011年1月2日，主懷安息，司徒華的一生雖然已畫上句號，但在他走過的路上，卻照亮了不少人的生命。

# 曾憲梓

## 愛國的領帶大王



### 生活鬥士

曾憲梓十二歲小學畢業後，便停了學，在農村耕田，做一個百分之百的農民。

曾憲梓憶起十七歲時解放初期的情況，仍印象深刻：「那時有些同志來到我家鄉，看到我在勞動之餘天天在看書，便鼓勵我讀書，不但送我去葉劍英以前創辦的、免學費的東山中學，更每月給我三元助學金。當時老師的月薪大概只有十幾二十元，我作為一個窮苦農民，除了能夠免費讀書，每月還有三元助學金，這對我的心靈刺激很大，極為鼓舞，覺得是共產黨及祖國給我的，再加上我的年紀已不輕，如果再不學好，便沒有機會了。於是，我勤奮地學習，取得好成績，順利讀完中學和大學。」

曾憲梓在 1961 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生物系，1963 年 5 月 30 日來到香港。他說：「童年的艱苦，現在說出來我都覺得很悲哀，因為那時候吃不飽、穿不暖，不是一時半刻的，而是持續多年，直到解放時才有飽飯吃，所以我當時看見家鄉的窮孩子常常給別人欺負時，感受很深。」

曾憲梓在廣東梅州出生，自幼家貧，沒有錢交學費，但喜歡讀書。於是，他努力地耕田種菜，將收穫送給老師以換取讀書機會，更藉此順利完成小學。這個艱苦的童年鍛鍊了他要用奮鬥克服困難的決心，以及遇到任何困難都不怕的精神。



## 領帶大王之路

憑著這一鬥心，成就了今天的曾憲梓。來港後曾憲梓要養活母親、太太及三個兒子，為了令他們不要再捱窮，他千辛萬苦學做領帶，自力更生。提起開始賣領帶的因由，曾憲梓道：「我來到香港打工時，以前讀的書用不著，不能負擔我一家六口的生活，所以不得不選擇做領帶。為甚麼是做領帶生意？那是因為我去泰國找哥哥，我哥哥在泰國做領帶生意，那時我只懂幫他裁剪，不懂製造方法。另外，做這個行頭需要的本錢較少，而且可以餬口養家，所以我也學著做起領帶生意來。」

當時，中國以及整個世界很流行用泰國絲綢來做領帶。因此，曾憲梓從泰國回來時，順道買了泰國絲綢，自己嘗試做。由買衣車、買熨斗、買剪刀、搭裁床，全部都「一腳踢」。皇天不負有心人，曾憲梓每逢出路遇貴人，在最艱難的日子，他的叔父為他打開了創業之路。曾憲梓在 1968 年初春節前回香港，叔叔給了他一萬元養家費。有了這一萬元，他便可以較寬裕地分配費用。年初三曾憲梓和家人搬到平安大廈十五號，用了兩千元，租金四百元，再加上購買家庭用品的費用，又花了差不多兩千元，還剩下六千元。曾憲梓就是靠這六千元來開始創業做領帶生意的，懷著「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向前衝，不繼改善。

當可以成功地生產領帶後，他又要面對另一考驗。曾憲梓憶述：「當時我不太懂得說廣東話，又未做過生意，不知道應怎樣開口。去到尖沙咀，一下車便看到重慶大廈，我走進去重慶大廈，裡面是一個個小小的店面，我走著走著，竟然被我發現一間售賣領帶的店。於是，我便走過去跟那老闆打招呼，我將用從泰國買回來的絲綢做的領帶，展示給他看，他感覺挺滿意，表示樂意向我買一打來試賣看看。那時候一打，打了折扣後要六十元，平均一條五元。照計算，一打領帶可以賺到十元，即是一條領帶可賺八毫多，而我一家人一個月的費用是五十元，所以我便下決心，每個月一定要賣夠五打，賺夠五十元才回家去。第一個月，我便成功了。」

這一次成功，就像為曾憲梓打了一支強心針。他的領帶事業，也經過一傳十，十傳百，生意愈做愈好，由街頭行銷賣到衝入百貨公司售貨架。曾憲梓說：「那時我天天都在想點子，腦子沒有停過下來，天天總結檢討，天天想怎樣改善，我也常常到大百貨

公司去逛，看見外國製的領帶手工精美，相比下香港製領帶顯得那麼遜色，難怪人家可以以昂貴的價錢出售。不過，當時我有決心，覺得外國人做得到的話，我自己也做得到。所以我買了四條外國牌子的領帶回來，拆開它認真研究。」

就是這樣，曾憲梓的領帶技術一日好過一日，最後與外國名牌的質量看齊，並以價廉物美贏得口碑，逐步邁向今天的領帶王國。曾憲梓總結自己可以創業成功的經驗：「因為我很真誠，坦承地和人家交朋友，和人談家世、出身，交了朋友後生意便容易做了。」

與很多商人相比，曾憲梓做生意的方式有些不同，他從來不貸款做生意，就連信用卡都只得一張。他在一次訪問中說：「我做生意的信念是穩中求發展，有多少錢，就做多大的生意。我從不借貸，不欠銀行錢，就算是使用信用卡，我覺得是先花未來錢，並不適合我曾憲梓。」

## 心繫家國

曾憲梓又表示：「我由一個一無所有的窮人，做到現在生活這麼好，全靠國家的栽培，所以我會拿出部分資金來奉獻給國家，幫助有需要的窮人。」

成功走出窮困，曾憲梓仍時時刻刻記掛著國家：「我最初來到香港，感到十分徬徨，也覺得有點對不起國家，國家培養了我，我卻離開國家。所以，我過羅湖橋時曾發誓，我會努力奮鬥，創造一番事業來回報國家。」

今時今日，曾憲梓創立了一個領帶王國，但他一直沒有忘本，把自己所賺到的錢貢獻祖國，他的第一筆捐款原來是在 1978 年四人幫粉碎後，他回到家鄉，見到母校被毀，立即捐了三十萬。報答國家不是一次性的，曾憲梓說：「我規定我每年都要捐款，而且要逐年加碼，每年三十萬、五十萬、一百萬、三百萬、五百萬、一千萬……，逐步不斷加碼，直到三年前，每年規定自己拿出五千萬來報答國家。」他不單自己捐錢，還感染家人一起貢獻國家，就連身邊的同鄉朋友，都受到他的影響，例如客家同鄉、旭日集團董事長楊劍與曾憲梓同樣篤信佛教，做善事亦令他們二人結下不解緣。

愛國已經成為曾憲梓的標記，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的過渡期，每逢國慶都鼓動左派人士高調慶祝，這份愛國心，令他廣受中共領導人認識及欣賞，加上他敢言、敢做的性格，由一個客家商會會長，慢慢踏上全國政協及全國人大常委之路。

直到 2007 年 4 月，患有腎病的曾憲梓宣佈向中央請辭人大常委職務：「做了十四年人大常委了，即是三屆，我已經七十多歲了，再加上我兩個腎衰竭，天天要休息，所以我覺得既然做了那麼長時間的人大常委，年紀又那麼大，應該是退位讓賢的時候。」

曾憲梓退下來後，一次在家親自下廚宴請傳媒時，表示會全力支持兩個兒子參選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但不會為兒子拉票：「如果要由我來規定我兒子做甚麼，便不是曾憲梓了，曾憲梓性格從來不會自己要求，亦不會要求別人幫助我，我兒子能不能當政協，要靠自己的本事。現在我有甚麼做呢？我的任務就是繼續幫助國內那些幹事業的人，繼續奮鬥。」

## 火氣十足

很多人都明白為何曾憲梓經常公開批評反對派，他背後的理念原來是這樣的：「因為香港是我家，所以我覺得除了反對之餘，也需要多些建議，不能因為是反對派，便事無大小都反對，還有些黨派更加過份，甚至打架，這並非香港之福，要取得共識，中央需要與各方面人士有所交流，共同為香港的發展努力。但反對派有自己的意念，卻沒有行動，一些言論行動都是反對中央、香港，時時做出一些活動來刺激中央，而忘記中國政府過去一百幾十年被人欺負，直至今日改革開放了三十多年後，才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其實，中國政府對人權方面是理解的，但把西方民主引進中國來是不符合現實的。中國十三億人口，在貧窮落後中發展起來，所以把西方的民主引進到中國，中國社會會變成不穩定，社會不穩定經濟就難以發展。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走民主走到怎樣呢？經濟蕭條、民不聊生，所以我奉勸民主派人士，中國始終是我們的國家，反對自己的國家，我覺得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很多人可能都不明白，曾憲梓為何那麼固執，那麼「好火氣」，與曾憲梓相識了幾年的全國政協委員梁亮勝起初都不理解，但相識後就對曾憲梓改觀了：「以前接觸到的信

息，與現在真正跟他交往所得到的認識有些不同。這次交談中，我覺得曾先生是十分坦誠、很真心，亦讓我十分感動，了解多了很多以前不了解的事情。」

## 成功必有苦

遺產要怎樣分配，曾憲梓早已經安排好：「我的私人財產，不會分給子孫，我會拿去做公益事業。另外我的股票不能分，而是留在管理公司，不過我的兒子可以分到股息。我未死之前，股息是由我控制；我死了以後，股息就可以分，但股票不能擁有。如果我的後代因為財產的爭拗，而有誰向法院提出申訴爭財產的話，提出來的人是得不到一分錢的遺產的，我這樣做是防止他們在我死後，因爭產而打架。我向他們宣佈了，大家亦都同意了，我的遺囑也是這樣寫。」

總結一生，曾憲梓無悔無憾，他寄語年輕人「成功必有苦」：「一個人年輕時要刻苦奮鬥，不要怕苦、偷懶，所以我的座右銘是勤、儉、信、誠——勤勞、節儉、誠實、守信，這也是我人生的基本原則。」

# 劉皇發

## 新界官民之間的橋樑



### 為龍鼓灘接通市區的聯繫

屯門龍鼓灘是劉皇發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當年是一個荒蕪的村落，距離市區很遠，若步行的話需要三小時。劉皇發透露：「如果坐船用風帆，也要看天氣，順風順水的話很快就會到，如果逆流或是逆風的話就需時兩、三個小時。」

劉皇發是客家人，他們家族十幾代人都住在這裡，他小時候就在祖屋旁邊的廟讀小學，龍鼓灘村村民劉春儒是他的同學，劉皇發時常回來探望他。劉春儒憶起當年兩人常在村裡的空地打球，笑說：「劉皇發十幾歲時比較愛玩，那時真的沒有想過他會如此成功。」

五六十年代的屯門龍鼓灘，與新界很多鄉村一樣，還沒有公路通往市區，也沒有自來水、電力供應。落後的生活令劉皇發想到要從政，以改善村民的生活。要成為一個從鄉村走出來，能夠接觸到社會各階層的人士，這一定要從政治入手，因為一切都是由政府安排，如果沒有身份，根本就接觸不了政府的管理層。

終於，劉皇發的一腔雄心壯志得到當時鄉議局主席陳日新的賞識，得以參與村務及鄉事活動，二十四歲便成為龍鼓灘村代表，從此踏上政途。他第一件重要的政績，便是



劉皇發出身於新界農村，連任八屆新界鄉議局主席，並身兼行政會議、立法會議員，五十多年來帶領處理過大大小小影響新界發展的問題，也許有人未必完全認同他的做事風格，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界這半個世紀能有如此的發展，劉皇發功不可沒。

解決村民生活上的基本問題。龍鼓灘村代表劉威平說：「第一是馬路，第二是電力供應、第三是自來水供應，這些民生的必需品，都是由他爭取來的。」

1967年，龍鼓灘接駁電力，當時中電的嘉道理更親自主持亮燈儀式，成為村中佳話。有了電力供應之後，為了避免吃不完的飯菜變壞，劉皇發第一件要買的不是電視，而是雪櫃。因此，家家戶戶，都先買個雪櫃。

## 扮演官民之間的橋樑

新界佔整個香港約九成的面積，共有約六百條村，每條村都居住著一批原居民。過去五十年，新界這片土地雖然發展迅速，但過程中卻涉及大大小小的官民衝突，例如大嶼山封山事件、錦綉大道使用權等問題，還有大大小小的收地糾紛，劉皇發皆有份參與斡旋。

劉皇發三十歲時跳出龍鼓灘，獲選為屯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適逢六七十年代，香港面對人口壓力，港督麥理浩計劃在新界發展新市鎮，但發展新界涉及原居民的土地擁有權。對港英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時政府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和原居民溝通談判的橋樑。

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李麗娟說：「麥理浩當日到場參與這個一百多人的聚會，我負責做翻譯，親眼目睹整件事。當時新界鄉議局的主席仍是德高望重的陳日新，可是，麥理浩要我找劉皇發來。劉皇發來了，麥理浩便單刀直入地詢問他，若在新界發展九個新市鎮他會否幫忙，劉皇發便爽快地回答一句『沒有問題』。」

之後，新界得到迅速發展，但這項任務一點也不容易。劉皇發認為村民透過新市鎮發展是可以改善生活，從中得益的，但關鍵是官民雙方要溝通、協調，達到雙贏：「要取得雙方平衡，雙方利益都要兼顧。要擺平社會各方面，令所有受影響的人都能接受是很困難的，而且每件事的處理方法都不一樣，例如屯門在七十年代宣佈要成為衛星城市，由1973年前的三萬多人發展至今的五十多萬，期間三四十年當中，需要做的協調工夫是很多的。」

1979年港府徵收屯門井頭村部分農地，撥出一幅山坡上的土地作賠償，但不少村民認為賠償不合理，劉皇發為他們向當時理民官吳國泰爭取一塊在嶺南大學後面的山地，安排這批村民在該處自建居所，還自掏六萬元，替村民建路上山，村民為感激劉皇發，而把該地命名為「頌皇台」。

除了個別鄉村的問題，鄉議局還面對一個涉及全港六百條村的歷史性挑戰，就是雙村長制。2000年終審法院裁定非原居民有處理村務的責任，即除了原有代表原居民村長外，再加一個居民代表處理一般村務。判決隨即引起新界原居民強烈的反應，有村代表甚至要脫離鄉議局。

憶起當時的情形，李麗娟也說：「香港是法治之區，我們都重視法治精神。所以既然法官判了，我們就一定要實行。人人都告訴我，一定要找劉皇發幫忙，找到他幫忙就可以事半功倍；但若然劉皇發不肯幫忙，那就會事倍功半了。」

這個史無前例的挑戰最後亦得到解決。立法會通過雙村長制，這六百多條村的鄉紳選舉制度自此改變。其實，涉及新界的問題很多，劉皇發認為態度強硬之餘也要講道理，且堅信「辦法總比困難多」，面對棘手問題，劉皇發有自己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

2006年，禽流感再次襲港，政府要全面禁止散養家禽，但沒有安排賠償，引起不少新界村民不滿。劉皇發表示如果要向政府爭取，就要啟動很大的機制，例如司法覆核，也會影響香港的管治聲譽。因此他慷慨地用自己的錢到金舖打造金雞，向那些被沒收了雞隻但沒有得到賠償的人作出補償。被殺三十隻雞的，就還三十隻金雞給他。

## 劉皇發的處世哲學

參與這麼多次斡旋，劉皇發認為要說服別人，不是靠聲音大，而是靠自己日常的言行，因為要擺平一件事，首先要得到他人的尊重，日常行事不可有偏見，要令人認為你是一個公正、公平的人，別人才會聽你的話。

村代表劉威平在屯門龍鼓灘長大，七年來和劉皇發一同做村代表，他指劉皇發經常教

# 香港 百人

040

導後輩，欲成大事不能計較太多，他說：「發叔經常說，做村長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怕被人罵，不要計較。要豁達一點，可以幫到別人就最開心。」

跟劉皇發合作過的前官員都認為他率直的圍村人個性，亦反映在處事風格上。李麗娟在七十年代開始擔任過政府多個部門的職務，退休前是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和劉皇發在政壇內外都不時交流。李麗娟透露劉皇發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他不會太客氣，浪費時間說些無謂的客套話。他往往一針見血，不怕對政府說真話。但如果是他相信要做的事，他就會排除萬難地去做，未辦成時絕不收手，這是他的特質。」工作以外，李麗娟和一班「手袋黨」女高官，對圍村出身的劉皇發評價很高，認為劉皇發重情義，亦推翻了圍村男士「大男人」的講法。

李麗娟記得：「在新界民政處替前布政司鍾逸傑做事時，那時候我正懷孕，發叔每次來開會時都記得替我拉椅子。可見，他是很尊重女性的。」

劉皇發的辦公室中放了一把諸葛亮畫像的扇，他說遇到難題時會看它一下，希望可得到智慧。對他來說，最令人困擾的並不是協調工作，而是各種是是非非，這甚至令他有退休的念頭。

劉皇發認為最令人難受的是，解決了問題後，不但沒有人讚賞，而且被說成是獨裁，是土皇帝，他說：「這樣的誤解會令我有倦意。中國人有一句話『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總有一天不做的。不過要先計劃一下時間表。」

## 鄉土情意結

在政壇打滾半世紀後，最令劉皇發嚮往的始終是鄉土情懷。

劉皇發常說：「財富不能令人安樂，飽食不能令人健康。生活在農村的人，有一種睦鄰和互助的精神，這是城市中罕見的。農忙時，土地多的村民工作較多，不用自己去要求，那些工作較少的村民都會自發地去幫助鄰舍的叔伯兄弟。過去的生活雖然窮，但很優悠。食物及生活質素較差，但那種安樂、安逸，實在難以形容，至今我仍很嚮

往。」

有時候，劉皇發回到龍鼓灘鄉公所開例會，鄉公所幾十年都沒改變，變的只是合作的對手。由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自己亦由村代表到屯門區代表，再走入立法會和行政會議，到達香港的決策中心。劉威平指劉皇發公職雖然多，沒有時間經常回村，但他仍將屯門龍鼓灘的人和事放在心上，且謹記自己是龍鼓灘人。他常說這條村是他成長的地方，他永遠也不會忘記，對龍鼓灘的情意結很深。

# 黃錢其濂

## 香港首位女衛生福利司



### 作風敢為

黃錢其濂作風爽直、敢言，她形容自己是一個勇於「進言」的人，見到有不妥之處，她會馬上提出。這可見於她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時，對長者生果金提出的意見可以見到。當時，黃錢其濂認為如果申請生果金需要入息審查的話，就等於用兩元的政府資源，去查一個只能收到一元的人，更坦言這是不值得的。

還有另一件可表現黃錢其濂勇於進言的事，就是在 1990 年，當黃錢其濂由社會福利署署長升為衛生福利司時，香港公共醫療狀況很差。她一上任，首要做的是成立一個法定機構，讓醫管局以一個較具彈性、效率的形式，去統領全港的公立醫院。要成立這個機構，就要說服原本以公務員模式工作的醫護人員轉制，這任務殊不容易。

黃錢其濂感到要令護士工會及相關人士，接受她所提出的服務條件非常困難，她說：「我還未說完第一句說話，衛生署和醫院事務署員工大聯盟已經指出除非接納他們的要求，否則不參加任何諮詢。總之話還未說完，人人都起立離開盃葛我。這對我是十分大的打擊，但我已經預料到他們會有所行動。不過，我當時已有心理準備，若他們盃葛我，我就安排記者招待會。當時我有官車，車內有電話，於是我立刻打電話給政府新聞處，請他們替我安排記者招待會，告訴記者本來我預備跟他們談判，給他們一個



1949年，十二歲的黃錢其濂跟隨家人移居香港。當時她連ABC也不懂，但經過多番努力及堅持，終於在五十年代末成功考進香港大學的英國文學系。大學畢業後，她到聖保羅中學教了七年的英文，後來又經歷了廿五年的官場議會政治。退休後她重拾昔日興趣，把所有力量都投放在文學之上，並開始她的寫作計劃。

最好的條件，可惜未談判已經破裂。於是，我呼籲他們『回來』參加諮詢，後來他們果然接受了我的條件。這對我來說絕對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對於黃太果斷敢為的作風，高永文醫生印象深刻：「黃太做事斬釘截鐵，不拘一格。她的思路清晰，判斷力強，很快就可決定一件事應該怎樣做，是否值得做。若果是不值得做，她會斬釘截鐵告訴你這件事不能做；如果她覺得值得做，就會出盡力向政府爭取。我記得，當時長期腎病人中，有些有貧血的需要打一種很貴的補血針，這是需要自資的，後來經過黃太的極力爭取，政府才撥了五千萬款項給我們，令腎病人後來不需付高昂的補血針費用。相信到現在為止，那些長期腎臟病人，也還記得黃太。」

## 演藝學院的誕生

除了醫療方面，黃太亦關心香港的文化前途。過往香港被批評為「文化沙漠」，沒有合適的環境予文化植根，藝術表演場地缺乏，八十年代之前，更加沒有一間專業學府，可以培訓演藝人才。黃錢其濂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擔任音統處總監時，便建議成立香港演藝學院，作為第一間政府資助的藝術高等學府。

黃錢其濂當時寫了一份報告書，呈交予港督麥理浩爵士。麥理浩爵士親自予資金充沛的香港賽馬會，然後又親自打電話回覆黃錢其濂，告訴她香港賽馬會願意藉成立一百周年之名，捐款三億港元興建香港演藝學院。1985年開校至今，座落在灣仔海旁的演藝學院，為香港培育過無數演藝人才，不少演藝學生在國際比賽中屢獲殊榮。

黃錢其濂認為：「一個國家的藝術不應只限制在自己國家，而是應該走向國際，可以令更多的人接受。所以，我希望演藝學院的影響力，可以延伸至世界各地。」在香港演藝學院校長湯柏樂（Kevin Thompson）心中，黃錢其濂是香港演藝學院的靈魂人物，他說：「她為我們撰寫了報告書，讓我們可以租借設施與場地給公眾。這不但為學院帶來了額外資源，而且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的學生可以跟一些專業團體或人士，有一個近距離的交流。」

## 為民請命

黃錢其濂婚後，跟隨丈夫入籍新西蘭，以海外公務員服務條件為香港政府工作廿五年，經歷過五位港督，是香港第一位擔任衛生福利司的女性。黃錢其濂在1994年五十七歲之齡退休，翌年便參加立法局選舉，競逐選民人數最多、超過廿萬的功能組別——第九組「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界」，最後還成為票后。黃錢其濂說：「我以前服務市民，現在何不為民請命呢？為人民請命，即是站在人民那邊，不再站在官員那邊，因為我明白官員取巧的地方，明白政制是甚麼，也明白政府的運作。」

以前做高官只需一聲令下，就有眾多下屬跟從，競選議員時要親力親為，接觸每一個市民，爭取他們的支持。黃錢其濂憶述：「記得第一次去天橋跟別人握手，市民很驚訝為何黃太站在這裡派傳單？然後，我又要去夜總會，因為夜總會的人也是我的選民。那時，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官員，代表的是選民，而不再代表自己。」

黃錢其濂當議員時，一直站在最前線，遇到敏感社會議題時亦毫不退縮。劉慧卿表示：「她跟我十分相似，說話直率不轉彎抹角的。大家都在前線工作，合作很愉快。」

雖然不再是議員，但黃太平時仍緊貼留意立法會的動態，她表示：「我不會在會上丟

東西，但我明白有些人真的感到很憤怒，因為講了很多遍官員仍不聽。他們有一股熱誠，也有一些『發牢騷』的傾向，那不是不好，我覺得這也是香港可愛的地方。1997年時，我沒有去競選，因為我『落車』時女兒恰巧懷孕了，是第一胎，她需要我，所以我就去了新西蘭幫她照顧孩子。我並不是在逃避政治。」

## 退下前線

從官場、議會退下來，黃錢其濂不時穿梭香港、新西蘭，每次回港她都積極投入推廣文化活動。她又醉心於文化創作，寫過小說，也寫過劇本。她的著作往往先寫英文，再以英文為藍本，翻譯成中文，而內容大多是反映社會現況的。2010年她到可立中學當顧問，教授英文，便以她的著作《生態必勝》作為藍本改編為英文話劇。她希望學生可以以輕鬆方式去學英文，並勇於面對。黃錢其濂覺得香港的學生是有潛力的，但需要有學習機會。故希望透過劇本，讓學生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創意，令他們更有自信，也希望學生透過在舞台上演繹英文話劇，發音可得到改善。

前布政司夏鼎基曾稱讚黃錢其濂的英文比很多英國人好，她有如此成就實在有賴父親的教導。當時，她從內地來港，既不懂廣東話，又不懂英文，她說：「那時，我在班中，只有中文考第一，其他全是零蛋。後來，爸爸鼓勵我聽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他說聽不懂不要緊，只要堅持每天聽五分鐘，一年後就自然會聽得懂。那時，爸爸又說『假如你能背出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就是你的，沒有人能拿去，因為已深深印在你的腦中。』」所以我就天天背書，後來已不覺得自己是在背書，寫文章也變得十分自然。」

在官場打滾廿五載，當過官員又當過議員，九七後她本來可以跟一些退休高官一樣，在商界大展拳腳，不過她卻另有看法：「雖然當時也有商界的人出高價找我，政府也批准了，但為何我不去呢？因為我覺得好像不是太公道。我現在正計劃跟一班退了休的社工、醫生朋友，想想如何可以幫到這個社會，不需要籌錢，因為我們可以出錢出力。」

不少人批評回歸後的香港今非昔比，黃錢其濂並不認同，她覺得香港人需要機會，香港人其實有夢想的。最近她答應為新民黨當顧問，希望為香港的未來出點主意。

# 董建華

## 首任香港行政長官



### 推動 CEPA

董建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他在任期間，其中一項帶給香港最長遠影響的工作，就是大力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他鼓勵香港的投資者緊抓這個好機遇，大膽設想、勇於實踐。

回歸初期，董特首作出「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所以時時刻刻要維護國家的利益」的呼籲時，「背靠祖國」的想法在港人心中並不迫切，有些人更擔心這會破壞一國兩制。擔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十多年的學者劉佩瓊，亦親身體會到這股阻力，她表示：「當時學術界有研討會提到粵港應該『融合』，有些更提到『一體化』，結果這兩個名詞都被否決。香港有種情緒，認為香港若要維持為獨特的地方，就要盡量不要與內地太接近，並以此方法闡釋何謂一國兩制。」

在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董建華建議內地開放民眾來港個人遊，他又參考外國經驗主動向中央提出，將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待遇引入香港和內地，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即後來的 CEPA，協助本港的專業服務界別打入內地市場。

到了 2003 年，香港回歸六周年前夕，亦即「沙士」令香港經濟再次跌至谷底時，香港



1996年，香港回歸前一年，特區政府籌委會成立，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眾裡尋「他」，上前跟董建華握手。這一記握手，讓港人深信董建華是第一屆行政長官的大熱門。最終，他亦由一個領導家族生意的商人，成為帶領香港面對回歸後種種挑戰的特區領導人。



# 香港 百人

048

終於等到好消息，於當年6月29日簽訂CEPA，香港經濟得以由谷底反彈。

在港英統治下的香港，經常要面對內地人偷渡來港的問題，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內地人來香港也有限制。到回歸後的今天，訪港內地旅客逐年遞增，目前已成為零售、飲食以至旅遊業界重要的收入支柱。香港的店舖外不時見到「歡迎使用人民幣」的標籤。

## 笑著迎接大時代

董建華1937年在上海出生，他的爸爸董浩雲是當時航運業的先驅，有「船王」之稱。董建華之後來港定居，於香港完成中學課程後，到英國求學，取得海事工程學士學位後旅居美國，直至1969年才回港。

董建華爸爸對他的期望，在這張董建華兩歲時的照片上面寫的字句——「笑迎着……大時代來臨」，大概可以反映得到。董建華說：「這句說話有兩個意義，一是爸爸對國家未來發展的一種希望；二則是對相片中這個兩歲、剃了光頭的董建華有個期望，希望這個兒子將來跟他一樣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民族。」

董建華回港後，協助管理家族生意。1982年，董浩雲逝世，公司由董建華打理。公司曾經因環球航運業的低潮面臨破產，董建華積極尋求債務重整，將家族生意起死回生，憑藉的是對成功信念的執著。

董建華指這些經歷亦在在影響著他治港的理念：「爸爸在世時我們經常一起旅行，他認識世上很多名人，令我看到了很多名人的成功與失敗。成功的人，有遠見，處世宏觀，善於用人。」

## 建·立·中·華

董浩雲的愛國情懷展現於下一代的名字當中，董建華解釋：「我是建字輩的，我弟弟叫董建成，我叫董建華；我兒子那輩是立字輩；而我的孫子是中字輩；第四個則是華，

四個合起來是建立中華。」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華的治港理念，他曾經說過期望下一代會說回歸後的第一個十年，特區政府為香港的理想藍圖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但可惜，他最終未能完成兩屆特首的十年任期。

從行政長官的崗位退下來，董建華開闢了另一片新天地，為國家推動中美民間外交。董建華在任期間，曾多次到美國訪問，先後得到兩任總統喬治布殊和克林頓單獨會見，這在外交上是破格的。除了促進港美貿易，董建華亦時常以香港特首兼美方老朋友的身份，向對方解釋中國內地的許多政治、經濟政策，中國成功申辦 2008 年奧運，董建華當年亦從中向美方做了大量游說工作。

2011 年初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董建華亦有隨行，並獲邀出席奧巴馬為胡錦濤而設的國宴。而奧巴馬 2009 年首次訪華，董建華排在中方歡迎人士中的第三位，可見其重要性。其後有評論更稱他為「董第三」。

## 由中央全力支持到被市民要求下台

1997 年，在中央全力支持下出任特首，董建華領導下的特區政府，著重於落實一國兩制，以及因應當時的高樓價制定房屋政策，希望令香港可以「馬照跑、舞照跳」，市民安居樂業。

董建華於 1997 施政報告提及：「每年興建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在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不過，這個願景被亞洲金融風暴粉碎，經濟跌至谷底，政府不得不改變這個房屋政策。於 1998 年施政報告中，董建華說：「我們相應調整房屋供應措施，故此每年興建八萬五個單位，這個目標已經不存在。」負資產數目不斷增加、失業率不斷攀升，董建華民望不斷下滑。期間更爆發港大民調風波，董建華身邊的人向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施壓，董建華被指干預學術自由。

在「數碼港事件」中，政府在未有公開招標情況下，將地皮批予盈科拓展的李澤楷。

# 香港百人

050

政府說是發展高科技中心，但一直被輿論批評其實是地產項目。經濟未有起色之餘，市民的不滿情緒進一步加劇，董建華唯有多次呼籲市民要有信心：「如果你們失了信心，香港的燈真的會熄。各位，我真的沒有靈丹妙藥，我唯一可以跟你說的，我會集思廣益，跟我所有的同事日以繼夜地工作。」

經濟轉型，不能一朝一夕就實現。董建華與他口中的同事，也在磨合過程之中，影響了施政效率。為了提高施政水平，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不幸的是，香港在這個時候要面對另一場更大的打擊。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疫區，購物天堂變為口罩之都。此時特區政府堅持提出，就《基本法》二十三條即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市民擔心既有的自由和權利受到限制，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如疫症般散播開去，引發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參與遊行。

社會上出現了要求董建華下台的聲音，不過董建華斷然拒絕：「下台其實是最容易的一個決定，要留下繼續面對，是需要有勇氣，有很大付出。我今天選擇留下來，因為我覺得我的使命還沒有完成。我的任期是到2007年6月30日。」

即使CEPA及內地旅客個人遊等「挺港」措施相繼落實，但經濟仍未復甦，2004年的7月1日市民繼續上街。

## 董特首提早請辭

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跟董建華相識多年，他認為董建華有遠見，奈何推行的政策要見到成效，確實需要時間，加上他為人敦厚，往往令市民對他有所誤解。吳康民這樣形容董建華：「董先生是一個好好先生，但就少了點權術。權術本來好像一個貶詞，換一個正面名詞便是謀略，做領袖是要有點用人處事的謀略。」

2004年12月，國家主席胡錦濤於澳門接見香港特區政府領導班子時，提醒各領導：「總結經驗，查找不足。」胡錦濤這番提醒，令外間再度揣測董建華施政表現是否有問題。

2005年初，董建華承認政府未能以民為本，令市民受苦：「政府為了應付資產泡沫爆破，以及嚴重財政問題而採取的一些政策及措施，的確令市民痛苦和不安。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此時，有關董建華去留的消息和揣測不斷，其中特別提到他很可能獲增補，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並因此辭去行政長官的職務，而董建華一直未有回應。

果然，2005年3月於北京董建華被增補為政協委員。吳康民認為：「當時，這個安排是中央對董建華工作的肯定，亦意味著董建華將會離開特首的崗位。在內地來說，在職的政府官員，包括省市長，一般都不會兼任政協委員或政協副主席，因為政協基本上是一個第二線架構，他不在其位，讓他發揮餘熱，用他的智慧能夠再起諮詢的作用。」

董建華於2005年3月10日召開記者會，宣佈請辭，為自己的特首生涯提早劃上句號：「因為我的體力已經不如前，而且繼續有惡化下去的可能。我覺得應該辭去行政長官的這個職責，這個是對香港負責任的做法。最遺憾的一件事就是因為我的健康，令我沒有辦法完成第二屆的五年任期。我覺得很遺憾。」

董建華於2006年獲授大紫荊勳章時說：「我出任第一任特首，是我一生的光榮，一生的榮譽。」並表示對香港的前景比就任時更加充滿希望：「我將來只會為國家效勞，只會為香港效勞。」

作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任內雖然引起過很多爭議及批評，他的功過在這一刻或者未能有全面的定論，但是無論如何，他為落實一國兩制的努力，其中的成與敗、經驗和教訓，亦都會在香港歷史上留下重要的記載。

# 梁愛詩

## 香港首位律政司司長



### 躋身男性主導的法律界

梁愛詩 1939 年出生於香港，小時候除了在外公創辦的愛國學校就讀，亦曾經在聖嘉勒女書院和聖心女書院唸書，接受西方教育。四十三年前梁愛詩通過英國律師執業資格試後，開始私人執業。當時在近二百名律師當中，只有十多名是女性，梁愛詩是其中之一。作為女性，能夠在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環境下，衝過多道難關，成為執業律師，殊不簡單。

梁愛詩與當時很多女律師一樣，擅長打與家事有關的官司。熱心社會事務的梁愛詩，更於 1975 年與梁冰濂等另外幾名女律師創立香港女律師協會，協會除了集結女律師互相幫忙外，亦非常關注社會上有關婦女和兒童權益的問題。

除此之外，梁愛詩多年來擔任過不少公職。1992 年，民建聯成立，她是創黨成員之一，做過兩屆中委。1993 年，梁愛詩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擔任港事顧問，同年又參與成立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繼續為婦女爭取權益。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祖國，梁愛詩從一名擅打家事訴訟的律師，成為掌管特區一切法律事務的律政司司長。可是，在她上任的第一年就證實患病，但她堅持沒有退



梁愛詩出身自傳統的愛國家庭、亦是書香世家。她總是身穿旗袍、套裝，一身端莊打扮。她是本港回歸後，亦是香港開埠以來首位掌管律政部門的華人女律政司司長，領導律政司屬下逾千職員。



下來。八年多來，她親手處理大量具爭議性的法律問題，直至六十六歲才退休。

在擔任律政司司長期間，2002年港府向她頒授大紫荊勳章，表揚她對香港作出的貢獻。不過，作風低調的她，多年來都很少接受傳媒的訪問，談論自己的事。

## 回歸後經歷風風雨雨

為官八年，梁愛詩對工作有熱誠，亦贏得與她共事的行政長官和同僚的稱許。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這樣評述她：「梁女士在過去八年，其實為香港做了很多事。她經歷了很多的困難，亦受過很多人的責難，我覺得這對她非常不公平道。」

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她也有不錯的評價：「Elsie（梁愛詩洋名）令人可敬的就是，當她作出決定之後，都會細心向公眾解釋，無懼批評，無懼謾罵，縱使其他人不是每一件事都認同 Elsie 的意見，但我相信從來沒有人會質疑她的誠信和她對香港的承擔。」

不過，梁愛詩在任時正值特區政府成立初期，作為第一位女性律政司司長，接連要應

# 香港 百人

054

付釋法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等敏感問題，當中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

1998年，廉政公署拘捕三名星島報業集團職員，指他們誇大《英文虎報》的發行人數，欺騙廣告客戶。當時上任律政司司長不足一年的梁愛詩，以證據不足和公眾利益為由，決定不起訴星島集團主席胡仙，避免集團倒閉，拖累近二千名員工失業，事件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

不久之後，終審法院就一宗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案件作出裁決，裁定非婚生子女都有居港權。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決定就居港權問題提請人大釋法，同樣引起強烈反響，大律師、律師等法律界人士罕有地上街遊行。

連串事件之後，有立法會議員更向梁愛詩提出不信任動議。在議會上，梁愛詩盡最後努力游說議員：「吳（靄儀）議員的批評，是建立於一個錯誤的假設之上，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是指每一個人都要得到同一和完全一樣的對待，但明顯的事實不是這樣，根據公約第二十六條的有關法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上是指法官和官員執法的時候，一定不可以無理地行事。我深信一國兩制是可以成功推行，而無損我們一向珍惜的原則，我會全力維護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司法獨立的精神，以往是這樣，以後亦是這樣。我懇請各位議員，否決對我的指責，投票反對議案。」不信任動議最終被否決。不過，梁愛詩其後到訪中文大學時，仍有學生組織抗議她決定不起訴胡仙和提請全國人大釋法，選她為最討厭的高官。

2002年，特區政府提出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進行諮詢，引發社會極大反響，掌管特區政府法律事務的梁愛詩與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聯手全力處理相關問題。梁愛詩站出來向公眾解釋：「這個二十三條諮詢文件裡所載的建議，是不會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權利，公民的基本權利已經在《基本法》很清楚地寫出來，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如果立法會通過的任何法律，是與《基本法》有抵觸，是違反了《基本法》第十一條，法院不會讓它生效。」

2003年七一回歸紀念日，數十萬市民上街參加反二十三條遊行，港府最終宣佈押後二讀《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但梁愛詩之後向公眾補充：「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是要繼續

進行的，大家都知道按照《基本法》，特區是有責任去立法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我們會一如既往，向立法會議員和市民解釋和看看他們對現在新建議修訂有甚麼意見。」

## 退下司長職務繼續服務香港

2005年，經歷過風風雨雨，梁愛詩選擇退下來。離任之際，她如此總結自己的律政司司長生涯：「歲月匆匆，我加入特區政府工作已經八、九年了，部門的同事一直給我很大的支持，在特區政府建立初期，我們遇到很多從未遇過的法律問題，過去的八、九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義的幾年，能夠為香港服務，是我莫大的榮耀。」

八年多為官生涯，處理過一個又一個棘手和具爭議性的法律問題，外界對梁愛詩作為律政司司長的評價，譏譽參半。不過在法律界，她就是公認的「好人」，就連在提請人大釋法和二十三條等問題上，與她有過不少爭拗的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都表示欣賞她的付出和努力。尤其是看到由2001年起，梁愛詩多次率領本港大律師和律師的代表團到內地考察，希望為法律界打開內地市場。梁家傑亦多次隨團北上，看到梁愛詩的努力，他說：「梁愛詩絕對是一個好人，我覺得她對於提携後輩，或者是對於法律界，作為一個專業，她希望能夠幫我們在內地打出一條血路，這些都是應該給予她充分肯定的。但是梁愛詩始終在法律界的地位未足夠撐起律政司司長這個職位，因為她之前都是做一些家事案件，我想在律政司司長這個位置上，面對這種政治衝擊，並不可以如此履險如夷。總的來說，我都覺得特區成立最初這八年多，是一個很難的『三煞位』，而梁愛詩的表現，我覺得她真正表現出沒甚麼私心，沒為自己經營些甚麼，她可能純粹是在某一些問題處理上顯得有點力有不逮，但她仍是盡力去做。做完了八年多司長，我想可以給她一個評價，就是她可能在捍衛香港的人權自由，或者法院的獨立和自主方面，應該可以做得更好，但我亦肯定，她已為香港這個法治制度、法院的獨立，擋了一些箭。」

大半生都在服務香港，六年前卸下律政司司長的重任，現年七十二歲，早已過了退休年齡的梁愛詩，並沒有停下腳步，而當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後，又繼續在另一個層面，服務她熱愛的國家和香港。

# 黃宏發

## 港英立法局的 末任主席



### 看立法會主席的權力

黃宏發是港英時代立法局的最後一任主席，他在兩年任期內，作出過無數次裁決，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應是將梁耀忠逐出議會廳的那一次。這次是香港立法局史上首次有議員被逐出會議廳。回想這次裁決，黃宏發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因為逐他離場，是經過深思熟慮，全部都有說明理由的。

其實，在會議席上失言，而被裁決要收回，也曾經發生在黃宏發自己身上。對於現在言語失誤的情況頻頻發生，他認為要處理這些議會問題，有兩方面要考慮，一是那些不守規則的議員，另一方面是主持會議的人，反而不是看會議規則，因為即使規則說明要守秩序，那甚麼叫守秩序，就是要有基本的禮貌，對人無禮就是不守秩序，而咒罵別人就是無禮。在議事廳是要辯論一些事件，而不是對罵。一旦擔任主席，就是要負責要求大家遵守一些原則性的規則，甚至那些沒有細寫出來，但他覺得議員開會也應該遵守的原則，例如要打領帶才進去會議廳等。

現在常有議員在會議進行中豎牌、舉出標語，黃宏發則覺得：「這全沒意義，那裡是會議廳還是示威場？這到底是誰犯的錯誤？議員？還是主席？若說是議員，但卻是主席容許他這樣做的。我曾經問過某些主席，他說他沒有權力，那是因為他對會議規則理



黃宏發生於上海，曾任多屆香港立法局議員，前行政局議員，以及前立法局主席。他亦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創始人，擔任高級講師三十年，退休時獲名譽教授名銜。



解成要白紙黑字寫明的他才有權執行。只是有些原則並沒有寫出來，卻已隱含在會議規則內，例如會議規則寫明立法會是開會的，開會便是開會，不是示威，開會是要就著某個議題發言，而不是隨便發言，這全部是『開會』這兩個字已經包含在內的意思。千萬不要在議事規則內，訂明哪些說話不能說，然後由第一點列到第九十九點，那麼有意挑戰的人就會說第一百個。」

回歸前，黃宏發已經有份參與將立法局議事規則翻譯成中文，他認為會議規則不應該輕易修改。

由臨時立法會計算起，黃宏發曾三次參選主席，但三次都輸給范徐麗泰。對於范太當主席當得怎樣，他有這樣的評語：「我認為球證是球證，球證不是兩隊球隊的教練，所以球證不應該做這些事。」

至於現任主席曾鈺成，黃宏發就認為政黨背景會是一個包袱：「一旦曾經表現過強烈的政治立場，或者曾經屬於某個黨派，甚至是那個黨派的領導的話，就很難被人接受你是一個公正的主席，所以可能會委曲一點，或者當自己嚴謹執行時，會害怕被人批評

是在打壓某些黨派，我想他會害怕被人這樣指責。」

## 是時候退下來

出名喜愛盃中物的黃宏發，曾於 2000 年因酒後駕駛撞車，被控不小心駕駛，被判罰款及停牌一年。身為立法會議員知法犯法，他承認這次事件是他政途的致命傷。

黃宏發表示：「當時我是醉了。不過，我反而覺得因有此事，令到我 2004 年未能當選，我才有時間可以譯詩。這也很好。」

黃宏發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的創始人。教了十多年政治後，他在 1985 年透過立法局首次選舉，以間選方式入局，走上他的從政之路。由間選到直選，立法局至立法會，黃宏發當了十九年議員。最後，他在 2004 年選舉中落敗，在教學上已經退休的他，亦決定退出政壇。

黃宏發說：「我並不是意興闌珊，只是因為我認為一旦做了議員，我就有責任做下去，一直做到真的做不來，既然我輸了，就變成沒有責任再做下去。其實，我應該開心才對，因為我做議員也犧牲了很多，就連寫學術論文的時間也沒有。我原本在 1997 年之前就應該退下來，但我害怕若我退下來的話，會有人說我對香港前途沒信心，我不想別人有此印象。再者，因為當時中英關係很差，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若我不在政界，那就做不到任何可以影響當時局勢的一些行動。於是，我選擇進入臨時立法會，以確保立法會特別是立法局秘書處的過渡。那麼處理好過渡之後為甚麼仍繼續做？又是害怕人家會說我對回歸後的新政府沒有信心，所以我想說清楚我一直做下去不是因為我有政治野心，我之前也已經說得很清楚，做過主席以後就不應該再有任何政治野心，不會再做任何行政職位，或者做高官，選特首就更不應該做。可是，若我連立法會也不做的話，別人會覺得我是否對香港無信心，對特區無信心。」

對於 2004 年選舉落敗，他承認這與 2000 年的「醉駕」有關，當時有選舉對手便是用這件事來攻擊他，但他始終認為整件事是好事，對他來說沒有損失。

## 譯詩閒趣

退休後，他在西貢有一個辦公室，用來處理日常事務。辦公室的名字叫「退一步齋」，何謂「退一步」？

黃宏發說：「這是來自『糊塗老人』鄭板橋的說話。『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這是上半段。下半段是『寬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之福報也。』可見，做人還是謙讓一點較好，無論做甚麼事，都要三思而後行。」

黃宏發現在沉醉於英譯詩詞，不再擔任任何公職。他說：「其實，我可以做很多事，但為甚麼我沒有去做？因為我認為用所有時間去譯詩亦不足夠，真的不知道尚有多少年可活在世上？我譯得很慢，譯了三年，都只是譯了六十多七十首左右，人家三年甚至一年已經可以整本三百首譯完。這是個很大挑戰，亦是一個很有趣的嗜好，譯成後很有滿足感。若有朝一日我可以完成的話，起碼讓外國人可以看見中國詩詞之美，當然他們未必完全理解當中平仄的音韻之美。」

黃宏發開始英譯唐詩，是因為讀華仁中學時的老師唐安石神父的啟發：「讀中學時，我的老師唐安石神父 (John Turner) 很喜歡譯詩，他譯過很多中國詩。他 1971 年逝世後，有人將他的譯作，抽了部分出來出版了一本書。我譯的詩與他不同，我是盡量跟隨中國詩的分行，而他則是將它寫作英詩，分行可能會改變，但他的造詣真的十分之高。」

在這樣多中國詩詞當中，他如何作出選擇呢？發叔表示：「我主力做絕句，而且是唐絕句。最近，我也譯了幾首李煜的詞。」

至於眾多詩人當中，黃宏發表示：「我較喜歡李白，超脫一點很好。從我的博客，我看到李白《靜夜思》的瀏覽率是排第一的。還有一首，我也譯得很開心，而且很多人看的，總是排在前三名或前五名，就是李白的《望廬山瀑布》。」

# 劉千石

## 香港工運領袖



### 大和解言論

成立職工盟，加入民主黨，參與議會選舉，劉千石曾經是民主派的核心人物。不過，他在 2004 年提出的一番大和解言論，表示中央與民主派的對立有損香港利益，認為民主派和中央都要釋放善意，與對方溝通。言論一出，這位領袖飽受批評，大部分的批評更是來自昔日的盟友，責備他出賣了民主派的利益，做出投共的行為。

對劉千石來說，大和解言論所帶來的傷害很大，他說：「那次真的很『傷』，在政見上，大家也有了一個很大的差異。我相信做一個這樣重要的決定時，總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有人有所保留，但我覺得這與我們自己有很大的關係，我想可能在某一段時間將事情推到最盡，到要走回頭路，戰友就會質疑為何會走回頭。我認為有些事情是自己做成的，自己也要負上部分責任，所以當日被攻擊時，我不會怪甚麼，抱怨甚麼。」

然而，當日強烈反對大和解的盟友，在 2010 年的政改問題上，卻與中央破冰。對此，劉千石這樣回應：「我不能說『當日是我對』或者『今日是你錯』，因為每個人在某一段時間，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分析以及決定，總有自己的考慮點、認識點。無論是堅持不和解，或者堅持要怎樣做，這些在自由社會都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確的目標。」



劉千石於內地出生，十多歲偷渡來港。在香港曾面對種種不平等的對待，這些經歷奠定了他走上工運之路的基礎。由七十年代起，劉千石開始投入工運，繼而從政，創立職工盟，是香港工運的領袖人物。

曾被離棄，但他始終認為自己是泛民的一份子：「自己是甚麼，根本不需要特別去標籤。我能夠坦然地說，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香港人而做的。」

## 退出議會

2008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為劉千石在議會內的工作劃上句號。他認為進入議會只是他人生的其中一條路，當他離開議會時，他覺得對自己的角色感到更加清晰，他說身在議會，別人會覺得他做很多事情都是為了得到選票，存在著自身的利益。離開議會後，大家便不會這樣想。他坦言做事是更加得心應手了。

由發動群眾運動，就社會發展出謀獻策，到今日只為個別團體服務，在部分人眼中，可能會覺得是大材小用，但劉千石卻樂在其中。他說：「我只是退下議會火線，轉移到另一個戰線而已。」他覺得自己只是走出另一條路而已，並非大材小用。

劉千石在美孚居住了二十年，即使離開了議員崗位，至今他仍覺得是美孚街坊的一份子，跟他們是一家人，仍然互相關心。訪問當天，他就來到服務了十多年的輪椅輔助

隊的周年宴會，與一班老朋友聚舊，又到服務中心了解情況。

對於輪椅輔助隊的工作，他稱讚有加，認為：「這個服務中心很小，但是五臟俱全。這類的服務在社會上是有實際需要的，而我只是付出一點時間鼓勵他們，當他們需要幫忙時作出協助，這對我來說亦有所得著。我相信，坐輪椅的人士亦希望多外出看看外面的世界，能幫到他們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激勵。」

## 親密戰友

用心做事，用心感受，是劉千石在工運、民主和政治路上一直本著的信念，而這份信念讓他贏得不少支持，更結識到一班親密戰友，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便是其中一位。劉千石與李卓人無論在民運或工運上，多年來兩人合作無間。李卓人表示，在工運方面，他從劉千石身上學習和認識到了組織力、凝聚力和感染力的重要性；從政方面，李卓人則認為他們兩人有不同的做事風格，可以起到一硬一軟相輔相成的作用。

2008年，李卓人即使自己參選，亦都多出一分力，協助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的劉千石，可惜願望落空。對於劉千石的落選，李卓人表示惋惜：「我們本是『一軟一硬』的好拍檔，現在沒有了『軟』的部分，那麼『硬』就不能軟銷，這是有缺失的。不過，作為一個朋友，明白他看到議會現時的狀況時會感到不開心，所以他離開議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雖然離開了議會，但是劉千石並沒有離棄工人，並繼續為他們爭取權益。最低工資制度經過多年爭取，終於在2011年5月1日實施，對劉千石而言可謂是望穿秋水。從劉千石於七十年代參與工運開始，已經希望可以為工人爭取到最基本的保障。他覺得爭取一件事，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只要不灰心，相信社會總會有改變。

## 回鄉探親

當年的大和解論，有指劉千石是藉此來換取獲發回鄉證，以探望1989年後一直沒見面的母親。在發表大和解論時被攻擊，劉千石並沒有抱怨，但被指是交換條件，劉千石

感慨地說：「回家見到媽媽，彷彿隔世。我媽媽生了十六個小孩，養大的只有四個，到我長大後，整整有十一年，我是不能回去見她的。再見時，她已經八十多九十歲，對我來說，這當然是對媽媽一個極大的虧欠，但都已成過去了。」

母親病逝後，劉千石仍然香港廣州兩邊走，有時間便回廣州探望兄弟和妹妹，共聚天倫。

## 獻身社會

劉千石自幼對粵劇有濃厚興趣，他與部分粵劇名伶的關係亦相當密切。其實，在工運和民運以外，他說出另一個心願：「我很想推動粵劇發展，因為這才是屬於香港真正的文化組成部分。我很希望粵劇可以真正在香港紮根發展，我願意花時間去協助有心做好粵劇的人。例如最近我便在幫助一些小朋友，小演員由兩歲到八至十一歲都有，這些小朋友的演出，其實是可以推動更多人去接觸粵劇、了解粵劇。」

獻身於社會，至今仍然孑然一身，經歷過高低起伏的劉千石無悔無怨。他說：「來到香港時，我甚麼也沒有。沒有學識、沒有金錢，但是香港提供給我這樣一個環境，令我這一個學歷不高，沒甚麼專長的人，可以為香港基層做點事情，我已感到很滿足。如果能夠的話，我願意為香港基層、香港社會做更多的事。我覺得若是曾經堅持過的事，到今天有了進展，我會感到安樂。議會路途的句號完整與否，不視乎那次選舉的輸贏，而在於究竟我還可以為香港勞工階層做些甚麼，所以這永遠都不是一個句號。」

# 范徐麗泰

## 相信香港會更好



### 疑似參選人

2011年下半年來，「疑似參選人」、「熱門參選人」成為了范太的另一個「銜頭」。每次出席公開場合，總會有大批傳媒追訪，就連參加立法會大樓惜別禮，都離不開這個話題。到2011年7月，范徐麗泰終於有較明確的表態：「我剛放完假，我現在可以開始考慮我有沒有資格去參選。」

後來，范徐麗泰仍是遲遲未決，她解釋道：「從個人立場來說，我其實是沒有必要再更上一層樓。不過，有些香港市民真的很真誠。有一個市民就曾跟我說他很想我去做特首，但又擔心我的身體，所以不敢逼我。這些說話讓我很感動。」

香港正值多事之秋，官員民望屢見新低，大家都覺得下屆特首不容易做。范太就認為經濟、房屋、老人問題，統統都要管，但現在香港人心散渙，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凝聚市民的心，大家一起解決難題，但這需要政府的誠意。政府要令市民能夠體會到政策是官民合作去做的，而不是政府說了算，要讓市民感到自己是有份參與的。

與另外兩名熱門特首參選人相比，范徐麗泰的民望稍為領先。不過，亦有人暗暗批評，指她不就社會問題發表意見，以免被扣分，范太對此不以為然：「現在民望可能是



在政壇打滾近三十年，范太的身體多次出毛病，又沒時間陪伴摯親。這麼多年來，能夠一直堅持地做了那麼多的公共服務，全因為她相信：「香港人是一班有知識、有法治觀念、講道理，而且理性的市民。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應該可以提升得更高，香港對國家的貢獻亦應該比現在更多。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我很希望香港人可以重振雄威、吐氣揚眉。」

# 香港百人

066

印象分居多，待你真的參選時就要拿出政綱；不單是政綱，亦要讓人看到你有一套辦法去落實政綱內的政策。而且，亦要有一班能夠幫你去執行的團隊，這些就是締造信心的做法。」

民望高的話，做事自然得心應手，不過她亦坦言：「無論是董建華先生，抑或是曾蔭權先生，他們上任時都是民望高企的。但是只需要做錯一兩件事，市民很快就對你產生質疑。」

透過前人的經驗，范太對民望更有另一番見解：「你看今天網上對董建華先生的評價，再將這些評價與當年的那些評價放在一起比較，你會很感慨。如果在當特首的過程中，民望滑落的話，亦是沒有辦法的。然而，仍要憑良心做事，不要以高民望為做事目標，為了民望，只做些市民覺得好的事，而不理會這些政策將來的後遺症，這會令市民很辛苦，並不是一個盡責的做法。」

范太坦言自己對經濟不熟悉，在未來一段時間要「惡補」，日後若組班，亦定必要找這方面的人才。雖然未有治港理念，但用人方面范太就已有一套自己的準則，認為下一屆政府應該任人唯才，所任用的人最重要是要有能力且能夠服眾。

## 前路困難重重

面對緊張的行政立法關係，總結回歸後十一年的議會經驗，范太的意見是要共同參與：「我在立法會十一年，真的很深切感受到行政與立法之間是互不信任的，市民對於建制內的人物都不是很認同，這都是因為內鬥太厲害。我覺得要吸納一些理念比較相近的立法會議員，讓他們可以早點參與政策的形成，待政策真的要提出來時，這些議員都會明白為甚麼政策會這樣，亦願意為你向市民解釋政策，甚至為政策護航。另一方面，所謂的反對派議員，難道你甚麼都不讓他們知道？我覺得還是要在政策差不多擬定時，就應該先與他們通通氣。」

猶疑未決，范徐麗泰預見前路充滿艱辛、挑戰，但困難相信不止一個。

2003年7月1日民間發動大規模的「反二十三條」遊行，范徐麗泰的看法是：「《基本法》二十三條寫明是由特區自行立法來保障國家安全。我覺得二十三條並不是大家所想般的像洪水猛獸。而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他的責任就是落實《基本法》，所以上次立法時市民不接受，並不表示下一次市民仍不接受，這需要到時再去評估市民當時的心情，以及他們的期望。當然你也要看看香港市民的看法，你亦要講清楚你自己想去的草案是怎樣的一個草案，可能會經過諮詢，諮詢之後也可能發覺行不通，需要再調整，因此亦未必是大家想得如此困難的事，但卻是需要大家去處理、去思考的事情，而不是就這樣放在一邊。」

要帶領香港走進新天地，當然困難重重，如果有此機會，上任之日，范太已經六十七歲，她可以為香港再付出多少光陰？

范徐麗泰說：「這永遠是一個問題，做不做到兩屆？實際上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反而要考慮的是香港是不是需要有一個行政長官帶領我們十年呢？」

## 政途光輝

范徐麗泰近年最為人熟悉的相信是擔任立法會主席，回歸以來，范徐麗泰擔任立法會主席十一年。十一年的歷練令范徐麗泰贏得市民愛戴，以及不同黨派議員的尊重，成為最受歡迎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這個崗位寫下范太最光輝的一頁，但原來踏上這條從政路，一切都只是出於偶然，故事始於1983年。范徐麗泰透露：「當時的港督尤德爵士委任我當立法局的議員，當時我和丈夫都認為我只會做兩年，因為港督只委任我兩年。誰知兩年後，隨後又多次被委任，前後做了九年。而在過程中，我隨時都準備卸任，因為當時越南船民的問題，我是與主權國英國打對台的。」

范太所說的船民問題，於上世紀困擾本港二十多個年頭。六十年代越戰爆發以來，大量越南船民湧入，為香港帶來龐大的財政負擔。范太當年大力反對港英政府繼續接收

難民，要求將他們遣返，亦因為她這個強硬立場，令她在政壇漸漸冒起。不過，到了1992年，范太與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意見不合，憤而辭去所有公職，亦被指由「親英」陣營轉投「中方懷抱」，其後分別擔任特區預委會及籌委委員，參與香港回歸的過程。

1997年范太重返議會，成就政途上的光輝時刻。2004年毅然選擇參與直選，結果以六萬多票當選，亦再次被推選為立法會主席。范太的成功，全賴一直在背後默默為她打氣的丈夫范尚德。

范太與范尚德於1974年結婚，育有一對子女。由八十年代范太晉身政壇的一刻開始，范尚德一直陪伴在側，給予無限支持，兩夫婦更以恩愛見稱。2004年直選期間，即使范尚德患上肝癌，他仍支持太太參與競選，更親自出席競選活動幫忙拉票，跟太太一起見證這個歷史時刻，但最終餘下的路只剩得范太獨自走下去。

## 家庭與事業的取捨

家庭與事業怎樣取捨，對范太來說從來都是一個解不開的結。范徐麗泰說：「對於家人，我總是有愧於心。一直以來，我都沒有辦法平衡工作與家庭，時間方面分配不了。因為有時只要工作需要我就會立即去做，再顧不得私人事務，所以當我家裡有事，即使有人生病了，但若我已經答應要執行一項工作，我便會很負責地以這項工作為重，然後才盡量抽時間去陪伴我的家人。」

范太對家人的歉意，可以從她的個人網站中看得到。她曾經講述作為一個母親的感受，更形容自己是一個不稱職的媽媽，但她對家人的愛護從來沒有被質疑過。1992年，范太在加拿大讀書的女兒，患上急性腎炎要長期住院洗腎。范太立即放下手頭工作，飛往多倫多陪伴，其後還捐出腎臟給女兒。

范徐麗泰說：「女兒生病時，我很幸運地只是在做預委會籌委會，所以才將事情置之不顧，只是陪伴她。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雖然意識到對家人的付出不足夠，但范太從未言休，從立法會退下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到現在還考慮是否參選下屆特首，這會否令她更忙，更少時間陪伴家人？范徐麗泰表示家人並不支持她參選，大家都覺得她應該退下來享受生活，不應該再工作。

# 詹培忠

## 潮州怒漢



### 商界展拳腳

六十五歲的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十二歲從家鄉潮州來港，中五畢業後便出來做生意。為何選擇做生意？詹培忠說：「當時，在香港倘若要從事專業工作，除了要有大學水平外，更要修讀專科，才具備資格。我只是中學畢業，再加上我父親已在東南亞做出入口生意，故我必然的賺錢捷徑也是做生意。」

二十四歲時，詹培忠開始從事股票行業，香港四間交易所他都做過，更曾於遠東交易所出任董事。約於 1982 年，詹培忠擁有自己的第一間上市公司，他透露：「當時我已在相當多的上市公司工作過。由 1970 年起，股市仍是用粉筆寫黑板的時候，我便踏入股票界，可算是『紅褲子』出身，之後一直在股票市場打滾，除了最前線的工作崗位外，我亦曾擔任交易所的董事，以及上市公司的主席，差不多所有崗位都擔任過，因而有人稱我為『金牌莊家』。與此同時，我收購了很多有問題的上市公司，並將這些公司全線改革，修改至符合交易所的上市條件，所以也有人稱我做『公司醫生』。」

### 踏上從政之途

正因為這樣，詹培忠在金融業界有了地位，在 1991 年立法局選舉功能界別中，從最



在議事廳內鬧得面紅耳熱，而且次次語出驚人，詹培忠率直、敢言，人人稱他為「潮州怒漢」。「自己認為對的，就會據理力爭。」這是性格倔強的詹培忠的做人哲學，從倔強中他雖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也在不知不覺間得罪了很多人，包括權貴和當權者，他笑言倔強是潮州人的特徵。潮州人勇於反抗，而結果往往是要付上沉重的代價。

多人競逐的金融服務界中，經過四輪投票後，當選成立法局議員。他得到二百八十一票，開始踏上從政之途，也在 1995 年、1998 年的立法局議員選舉中勝出連任。

他表示：「我開始從政，其實相當偶然，因為金融業界直至 1991 年才有立法局議員席位。本來我對政治一竅不通，而且一點也不熱衷。不過，當時我在聯交所工作，那是袁天凡當行政總裁的年代，因為有所磨擦，又適逢這個席位的增設，於是我就想去競選議員，希望可把金融界中不好的地方反映出來。當然，在過程中，對證監會也好，交易所也好，我對這些機構亦構成了一定的壓力和鞭策力，令它們除了監管這個業界，以及保障投資者利益外，而且還『做大了個餅』，令各界生意增加。然而，我始終做不到的，就是不能夠令交易所對外資和本地華資一視同仁，當中仍然有差別。」

八九十年代，金融服務業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命脈，除了捍衛業界的權益，詹培忠亦為市民發聲。「過去這麼多年，我認為政府有很多不足之處，而特別遺憾的就是『雷曼事件』。這件事金管局要負上一定的責任，因為它要求有關的銀行，擴展它們的業務，除了收息差和服務業界之外，更要發展其他新業務，才導致這樣的結果。故此，我期望未來無論由誰做金融服務界立法會的職位，第一，一定要拿時間出來為業

界、為市民服務。第二，不可以沽名釣譽，要實質參與。第三，亦要得到市民與界別的認同，從而達至好的效應，不可以令業界蒙羞，這是最重要的。」

## 人生高峰遇兩大挫折

只有中五學歷的詹培忠，由從商到從政，事業可以稱得上是一帆風順。正當事業到達最高峰時，偏偏遇上人生巨大挫折。五十二歲的詹培忠，被控六項串謀偽造文件及行賄罪，陪審團只是裁定其中一項串謀偽造股票轉讓書的罪名成立。

面對這個考驗，詹培忠表示：「最重要是要調節心態，畢竟我當時是香港唯一一個以議員身份去坐牢的，要處之泰然實際上是不簡單的。當時我也有爭論過，但結果都勝不了。既然勝不了，那便認命，去熬過那一年坐牢時間，共二百四十四天即是八個月。八個月對我這種當時有身份的人士來說，也不容易熬過，但是既然命運已來到，便需要承擔，誰叫你要去鬥爭？在這樣的情形下，我要發揮自己的持平心。雖然我常常替證監會打民事官司，根本天天都在赤柱出入，但是那事發生時出入是要戴手銬的，那我唯有當它是裝飾。任何人士到了監獄都要有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做清潔者，所以我出來後，雖然『條氣』不是十分順，但我仍是要遵守香港的法律。」

刑滿出獄的前立法會議員詹培忠，早上九時離開赤柱監獄，當時他對一眾記者說：「我對那個判決雖然不太滿意，但無論如何我已經承受了，亦接受了這個結果。雖然有些人吩咐我不要看回頭，但我個人絕對不怕這些事，我會勇敢去面對。」

坐了八個月監，出獄後仍然滿懷壯志，希望繼續從政，但法例規定任何人士被判囚超過一個月，五年之內不可從事政治活動，詹培忠唯有休息，然後部署怎樣重出江湖，結果他在 2004 年重返議會，一直做到現在。詹培忠說：「我沒有食言，當選議員除了是鼓勵自己之外，也希望大家了解到金融服務界的選民全部都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以及代表性，在這個情形下，我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足以證明我過去不是做錯，所以我要繼續參選，主要是想還我的選民一個公道，證明過去多年，他們的選擇沒有錯。」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2007 年詹培忠又遇上另一大考驗，就是證實患上癌症，但以

他的樂觀性格，最終亦戰勝病魔。

詹培忠透露：「2007年中我發現在頸上有一顆腫瘤，共進行了三次電療。當時的確相當痛楚，電療差點把我的口腔燒熟了，首兩個星期是癌症所謂的蜜月期，第三個星期開始燒到口腔熟了，相當痛苦。之後，我每年都會照X光，每隔三個月就局部照口部，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既然沒有問題，我就沒有理由還在博取同情，認為自己有病。我想鼓勵大家，尤其是面對癌症時，不要那麼緊張。其實，照我得來的結論來看，癌症病人會死的原因：第一嚇死、第二氣死、第三醫死、第四才是病死。有病就要醫，醫的過程就是盡力去配合，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

## 樂天知命

不經不覺詹培忠已在政壇打滾了十七年，他說做完這屆立法會議員後便不再參選，這是因為：「議員席位不是我的私產，而是公職。實際上，我已佔這位子太久了。所以，坦白說，有多少料子，都已使出來了，那就無謂『阻住地球轉』，讓其他候選人一展所長，利用他們的新思維、新知識、新智慧，為業界和港人服務吧。」

退下來是否甚麼也不幹呢？以詹培忠的性格絕對不可行：「別人都說不要退休，因為退休後身體機能很快會退化。但我會繼續享受我自己的樂趣，因為我很喜歡說話，擅長交際，一次演講我可以一講兩個多三個小時，一口水也不用喝。」詹培忠經常出席議政節目做評論嘉賓，他表示退休後會繼續論政。

經歷高低起伏，能夠堅持至今，詹培忠全靠太太及兒子的默默支持。詹培忠坦言：「潮州男人有時比較大男人，亦比較主觀。對子女，我只要求他們要懂得奮鬥。」詹培忠深明維繫一個家庭需要共策共力，互相尊重。因此自1968年結婚至今，他與太太一直相敬如賓，關係良好。

總結人生種種，詹培忠悟出了自己一套獨特的人生哲學：「無論何時都要自私地照顧自己。因為照顧好自己，變相也是協助他人不用擔心你。做人要看得通、看得遠、看得輕。自愛人愛、自在人在，一定要堅強，有承擔才可得出好結果。太過份的虛偽是無謂的。自己要過得開心，不幫助別人，並非罪過，但是不去傷害人，卻是你的本分。」

# 張敏儀

## 不做政府的喉舌



### 兩大得意之作

張敏儀現年六十四歲，她人生中有三十多年的時間，都是貢獻給香港電台。1972年她開始加入香港電台，由編導做起。八年之後，她已升任為香港電台台長，1983年中英會談期間，張敏儀曾經借調到新聞處工作，兩年之後再升做新聞處首位女處長，仕途青雲直上，但熱愛廣播事業的她，在借調到新聞處時一早已經表明心跡，稱自己始終希望重返港台。

1986年張敏儀如願以償，重返港台之餘，更加擢升為香港首名華人女廣播處長，一做便是十三年。香港電台成立至今，出品過很多為人津津樂道的節目，當中最家喻戶曉的不得不數處境寫實劇《獅子山下》。張敏儀謙虛道：「《獅子山下》會成功，其實是因為那首由顧嘉輝寫曲，黃霑填詞，羅文主唱的主題曲。」

七十年代香港電台開始拍攝《獅子山下》時，背影都是黃大仙、橫頭磡、樂富等區的大廣場。當時，香港電台的第一個導演是黃華麒，以主角德叔一家人的故事去反映當時公屋裡的小市民家庭生活，以及一種鄰里間互相幫助的精神。

後來，《獅子山下》轉成為社會寫實劇形式，除了拍屋邨小市民的生活，由1976年起



張敏儀認為人要有根之餘，也必須要有一個世界觀，盡量爭取機會去看看世界。既然生於這個世界上，就應該認識一些普世價值的東西。



# 香港 百人

076

也開始用菲林製作寫實影片，例如描述大埔元洲仔船屋區惡劣生活環境的《元洲仔之歌》。到了 1978 年，香港電台更拍了一套很出色的社會寫實劇——《橋》，講的是在這個社區內，居民為了一座天橋，與政府抗爭的情況。

七八十年代製作的《獅子山下》，反映的是草根階層力爭上游、不屈不撓的精神，現在時代不同了，張敏儀覺得今時今日的獅子山下精神明顯變了質：「今時今日，整個社會結構已不同了，年輕人的出路也少了，整個社會結構無可否認是向官商傾斜了，一般人都缺乏機會。如果再用獅子山下精神，來叫人忍耐等待，已不是一個公道的方式。今時今日的香港精神，是表示你在忍耐的同時也要去爭取你應得的合理社會環境。」

張敏儀主政的港台，亦開創了另一得意之作《城市論壇》，至今仍在播放。《城市論壇》開播第一日便下大雨，張敏儀憶述：「我們開張大吉的日子那天有四個嘉賓，主持人吳明林站在水中，一個人訪問四個人，並開始討論，原來預備給觀眾的椅子，沒有一個人坐。」

第一任主持人吳明林也笑說：「通常好事的開始都是艱難的，這個屢試不爽。」

## 不做政府的喉舌

吳明林認為張敏儀做處長期間，能夠讓同事自由發揮，並沒有用公務員的模式去管理。張敏儀坦言當時的同事心底裡都希望做好傳媒工作，所以不用政府部門的方式去管理。張敏儀覺得任何傳媒工作的主事人，無論是報紙、電台或電視，都應該以創作自由為第一目標，尤其是選題方面，一定要給予同事最高的自由度。

張敏儀強調公營廣播就是要有一個機構是不受商業壓力之下，真正直接為市民服務。當然，有很多人都有種種不同看法，但她想強調香港電台做公營廣播機構，並不是一廂情願。

人稱「張大姐」的張敏儀不知不覺已經離開廣播處長這個職位約十二年。當了廣播處長十三年，張敏儀說難忘的事很多，但要數最有歷史意義的，絕對是 1997 年統籌香港

回歸活動。

張敏儀說：「雖然香港的傳媒平日彼此間都會有鬥爭，但在回歸這件大事上，卻是表現得非常合作的，所以當日整個儀式都很成功。香港根本沒有人抗拒回歸，只是希望回歸後保持到一國兩制。這個大前提下，香港那些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所以當時的儀式，令我覺得很感動，很多同事在十二時都有流眼淚，包括我自己。」

香港主權順利由英國移交給中國，各電子傳媒也完成記錄移交的歷史任務，但張敏儀透露，在統籌回歸活動期間，發生過一段插曲：「7月1日之前，有一位很資深的人大代表跟董建華先生說香港電台信不過，恐怕香港電台會幫英國政府，不知道會在回歸期間做些甚麼。董先生很好，他叫了當時最高級的統籌官員，那位資深人大及我坐在一起，然後請那位資深人大直接跟我說他的顧慮。聽了那位資深人大的話，我便叫他不用擔心，並保證我們會專業辦事。在這件事上，我很感激董先生，他能夠對我明言某些人的顧慮，真的是處理得很好。」

香港電台成立超過八十年，一直致力維護編輯自主，爭取成為有別於官方喉舌的公營廣播機構。1986年，廣播事務檢討委員會提出讓港台轉型做財政獨立、自負盈虧的公營廣播機構，脫離政府，當時的律政司唐明治也有在立法局作出宣佈：「香港電台將來應是聽命於一個港督委任的獨立董事局，董事局應反映市民意見及確保香港電台獨立自主。」

只是要實踐抱負，似乎並非想像中那麼一帆風順。張敏儀透露：「在1986至1988年期間，我們召開過很多公營廣播機構檢討委員會，當時整個廣播界，以及學術界傳媒系的教授都來參加，討論正式的公營廣播機構應該怎樣做，及其成立的方式，最後得到的共識就是港台應該轉做公營廣播機構。1989年後，整個香港都不同了，關於政制的爭論成為了最重要的問題，尤其是1992年彭定康來了之後，所有不關政制的議題都要擱置。回歸前後那些年，的確有很多人覺得香港電台是『非政府喉舌』，他們認為香港電台應該做政府喉舌，但是關鍵是我們根本不想做政府喉舌。」

# 香港 百人

078

回歸之後，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不少人擔心香港的言論自由會倒退，張敏儀表示鄧小平當初很有智慧地提出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概念，但她覺得期望五十年不變是有點不切實際，因為她認為一定會變。現在中國經濟、國力強大，但是在人權自由方面卻仍然很落後，而香港其實已有相當不錯的基礎。以前有很多人喜歡說立足香港、放眼祖國、背靠祖國，這是一個優越的條件，但絕對不能因為回歸祖國，便忘記了香港過去數十年，很難得地在中英狹縫之間生存下來而得到的那些值得保存的核心價值。

## 永不放棄

1999年，向來支持民主自由及致力推動香港電台走向公營的張敏儀，忽然被調任到日本，做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首席代表，不少人都將事件與政治聯繫起來。驀然回首，張敏儀覺得，當時離開是合時的：「我離開這個職位，那可以讓我的繼任人有比較好的環境，繼續努力下去。」

張敏儀離任廣播處長一職，先後由同是港台出身的朱培慶及黃華麒擔任。但朱培慶在2007年捲入醜聞，被迫提早離職，而黃華麒也於2010年以健康理由，決定不再續約廣播處長，這個職位由2011年2月一直懸空。

張敏儀表示：「這數年香港電台經常有變動，因為那些所謂關於公營廣播的檢討，不斷在進行。我很佩服也很感激工會的同事，他們不斷努力爭取，在惡劣環境之下也不放棄。時常有爭論，感覺上很混亂，而且時常換人，好像很折騰，折騰到我也很擔心香港電台的人士氣會受影響。香港電台最值得珍惜的是一種『公營廣播機構的精神』，目前這個階段好像走了回頭路，倒退了，但只要整體的工作精神及宗旨還維持著，就一定會有機會再向前行。」

## 旅行的意義

前廣播處長張敏儀退休後，每年有超過一半時間不在香港，周遊列國、尋幽探秘成為了她的「例行公事」。

張敏儀透露自己很喜歡一個人旅行：「因為只有獨自一人，沒有同伴可依賴時，你才會去跟陌生人溝通，而且需要去看清楚周圍的環境。」

每個人對旅行的意義，都有不同詮釋，作為世界公民，張敏儀認為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認識普世價值相當重要，故旅行期間除了參觀歷史名勝之外，遨遊書海也成為她的指定動作。張敏儀認為「行萬里路」是不足夠的，同時也要「讀萬卷書」：「不一定要讀很嚴肅的作品，起碼讀一些有關當地風土人情的。旅行時，我經常帶著一本書，例如我到巴黎時就帶著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寫的是他住在巴黎的生活，就坐在咖啡室讀起來，令我覺得好像自己也有份參與他那時的生活。」

雖然喜歡到不同的國家，接觸新鮮的事物，但無論曾到過多少不同的地方旅行，張敏儀始終覺得香港才是她的家，每次旅行完回到香港，都會感覺到這是自己成長的地方，那感覺是與旅行的不同。

# 曾鈺成

## 民建聯創辦者



### 立法會主席的挑戰

1947年，曾鈺成生於廣州。曾鈺成曾任香港培僑中學的校長，以及民主建港聯盟（簡稱民建聯）（後與港進聯合併成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主席。現任香港立法會主席。

跟上一屆主席范徐麗泰不同，曾鈺成來自民建聯，有政黨背景，這會否令他執行議事規則時，有另一套標準？在曾鈺成當主席的那一屆立法會，擲東西或其他激烈的爭辯場面常常出現。不過，由最初擔任主席到現在兩年多，曾鈺成形容要處理這些場面完全沒難度。

他說：「對我來說，界線其實很清楚，我獲授權為了保證會議順利進行，若有些行為據我判斷是會妨礙會議進行，或會使會議無法繼續進行的話，我可以作出制止，若制止不了就唯有把人趕出去。命令議員離開議事廳，剝奪其發言權是很嚴重的做法，所以不可以輕易做。以擲東西為例，我是不可以在別人仍未擲東西前，就說我懷疑你要擲東西，我命令你離開。」

熟悉曾鈺成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歡辯論，不少人更十分懷念昔日他跟民主黨的李柱銘，在辯論時的針鋒相對，現在當主席後卻要「封口」。不過，這給曾鈺成帶來了另一種



曾鈺成擔任議員多年，2008年當選為立法會主席。由議員轉做主席，少了在議事廳的唇槍舌劍，少了就種種政策或社會問題發表意見。驟眼看來，曾鈺成的工作輕鬆了不少。其實，挑戰從來沒間斷。

滿足感，他認為：「做議員可以在辯論中去表現，而主席的表現，公眾、議員卻未必看得到。例如當一個議案送進來，不論是政府或議員的議案，都要決定是否符合議事規則，從最初的複雜到慢慢理順，從而得出結論，清晰知道那些事應該怎樣處理，過程也是很有趣的。」

曾鈺成從政前是教書的，與學生接觸較多，亦喜歡跟學生傾談，故有時候曾鈺成會親自帶領學生到立法會參觀，為他們講解，他覺得：「立法會有參與公民教育的責任，於是請秘書處安排，招呼團體或學生到場參觀，聽聽他們對立法會的看法，解答他們的疑問。每次聽完這班未來主人翁的獨到見解，對我都有很多啟發。」

擔任主席，工作有所轉變，但不變的是曾鈺成仍然每星期都會抽時間，到區內不同的公園晨運，順道接觸市民。曾鈺成說：「我覺得做運動是一個跟街坊接觸的好形式。因為早上大家心情較好，有時會聽到意想不到的意見。我很珍惜這些機會，因為主席的身份，曝光機會多了，大家一見面就有熟悉的感覺，所以不用再自我介紹。」

曾鈺成所屬的民建聯過往經常被嘲弄，指靠搞蛇宴、搞旅行去換取選票，但曾鈺成覺

# 香港百人

082

得無論是逛公園，還是舉辦這些活動，只不過是爭取與市民接觸的機會。他認為只要市民感受到你是真心真意在幫助他們的話，就會投你的票，而那些就是走不了的「鐵票」。當然，他清楚知道不是辦辦蛇宴、搞搞旅行就可以拿到票的，只是覺得跟市民去玩玩，一起唱唱歌，讓他們認識你，而不是整天板起臉孔談政治，這對於和街坊建立有血有肉的關係是很有利的。

## 愛國心

與街坊建立的情誼源於從政，而從政的起步點，就源自大學時期培養出來的一份愛國情懷。曾鈺成說：「我父親是在中華總商會工作的，現在聽起來很具政治性。1966年是我人生的轉捩點，當時我正就讀大學二年級，那是我第一次跟媽媽回廣州，那時內地整個社會的風氣很純樸，真的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回港後，我到處對人說，祖國原來是這麼大，人原來是這麼好，但同時也知道中國仍然很落後，而且常被人欺負。當時國家剛和蘇聯反目，我就想到底我可以做些甚麼有意義的事，可為國家盡一分力。」

曾鈺成對祖國充滿熱誠，希望畢業後可回祖國發展，可是命運並非如此安排。當時曾鈺成經朋友的介紹到培僑中學教書，培僑與大陸有很多聯繫，故曾鈺成想先到那裡工作，乘機了解大陸的情況，希望待文化大革命完結後，可以找機會回內地工作。怎料文革進行了十年，所有回內地的計劃也落空了。

## 組黨從政

雖然回祖國發展的計劃未能實踐，但曾鈺成在香港亦積極實現自己的夢想，透過從政繼續愛國愛港。民建聯可以算是曾鈺成踏上政壇的第一個舞台，這個舞台由他一手一腳親自搭建，動力來自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曾鈺成說：「當時有三個有親中背景的候選人，其中一個是程介南，我幫程介南做助選事宜。結果三個都落敗，我記得當時有個普遍的說法——那次選舉的結果證明親中就是票房毒藥，你跟中央政府有任何聯繫的話，又或是中央政府對你好的話，就是死亡之吻。於是，我們幾個人坐下來研究怎樣組織政黨，計劃將來的參選策略，明白到必須要凝聚我們的力量。」

有了組黨的動機，曾鈺成聯同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積極籌備。到 1992 年，民建聯終於成立，亦開始活躍起來。不過於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當時的「四大天王」——曾鈺成、程介南、譚耀宗及陳婉嫻，只得陳婉嫻當選。

到了 1998 年，他們再接再厲，終於取得突破，「四大天王」全部晉身議會。在之後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民建聯都取得不錯的成績，亦慢慢拓展地區工作。不過，民建聯在 2003 年經歷了一個重大打擊，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其中當時的副主席葉國謙以六十四票之差，輸給空降的「泛民」何秀蘭，當時身為黨主席的曾鈺成決定辭職。

曾鈺成憶述：「2003 年我們當然碰到很多問題，例如二十三條立法和『沙士』。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但有些事情投入了之後，會令你對公眾的反應，對周圍不同的意見，陷入盲目狀態，警覺性也降低了。其實，2003 年區議會選舉的結果，可以說是敲響了警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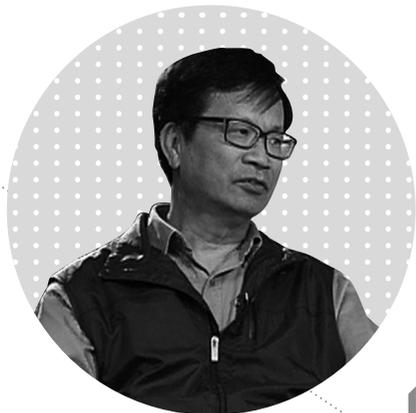
2003 年的選戰固然重創民建聯，到了 2004 年的立法會選舉，他們又要面對另一個難關，就是接任主席的馬力在報名參選後證實患上癌症。不過，在港島區，民建聯最終依然取得兩席。到 2008 年，曾鈺成轉戰港島區，夥拍蔡素玉，雖然當選，但就經歷了他口中最難過的一場選戰。他表示：「我事前的確對港島這場仗估計得太樂觀，以為無論如何都可以拿到兩席。怎料最後只得一席，這真的令我很內疚，我從來沒想過我來到港島後，令蔡素玉輸了。我覺得我搶了她的位置，我覺得自己欠她很多。」

當年跟曾鈺成一起創辦民建聯的兄弟，都覺得今天民建聯的發展，比當年的預期好很多。根據曾鈺成所言，他們當初成立民建聯時，自己也不知道民建聯可維持多久。

回顧從政之路，曾鈺成坦言有得亦有失，不過走到人生這個階段，無論對他個人，還是民建聯來說，他都無怨無悔。

# 鄭耀棠

## 「打工仔」發言人



### 九叔精神

鄭耀棠在香港土生土長，曾經在高主教書院讀書，成績不俗。由於家境關係，作為家中「老二」的鄭耀棠，十四歲已出來打工，做酒店門僮。當時，中環置地廣場前身是高級酒店，在那裡鄭耀棠見過很多不平事，英國人對中國人十分歧視。在那裡，鄭耀棠認識了一位改變他一生的同事——香港洋務工會主席胡九。鄭耀棠說：「那裡有很多古怪的規例，例如你洗碗打破碗碟，除了要賠錢，還有其他奇怪的規定。一有這種情況出現，九叔就會出頭去理論。我覺得他真的很為人設想，希望自己長大後能夠像他，於是就參加了工會。」這個時期開始，鄭耀棠立志要改變打工仔正面對的不公平及種種遭剝削的困境，於是他下班後經常到他最喜歡的「蒲點」，即是當時位處德己笠街的洋務工會會址，在那裡學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和處理勞資糾紛的方法，對中國和香港社會的狀況，以及工人的生活狀況有了更多的了解。

由參加工會開始，鄭耀棠就秉承「九叔精神」為工友服務，二十三歲之齡就成為洋務工會宣傳教育部副部長，三年後更成為工會副主席。為了保障工人，他要熟讀每條勞工法例。工會副主席是一個「一腳踢」的職位，探訪會員、收會費，以及處理勞資糾紛的各事項，包括帶工友去勞工處、與僱主理論、被解僱時的補償方法等等，若技巧不夠，「教路」教得不好，都會直接影響工友可得到的利益。



鄭耀棠投身工人運動超過四十年，現時是工聯會會長，亦是香港的權力核心行政會議的成員。不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第一次接觸工會的鄭耀棠，只是一名基層工人，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一生投身工運。

## 晉身工聯會領導層

參與洋務工會超過十年，鄭耀棠工作成績及熱誠逐漸受到肯定，工會決定派他參選母會工聯會的領導層，結果鄭耀棠在二十五歲時成為了工聯會歷來最年輕的副理事長，土瓜灣的工聯會總部便是鄭耀棠在工運生涯中接受進一步磨練的地方。

鄭耀棠表示到了工聯會，思考問題的模式，不再是鉅細無遺，而是比較宏觀長遠且全面的。每要制定一個政策，都要考慮這政策是否有利於所有打工仔的利益。主要的戰場由勞工個案轉移到勞工政策及立法範疇，以往用於談判的技巧，以及累積回來的經驗更加可大派用場。當中以上世紀八十年代爭取訂立長期服務金一役，給予鄭耀棠不少鼓舞。對於 1982 年港九工會聯合會關於工人權益問題的記者招待會，鄭耀棠的看法是：「難度在於要討價還價，結果是在非正式會議中勞資雙方展開討論，那時大家並不是在展示立場，而是坦白地說出難處，僱主有何困難，工人底線在哪，結果大家一人讓一步，於是 1985 年法例就順利通過了。」

1995 年立法局選舉，原本代表勞工界的譚耀宗轉戰直選，鄭耀棠代表工聯會參選，保

住勞工界的一席。回顧在立法局及臨時立法會工作，鄭耀棠反而認為掣肘太多：「我感覺那兩年所花的精力與回報不成正比，說得難聽點只是『空談』，政府並沒有理會。有時也會氣餒，花那麼多精力去構思，又示威又用其他方法爭取，但沒有一項是成功的。」

離開立法機關之後，鄭耀棠繼續推動工聯會轉型，由以關注基層工人為主，擴闊到關注民生事務。今日的工聯會已經不只是一個勞工團體，不但有婦女普通話班，亦有美容師課程，就連燒臘師傅課程也有，希望滿足不同會員的需要。由 2004 年開始，工聯會的足跡更去到廣東，在廣州、東莞及深圳都有服務中心。鄭耀棠透露：「有時香港人在內地有事發生時，會感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於是向國家提出在內地設立服務中心，協助港人處理遺失證件、『爛尾樓』、房地產等問題，甚或家庭上的需求。」

## 工聯會與政府的關係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前，鄭耀棠在曾蔭權的競選造勢大會上公開力挺曾蔭權。在政府就 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公眾期間，鄭耀棠亦牽頭成立「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收集超過一百萬個市民簽名，支持循序漸進推行普選。鄭耀棠的言論及政治取態經常被視為是親政府，不過鄭耀棠表示：「對政府，我們只能採取『合作團結，批評監督』的措施。若政府不肯立法，勞工權益也就得不到保障。所以很自然地我們要與政府合作，但是政府施政時我們必須要監督，監督政策有沒有偏離或者太維護資本家利益，不顧基層利益。作為工會團體及基層團體，一定要監督政府，對政府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評。」

鄭耀棠表示回歸之後，政府對工會取態有很大轉變，雙方有更大的合作空間。2002 年 7 月 2 日，鄭耀棠說：「因為現時的失業比較嚴重，我亦看到失業率未來會飆升，我希望能藉著在工聯會數十年的經驗，向董先生（董建華）提出這些建議。」在 2002 年，鄭耀棠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不但行會中有勞工界聲音，亦間接促成最低工資立法。

不過鄭耀棠亦認為今日政府雖然對勞工權益關注多了，但仍然未能真正為民紓困。新一屆行政長官將會於 2012 年誕生，鄭耀棠坦言現時香港的退休制度不夠理想，希望新

特首可以優先處理勞工福利，包括研究訂立全民退休保障。

本身是選舉委員會成員的鄭耀棠，與幾位被指是下屆特首熱門的人選都相識多年。他表示難以憑他們的背景判斷哪位人選比較適合，無論是誰當特首也好，都要有能力化解勞資雙方的矛盾。鄭耀棠認為：「工黨上場不等於能夠保障工人利益，反之，商界上場也不等於不維護勞工利益。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這個行政長官有沒有智慧，有沒有廣闊的胸襟，有沒有膽識可以平衡各方利益。香港回歸只是十四年，十四年內基本上整個制度也是沿襲過往的制度，所以很多觀念和制度，不能一下子改變。因此，新行政長官上場時，必須考慮如何能在一個多元化社會兼顧各方利益，以及達至平衡。」

## 維護打工仔利益是永遠的任務

隨著時代變遷，不但工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工聯會在政壇上的角色亦不斷演變，包括連續數屆都派人出選立法會直選。工聯會亦規定，他們的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只可以在功能界別當一屆，要連任就要參加直選，鼓勵工會領袖打穩地區陣腳。2012年立法會選舉新增多個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議席。鄭耀棠希望開創工聯會先河，在五個直選選區、勞工界及區議會界別都派人「搶灘」。

鄭耀棠表示：「藍領的工人愈來愈少，白領的專業人士愈來愈多，所以隨著經濟轉型，我們工會自己不轉型，就會『陰乾』。當然隨著香港政治化的發展，《基本法》也很清楚寫明了香港民主政制循序漸進發展，所以作為一個工會組織，我們必須在議會內有代言人，為我們工會發聲，所以會員會強烈要求，工聯會派人出來參選。」

不過機會當前，鄭耀棠表明不會參選，他表示始終喜歡做他的「老本行」，就是工會的實務工作，以及一些宏觀的發展研究工作，再加上自己的年紀已不小，應把機會留給更年輕、更有活力、更有朝氣的知識文化份子。然而，在商業社會中，「打工仔」面對剝削依然無日無之，鄭耀棠表示只要有氣有力，這場為工人打的仗，依然會打下去，因為努力爭取維護打工仔利益是永遠的任務，目標尚未完全達到，更需要加倍努力爭取。

# 李麗娟

## 眾人契媽



### 懷着理想入政界

李麗娟退休前在政府機構工作了超過三十年，然而沒多少人知道她當初加入政府機構，其實是源自讀大學時的一份信念。大學時李麗娟修讀英國文學，了解多了英國歷史，知道英國的制度怎樣演變，就是在君主制度中加入一種民主成份，因此她經常覺得這個香港殖民地政府也需要有些改變。於是，她就申請加入政府機構工作，做了一年行政主任後，翌年便考到政務主任。

由港英殖民地政府到特區政府，李麗娟經歷過四個港督、兩個特首，做過立法局秘書處、政務總署、民政事務總署等多個部門。她在民政署工作，接觸得最多的就是市民，是名副其實的父母官，夾在官民中間，往往會感到左右做人難。不過，多年來她已從中悟出一套為官哲學：「我覺得官威不是必要的，想得到別人的尊重，並非要威風，威只會令市民產生恐懼，但恐懼並不是一個我們想市民有的感受，因為要得到市民的尊重，我們要對市民好，當他們覺得你好，就會尊重你。如果更上一個層次的話，就應該身先士卒，有困難應該自己先去解決，不要只道出問題，然後命令下屬去處理。」

在政府機構工作了三十多年，除了民政工作之外，李麗娟曾先後三次擔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由三十年前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政府委任，到了八十年代出現間選，九十



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李麗娟，人人都叫她「媽打」，不少香港人對她的招牌笑容依然記憶猶新。她坦言：「我從來都沒離開過群眾，喜歡跟市民一同分享，我覺得這樣勝過留在辦公室裡分析、分析、分析。坐在辦公室處理文件，很多官員都可以做得好，但是若官員可以多與市民接觸，那麼現在就可能不會有政策被人批評為不切實際了。」

年代又引入直選，李麗娟都一一見證：「我見到香港的制度一直在演變，這令我對政府更有信心，因為見到它是可以演變的。」

回歸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選舉方法，在議會間遲遲未有共識，功能組別議席的存廢更惹來極大爭議，政改落實時間一再延遲，李麗娟認為：「政改到了 2011 年才終於發生，我覺得是遲了數年了。我認為每十年應該改一改，每隔十年可以邁前一步才好。因此，2005 年政改未獲通過，我是有些失望的。」

## 帶頭爭取男女平等

與人相處是李麗娟的強項，這可能從小培養出來的，她在家中九兄弟姊妹中排第五，上要尊重兄姐，下要保護弟妹。自小就凡事為人著想，長大後，更帶著這種性格進入政府機構。

七十年代期間，政府聘請公務員仍然是重男輕女的，男女薪酬福利相差甚遠。對此，李麗娟看不過眼，決定聯同當年一班女官員包括陳方安生、霍羅兆貞、丘李賜恩、陳

# 香港 百人

090

馮富珍等，力爭女性公務員權益，「手袋黨」自此名滿官場。

1978年，「手袋黨」更成立女性高級公務員協會，李麗娟是第六任主席，幾經努力下，她們成功爭取到男女公務員同工同酬，不過這仍算不上成功，因為全面平等才是她們的最終目的。李麗娟指出：「雖然每月薪金已經平等了，但福利仍未平等，所以我們就成立了工會，未到四年就爭取成功了。我們三十多年前所做的，不只是我們得益，還有後來進入政府機構工作的女同事，只是現在很多在政府機構工作的女同事，根本就不知道這故事，不知道平等的男女福利原來是要爭取的。」

## 以民為本

三入三出立法會，李麗娟學會的是議會文化，接觸的是政要議員，但是「媽打」心目中最享受的是和民眾共聚的時光，無時無刻記掛的亦是市民。

2002年，李麗娟上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一年後，令近三百港人染病死亡的沙士疫病爆發。當時的特首辦主任、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林煥光，說起抗疫往事，對李麗娟這個昔日下屬仍然讚不絕口：「當我們決定要封鎖淘大花園，遷移居民到鯉魚門營地時，我們需要非常大量的人手去做游說和搬遷工作。我就親自打電話給 Shelley，請她幫忙。她二話不說，就呼喚同事，組織一個義勇兵團去處理。她身先士卒，穿上保護衣，走到前線指揮整個行動，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沙士一役，一幕一幕生離死別的情景震撼著李麗娟，她與當年的社署署長林鄭月娥、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及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一同成立「護幼教育基金」，為七十多名沙士遺孤，籌得八千多萬元教育及生活費，再一次印證「媽打」「以民為本、將心比心」的為官哲學。

在官場，可以說是平步青雲，但婚姻路上，李麗娟卻遇上極大挫折。2000年她與丈夫感情出現問題，結束了維持三十年的婚姻。剛剛離婚的時候，她忍著眼淚，挨過了最痛苦的時刻，她說：「If God closed a door, he will always open a window（如果天主關了門，祂會打開一扇窗），婚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並非所有。我還有我的事業，很好的子女，還有許多許多朋友。」

## 處處為人的「眾人契媽」

李麗娟處處為人著想，人人都叫她「媽打」，成為「眾人契媽」。對內，她為同事福祉奔走；對外，為全港市民處理無數大小危機，做過很多與市民息息相關的決定。

1996年2月，八仙嶺山火圍困了一班沙田馮堯敬中學參加遠足的師生，導致五名師生葬身火海，十三名學生燒傷。當時是政務總署署長的李麗娟，趕到醫院探望受傷的學生，提供即時援助，待他們康復後，更跟他們上契，這個「契媽」一做就十五年。

這班契仔契女，今日都已經長大成人，當年六成皮膚燒傷的張潤衡，得到「契媽」的鼓勵及支持，不但給他提供意見，又為他找來獎學金資助，令他可以到美國完成大學課程，成為心理治療師。

2009年，張潤衡獲選為傑青，他第一時間想起的就是「契媽」，立刻致電跟「契媽」分享這個喜悅。張潤衡與「契媽」關係密切，有何重要事情，他都會與契媽分享，包括升學就業、婚姻大事等。他說：「契媽應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人，我只是一個平民，她為甚麼可以這樣無私的幫助我？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很感恩。」

原來，「契媽」最喜歡與年輕人接觸，她的心得是：「與年輕人相處最重要是要有兩個T——時間（time）以及傾談（talk），有了這兩個T便可以和他們溝通了。年輕人是最有理想的，若他們發聲，我就希望多些在政府機構服務的人可以聽到。年輕人發洩他們的怨氣，並不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其實他們真的是希望社會有改善，走向好的一面，所以我們需要傾聽，我覺得即使是年輕人也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2005年，李麗娟因健康緣故退下火線，期間曾有不少私人機構嘗試邀請她加入，但她都一一拒絕，理由是：「如果一個機構產值已經是過千億，而每年最多為它多賺一兩億，那有甚麼意思呢？相反，一個一無所有的機構，每年若能為它籌到一些款項，讓它能夠訓練出更多社工，為更多老人家和孤兒提供服務，這樣對處於接近黃昏階段的我來說，是有意思多了。」退休六年，在不同的公益團體擔任公職，為慈善出心出力，對她來講，這一刻的忙碌，才是夢寐以求的享受。

# 何俊仁

## 民主黨的領頭人



### 「百厭仔」為香港前途挺身而出

何俊仁出身小康，年幼時經常令媽媽動氣，自認「百厭仔」，他透露：「小時候家中很熱鬧，兄弟們一起遊戲，一起去作弄別人。我們將家中任何可以變成玩具的東西，都拿來耍樂，甚至聯同鄰家小朋友四處跑，為鄰居造成很多麻煩，常常惹到媽媽很生氣。有這麼多節目，讀書自然會分心，成績不是太理想。」

到了中學階段，這個「百厭仔」轉了性，開始對閱讀有興趣，鑽研歷史名著，更在課餘時與一班朋友去聽著名歷史學家許冠三講課，漸漸培養出對民族、國家及社會的使命感。

何俊仁說：「一直以來，我都選讀理科，而且準備跟從大哥考醫科。可是，預科期間我的思想有了很大變化，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是有病，需要一些有政治能力，有政治理想的人，為我們的社會治病。我覺得需要為社會作出貢獻，糾正社會敗壞的風氣。」

1971年，何俊仁入讀香港大學法律系，當時已接觸學運及社運，畢業後順理成章成為律師，開始自己的事業，在追求公義的同時，對國家、社會更有使命感。何俊仁清楚知道：「將來我給自己的定位，不只是做一個律師，我不會滿足於只是執業。當時我有



在政壇打滾多年，何俊仁沒停過為基層爭取權益而奮鬥，爭取民主而努力，他堅定地說：「政改，從一個民主發展的角度去看是有利的，是一個實際的進步，以及可為五年來的政治僵局帶來新的突破。」

更大的志向，希望在社會上推動一些改革。」

八十年代，香港因為前途問題而民心動盪，何俊仁不理父親反對決定挺身而出，踏上議政之途，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論政組織。1990年何俊仁與李柱銘、司徒華、楊森、李永達等其他民主派人士，組織香港最早期的政黨——「香港民主同盟」，希望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

## 議政之途由紮根屯門開始

1992年在屯門區出選的港同盟立法局議員吳明欽，因為癌症病逝，何俊仁被安排參加補選，這是他第一次出選，司徒華也對他公開作出支持。結果因為欠缺地區關係，敗給代表鄉事派的鄧兆棠。

經過了三次的落敗，何俊仁歸納出原因：「若不深入地區工作，即使已有全港性的知名度，再加上組織的支持，也建立不到與選民的關係，所以當我選完第三次之後，就決定紮根在屯門區。」

在屯門開設辦事處，何俊仁每星期都會抽時間會見市民，提供義務法律顧問服務，到現在仍然堅持著。何俊仁憶述：「屯門地區偏遠，當時交通狀況仍很差，每次來回住處及屯門，都要花大約三小時，但我仍是定期每星期來三次屯門區工作。居民上班都起得很早，若我要在早上派單張，就要六時許去到巴士站，因為七時半巴士站就已沒有人了，我終於體會到那裡的居民要九時出市區上班有多辛苦。但我仍堅持到屯門工作，因為我深信長期的努力一定可得到居民的認同，而且對我亦會有一定的認識及感情。我自己也與這個地區漸漸結下不解之緣。」

1995年，何俊仁在區域市政局選舉中順利當選成為全港票王，同年亦當選為立法局議員，之後一直獲選連任。回歸後，於1998年特區政府首屆立法會選舉中，再次當選為議員，並連任至今。

何俊仁表示：「我這樣辛苦參與，是想成功讓自己能夠在從政生涯中踏前一步，對自己的組織打下一支強心針。當然每一個選舉，我都要花很多心力，不但要四、五時起床去到選區做宣傳，而且仍要應付我作為律師的工作。」

1994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併為現時的民主黨，何俊仁一直擔任黨內的核心職位，至2006年當選為民主黨主席，成功撮合和前線的合併，多年來一直努力工作。何俊仁說民主黨是黨員的第二個家庭，各家庭成員對彼此的信任及關懷是最重要的，大家要真誠相對，和而不同，珍惜彼此的友誼。

## 破冰會談政改風波

在2010年通過政改一事，民主黨對2012政改方案的支持，令身為民主黨主席的何俊仁備受批評。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就公開批評：「如果民主黨這麼快就通過替政改修補，我覺得不應該，應該先撤回這個方案，把這個又爛又臭的方案先撤回，然後再商討。」立法會議員鄭家富亦表示：「我無意強黨所難，批准豁免，亦不能夠強我所難，違背我個人的信念，我惟有正式退黨，離開與我共事十六年的黨友，在黨外繼續為終極普選而努力。」

面對多年戰友離隊，黨員集體退黨，有人甚至說政改令泛民四分五裂，何俊仁作出回應：「民主派內，的確有些組織對民主黨那次的會談極度不滿，甚至指摘我們自行採取這個路線，造成分歧以至分裂，甚至使用強烈的字眼，指我們出賣民主。然而，我相信這是基於當時的氣氛，大家對我們在很短時間內達成結果的方式感到質疑，質疑沒有足夠的蘊釀，也沒有足夠的透明度。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大家知道我們所剩下的選擇，就是要不要這個很辛苦才爭取回來的，一個可以向走前的成果。」

即使承受外間的重重壓力，但何俊仁仍然認為有需要帶領民主黨走前這一步，因為他覺得：「如果從黨的利益去看，我不容易作出評估，我只是很肯定政改，從一個民主發展的角度去看是有利的，是一個實際的進步，以及可為五年來的政治僵局帶來新的突破。」

民主黨走這一步爭取了五席區議會功能組別，何俊仁認為泛民應該好好利用這一個空間：「我們爭取到這個空間，希望大家要好好地利用。我絕對不會有一種這個空間是我們爭取的想法，就變了我們的專利，我樂意見到民主派都來參與。新的五個功能組別的選舉，如果提名方面，有某些政黨他有足夠的支持，但可能提名有困難，我們亦歡迎坐下來共議，希望盡量讓民主派在這五個新的組別中贏到多數議席。未來可能繼續會有不同路徑的選擇，不過不同的路徑仍然是向著同一目標，所以利用這種多元的鬥爭方法，來集結力量，爭取共同目標。因此，分歧絕對不應該做成分裂。」

2006年曾經被歹徒襲擊，重傷入院，但他並沒有因暴力威脅而退縮，更於2007年成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為了追求公義，他一直堅守崗位。

任何從政的人都知道自己受到很多自然的限制，何俊仁認為年齡就是一個自然的限制，當你年紀大了，就有些人會期望你應該退下來，而且自己也會感到體力有些不足。六十歲的何俊仁認為即使將來要退下政壇，但仍然會為爭取民主而繼續奮鬥。最後，他強調：「不做議員，或者不做黨的主席，不等於我離開了政治。」

# 梁錦松

## 銀行家出身的 財政司司長



### 「海上學府」喚醒國家意識

梁錦松的從政之路要從讀大學時說起。當年他考進香港大學的社會科學院，主修經濟及統計學，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被選中參加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所創辦的「海上學府」，整個學期乘坐郵輪周遊列國。

回望過去，梁錦松認為這次經歷令他獲益良多：「當時有機會拿到獎學金去環遊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那時可以圍繞地球走一圈，對當時十幾歲的人來說，可謂是大開眼界。」

這次經歷亦喚醒了他的國家意識，為他日後走入政壇埋下伏線。他說：「當時去一些只有白種人才可以去的餐廳，我心想，他們一定會趕我出來。怎料，他們看一看我然後問我是甚麼人，當我回答是中國人時，他們就說：『你是名譽白人。』他們會這樣回答，我覺得是因為中國當時已進入了聯合國，所以他們對中國人就另眼相看，沒有趕我出來。這令我體會到如果國家不夠強大，作為國民的即使是同種人，也會被欺負；國家強大的話，在外地亦會受尊重。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深刻的體驗。」

梁錦松在學生時代是活躍份子，在「火紅的年代」亦曾經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他說，



見到問題就要去解決，不要怕困難，也不要怕別人的批評及反對。梁錦松的性格便是如此，他說這可以說是膽大，也可以說是狂妄。正面來看，這樣的性格好處便是積極、敢作敢為。

籌備學生運動的經驗，為他後來無論在公職或在商界上的發展都奠下了基礎，包括組織力、說服力，以及較為廣闊的思考方法。他並且學習到，若要創新是需要宏觀地掌握不同數據，繼而從中看出脈絡、規律，最後才提煉出意見及建議。

### 推動教育改革不遺餘力

在香港長大和接受教育的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不遺餘力，取消小六升中一的「學能測驗」、提出大學要「三三四」學制等一連串重要的教育制度改革，都是由他親自操刀。

梁錦松認為在眾多教育改革中，改善直接資助計劃是他其中一項滿意的改革。有家長不看好本地教育，於是就選擇讓子女到海外接受教育，但梁錦松就堅持讓自己的小朋友接受本地教育，他認為這樣可令他們享受教育改革的成果。

他說：「我的女兒是一個本地小學生，我問女兒：功課多不多？（她說）有點兒多，（我再問）辛苦嗎？（她說）有點兒辛苦，（我問）開不开心？（她說）開心，然後我說這已經足夠了。因為我們所說的『樂意勇敢，樂於學習』，不等於不需用功、不刻苦，但最重要的是她可以享受學習過程。」

梁錦松的家庭生活，常常成為傳媒炒作的題材，身為三位小朋友的爸爸，他承認自己缺乏時間照顧他們。對小朋友來說，教育不單止是在學校，而是學校、家庭及社會三方面的配合。他說：「幸好太太可以有時間在家中教育小朋友，希望他們可透過跟同學、老師等各方面的接觸，三方面配合得到，希望他們長大後，可以做一個有用的人。」

雖然他認為經過一連串改革後，本地教育漸見成果，但現在本港學生最缺乏的是創新。他說：「小朋友要有批判性思考、創造思維，再將之轉化成一個理念、建議、產品，我覺得香港政府仍要思考怎樣令小朋友在創新能力方面有所加強。」

## 對香港經濟有寄望

除了對香港教育抱有期望，他對本港經濟也有寄望，希望本港經濟利用內地優勢發揮所長，他表示：「有些人會問現在香港經濟會不會過份依賴內地？我覺得這是值得檢討，因為畢竟內地是全世界無論外資港資，做投資還是貿易，都是兵家必爭之地，香港『近水樓台』，應該『先得月』，我們反應得太遲，如果我們能夠再早幾年跟內地合作多一些，香港反而更有利。」

他又認為，香港要對國家有利，才能夠保得住現在的經濟成果，以及政治上一國兩制的優勢。他說：「我們不只是要想怎樣跟中國做生意，而是應利用這個優勢，來做真正正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止是做中國的金融中心，也不止是做珠三角的龍頭，因為

珠三角很小，我們的眼界應該要更為擴闊，利用祖國支持我們的優勢，去做全世界的生意。」

## 減薪從政

梁錦松大學畢業後便加入美資萬國寶通銀行，由見習經理做起，但 1996 年他不願意調到紐約工作，放棄了晉升副主席的機會而轉職到美國大通銀行，繼續留港發展。梁錦松在商界足足工作了二十八年，直至 2001 年梁錦松應董建華邀請，由年薪過千萬元的銀行家轉做年薪只有四百萬元的財政司司長，他的親民作風曾經贏到不少市民的支持。

為何他甘願減薪而從政呢？他當時這樣說：「經常有人對我說，而我自己也深信的一句話是：你所賺的錢不是你的，你所花的錢才是你的。一個人花的錢不多，所以錢從來也不是我考慮的條件。」

當時香港經濟正陷於低谷，梁錦松接手這個「燙手山芋」，十年後回想起來，他坦言當時的難度比他想像中更大：「老實說，我在 3 月份接手財政司司長時，香港財政預算該年的財政赤字只是二十一億元，但最後卻是六百三十億元，這是預料不到的。」

於是，梁錦松推出多項開源節流的措施，他指出：「當時我們認為，最好在董先生任內處理好赤字問題，我們下定決心進行一系列的工作以減赤，減赤可以減開支或是加稅去達到，後來我們選擇了雙管齊下。」

在眾多措施中，最惹爭議的是削減公務員薪酬，當時引起社會上猛烈的批評。回望過去，梁錦松認為在處理手法上，其實可以做得好一點：「要公務員減薪，在政治上來看是很不智的，但這卻能夠讓金融界知道我們的決心，當時我也從多個層面去作出改動，包括綜援以加稅，可能在力度及速度需要再調整一下，能夠較多地照顧到受眾的感受，效果應該會好一點。」

## 「買車事件」

梁錦松做財政司司長期間，全力協助香港經濟復甦。不過「買車事件」，卻令他在政壇上留下了污點。當時他被傳媒揭發，身為財政司司長在公佈財政預算案前兩個月，在預知政府會大幅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的情況下，購入價值七十多萬元的豪華房車。外界批評梁錦松有利益衝突之嫌，質疑他的誠信。

梁錦松表示：「事後看來，我當時應該避嫌，不應該在稅項調整之前買車，但我的確有實際需要買車，完全不是為了避稅。作為主要官員，這個行為極不恰當，我在這裡向市民大眾致以最誠懇的歉意。」

事後，梁錦松雖然將加稅前後車價差額的兩倍，即三十八萬元捐贈予慈善機構，又解釋買車是為了太太以及即將出生的嬰兒，但仍然未能平息民怨。

最後，梁錦松辭去財政司司長一職，離開問責官員行列。當時，社會上出現不少對梁錦松的評論，當中有負面也有正面的。退出政治舞台已多年的他說，事隔多年，如果再給他一次機會，他仍然不後悔棄商從政，擔任財政司司長一職：「其實我本已知道公職不容易做，錢又不會多，壓力又大，但能夠有機會服務市民，是一個很大的福氣及榮耀，所以從這角度來看，雖然之後發生了很多事情，曾經有朋友也問過如果我預先知道之後會發生這麼多事，會否仍然接受這個任命。我說我仍是會接受，畢竟這個經歷可以『make a difference』，令生活有一些改變。我不會理會別人怎樣看，我自己覺得這是值得去做的事。」

## 從政後的人生觀

梁錦松認為投身政壇是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亦令他的人生觀從此改變。他說：「之後發生那麼多事，更要請辭離開政府，我覺得這是上帝給我最好的一個教訓，也可說是一個機會，讓我可以去學習謙遜。我覺得能夠在這一過程中，認識及學習到謙遜，便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得著。」

他直言自己並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家，得不到大眾歡迎：「套用一句中國人的用詞——『養怨』，即是把怨氣養起來。在商界上我們的性格或習慣就是，未有問題時就預計問

題，在問題未出現前已把問題解決了，這樣做生意的話，你就會順利很多，賺到很多錢；但在政治上，當大部分人都不覺得有問題的時候，而你走去做事或作出改變，別人就會說你多事。『養怨』，就是一些聰明的政治家，他們會等問題發生，甚至已經發生了也不去解決，直至天怒民怨時才出手，那麼全世界的人都會多謝他們。」

回望過去，雖然最後在仕途上不能畫上完美句號，但事件令梁錦松得到不少啟發。現在退出政壇，做回老本行，再次活躍於商界，梁錦松覺得經歷過政壇洗禮後，在考慮問題時顯得更周全了，不再如以往般只看後果，不重過程，特別是在國內工作時，會更多著重政策上的考慮，以及懂得採取更全面的方法。

# 梁振英

## 做大事當仁不讓



### 不可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梁振英負責監票。1996年，他被問到有否計劃參選特首，他在記者會上說：「有些評論說我是否有一個十年計劃，不做第一屆，不做第二屆，現在就已看著第三屆，如果新聞界朋友，包括今日在場的新聞界朋友，繼續問我第三、四次，到N屆答案都是一樣的。」

十幾年過去，隨著董建華在任期內以腳痛為由下台，以及曾蔭權任期屆滿，香港亦要迎接第四屆的特首。當年堅持N屆都不做特首的梁振英，最終決定參與競逐，就如2008年他說要看天時地利。天時就是氣候，地利就是土壤，無論做甚麼事情、甚麼生意，都要視乎有否適合的條件。

三年前，梁振英說要看天時地利人和，三年後的今日就說會「當仁不讓」。由第一屆開始，已經被視為熱衷於特首一職，但一直只是陪跑份子，跑了這麼多年，梁振英似乎不再甘心只做綠葉，開始發力，但作為測水溫的民望調查，梁振英就一直落後。

梁振英表示：「我過去一兩年，根據民調的結果，市民對我的支持度是逐步上升的，上升的幅度比較大，但是我並不會自滿。我認為市民的支持是重要的，如果比較不同人

盡力做到最好，是否一定能夠開花結果？梁振英花園的一棵桑樹，一早就結滿了果實，桑葉還可以為他飼養的桑蠶提供養分，但桑蠶何時才可以真正破繭而出？



的民望，我想現在還是比較早，因為幾個人的背景很不同，而且位置也很不同。」

梁振英之前曾公開講過當接近選舉的時候，每一個真正的候選人都需要提出他的理念、政綱、具體政策，然後再通過辯論，那麼屆時民望的參考價值將會更高。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訪港酒會中，提出未來特首的三大條件：第一要愛國愛港；第二應該要有很高的管治能力；第三在香港社會要有比較高的認受度。

雖然梁振英沒有說自己可以做到多少，但對於要如何做好一個地方的領導人，他的看法是：「任何一個社會的政治領導人，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找出這個社會一些深層次問題及機遇，並指出一個路向，然後凝聚社會共識去克服困難，利用這些機會來發展，過去幾年我自己應該是比較早指出香港深層次矛盾，即貧窮問題的人。」

他喜歡引述孫中山的一句說話：「不可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做特首究竟算是「做大官」，還是「做大事」？梁振英認為兩者並非對立：「孫中山並沒有將做官和做事對立起來，但他很清楚說出做官不是一個人的最終目標，做官是給你一個平台，去為社會、為國家、為人民做事，我一直以來都持這種看法。一個社會在不同的時間，便需要不同的領導人，當社會風調雨順時，可能需要一種領導人，當社會存在各式各樣深層次矛盾的時候，又或這個社會有很多機遇在我們手指隙中漏走，讓你掌握不到時，就需要另外一種領導人了。」

## 政治「抽水」

梁振英自信自己已經有具實力的班底：「從事公職二十多年，無論是行政會議也好，專業界也好，又或是在其他公職崗位上，二十多年的經驗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班子，問題是現在是否討論班子的時候呢？我過去數年在社會上所做的事情，以至我寫了大概五十萬字的文章，都是關於香港一些大大小小的政策，這些都不可能是一個人自己想出來，而是大家工作的集體成果，最後由我執筆。」

十年前，梁振英已經非常關注本港的房屋問題，當年說要停建居屋。十年後，時移勢

異，梁振英同意復建居屋。

梁振英曾直指政府近年在房屋政策上施政不力：「能夠點出這些問題是重要的，如果我們可以在早幾年，已經著手在社會上做些工夫，我相信今日香港社會的氣氛，就會緩和一點。解決房屋問題，雖然需要時間，而且過去幾年的確失去了一點時間，但是我看不到復建居屋有甚麼實施上的問題。」

看起來，好像頗有先見之明，連「八萬五」建屋政策，最近也一樣獲得「平反」。梁振英指出：「就數字或需求來說，到今日可能我們仍不需要這麼多。但社會說這個做法獲得平反，意思是說大家都覺得政府要有一個數，無論是兩萬、五萬都好，都要有一個數。有一個數後，政府才撥地建屋，供應社會。」

不單是復建居屋的問題，梁振英近期頻頻針對各項政府政策發聲。有人認為他是政治「抽水」，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應該遵守集體負責制，不應該每每對著幹，但他卻不認同這個說法。

梁振英認為：「行政會議與九七前的行政局一樣，其成員有責任在社會上發聲，也有責任將社會的意見帶進行政會議的決策過程中，當然亦有責任在社會上將政府決策的依據拿出來，跟社會人士分享。當然我們有集體負責制，但集體負責制根據《基本法》是在行政長官於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後，才有集體負責制。我相信大家不會要求，行政會議的成員在社會上完全沒有聲音。」

## 家庭角色不可代替

過去數年，數乎每天梁振英都要以不同的身份、各種的公職出席不同的公開場合，在公在私，時間都不夠用，但總要有一些取捨。他覺得人與人之間最重要是要有溝通，作為一個稱職的父親，當他的兒女仍在香港未到英國讀書時，每天早上他都親自駕車送他們上學，在車上聊天，晚上除了重要的官方應酬外，其他應酬一概謝絕，盡量爭取與兒女相處的時間。

梁振英覺得：「小朋友還小時，一定要投放多一點時間，這可奠下重要的溝通基礎，當他們長大了，彼此的溝通便會比較好。在時間安排方面，我犧牲的次序第一是自己的愛好，跟著是公司的的工作，然後是社會上的公職，到最後我才會犧牲家庭生活的時間。」

梁振英的三名子女，現時全部都在英國讀書。梁振英在 1974 年亦考獲獎學金，遠赴英國升學取得測量師資格，這除了為他日後事業奠下基礎，還為他帶來初戀，甚至家庭。他與同校師妹一見鍾情，順理成章地拍拖、結婚、生子。

事實上雖然公務繁重，到現在他仍一定會抽時間陪太太，亦放心將家中的事務全部交由太太打理。梁振英說：「工作、社會服務，是做不完的，而且你不做，有很多人可以代替你，但在家中作為丈夫、爸爸的身份，是沒有人可以代替的，所以我們都盡量抽時間相處。我太太本來是律師，但為了留在家中照顧三個小朋友，她辭職了。現在，家中的立法、司法、執法大權都集於她一身。」

## 忙裡偷閒

只是要從政就預備了要受到談論，甚至批評，梁振英當然也不可倖免。對號入座又好，正面交鋒都好，對於衝著自己而來的各種評論，家人會否有些微言？梁振英表示家人都抱持平常心，他們家的小孩都很清楚做公職是怎樣一回事，已經習以為常了。

不過，做人做事不應將神經拉得太緊，可能會有反效果，有時也要學懂舒緩，梁振英分享道：「小時候，我們一家住的警察宿舍有個露台，露台有一個花架，種滿了萬年青、月月紅、茉莉、桂花等等。當時，我沒有錢去買種子，於是夏天吃完荔枝、龍眼後，就將種子埋在花盆，跟著過了幾天它就開始發芽、長苗，青蔥翠綠的，看著很漂亮，感到很開心。長大後，我也很喜歡種花，每晚工作持續一段時間後，我就會走出花園去輕鬆一下，在花園耕種半小時，出一身汗，然後跳進泳池游泳，過上半小時至四十五分鐘輕鬆的時光，然後返回書房，繼續工作。」

除了是忙裡偷閒，這一個嗜好原來還有另一種意義。梁振英指出：「孩子年紀小時，我

叫他們一起到花園耕種，種菜、種粟米，讓他們不要害怕用手去觸摸泥土，亦令他們知道稼食艱難，耕種需時三、四個月的粟米，吃兩餐便吃完了，讓他們知道不應浪費食物。」

耕種既是親子活動，亦是身教，同時印證了性格要從小培養的說法。另外，梁振英從享受園藝的樂趣中，亦悟出做人的道理。他認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人生各方面的收穫，是不存在僥倖的。而且我們中國人形容農夫工作時要背脊朝天，是需要付出辛勞的，我便是那種不怕辛苦的人。」

不怕辛苦，但是否要自討苦吃，有很多事情都可能是吃力不討好的。梁振英說：「如果一些沒有難度的事情，大概不需要我去做，但遇有困難時，我會迎難而上，爭取最好的成績。」

# 陳智思

## 香港公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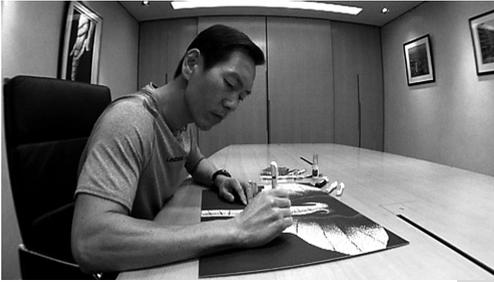
### 無心從政到扶搖直上

無論從政，還是擔任多項公職，陳智思說全屬偶然，回想 1998 年進入議會，亦是無心插柳。

1998 年，保險界第一次有立法會的議席。陳智思覺得自己對保險不是太熟悉，整個界別認識他的人也不多，再加上對政治又不認識，沒有信心去參選，但後來被游說了很久、很多次，才覺得可以去試試看。

經過選舉，陳智思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他形容自己上了速成班，而他的從政路亦從此扶搖直上，2000 年及 2004 年，他都在無對手競爭下自動當選，2004 年 11 月，更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參與選舉加速了陳智思對業界的認識，加入議會就令他明白到何謂政治。

2003 年，「沙士」來襲，香港人心惶惶。陳智思說：「當時我有很多朋友，也包括商界的朋友，紛紛離港，或將家人送到外國暫避。當然，作為公職人士，我不可能這樣做，亦不容許家人這樣做。其實我的次子，是在 2003 年 3 月出生的，那時最高風險的就是醫院，所以十分難忘。那一年的『七一遊行』，有些朋友跟我說，看到我的照片在



陳智思是前立法會議員、前行政會議成員、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社聯副主席等，公職之多令他贏得「公職王」的稱號。他感到很幸運，能夠得到這麼多機會，令自己的眼光變得更全面、更廣闊。

遊行中被打了大交叉。我心想究竟我做錯了甚麼，我每次都是從心為香港去做，為何會淪落到這個地步。當時真的很大感觸，因為我從來參政，都不是完全從政治角度去參政，但當進入議會你就沒有選擇，就是會被人醜化。」

## 為各界製造橋樑

踏上政治舞台，或許有時會身不由己，但藉著這個舞台，陳智思亦開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出任社聯主席令陳智思由從商到認識香港的弱勢社群：「我想我未參與公職前，其實對香港的認識是非常單薄。我來自商界，十年前我參與社聯時，大家都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商界有自己的一個世界，弱勢社群也有自己的一個世界，而不同世界的人是彼此不理解的。」

為了加強溝通合作，陳智思致力推動商界及社福界合作，製造橋樑，著力鼓勵工商及公共機構關懷社群，從而減少社會矛盾。

陳智思說：「其實，很多商界的人都以為綜援都是給失業人士申請的，以前我也和他們

一樣不知道原來綜援的申請者，是以獨居老人為主。雖然當中也有失業人士，但基本的資料大家都沒有，所以我就製造這個平台希望讓不同的群體，可以有接觸彼此的機會。當然這只是個開始，但若當時沒有這樣做的話，今日仇富仇商的情況，可能會更加大。」

以捐款為例，陳智思覺得很多商人或企業以為解決貧窮的方法就是捐錢。其實捐錢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捐了給哪些人，會提供哪種服務，社會出了哪些問題。他們只知道有窮人，但並不明白為何會有窮人，是否因為工作機會少了，是否整個社會模式都轉變了才令他們失去工作機會。所以陳智思希望可以逐步改變商界的看法，明白凡事不只是用錢就可以解決。

隨著參與社聯，陳智思關注的社會事務範圍更廣泛，除了社會福利外，改善生活質素、教育等幾個範疇，他都積極參與。從參與古物諮詢，活化歷史建築，到研究香港的可持續發展，以至擔任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等多項公職，令陳智思有了更深的反思。

陳智思坦言：「以前在金融界，弱勢社群的問題並不是我的問題，是政府的問題。因為現在我做公職，這些問題才變成我的問題。我明白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是需要解決的，同時亦體會到在位者之苦。我覺得我已經盡了力，即使我覺得我做的決定是適當的，但亦可能有很多人會繼續批評你。因此有時會覺得不值得，為何我付出了這麼多，還是不能滿足所有人。我想做得愈久，我就可以愈適應這個現實。」

陳智思亦替為官者難過：「最近看到很多政策出爐，其用意是很好的，但社會上永遠都會有一批人是持不同意見的。社會上也會產生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由傳媒、政黨，到八十後九十後，都有很多批評。因此，政府官員間形成一股風氣，都不做那麼多了。因為愈做得多，就會為自己帶來愈多麻煩，做出來的新政策，如果未想清楚，或者整個配套不夠完善的話，推出來肯定會被罵。所以，處於一種做又被罵，不做又被罵的兩難情況下，我完全明白很難找適當的人去參政，這對香港來說不是好事。」

## 意外收獲

雖然工作排得密密麻麻，但陳智思仍然投放不少時間於公職上。

陳智思每天都要做帶氧運動出一身汗，人才會有精神，所以他每天早上都會花兩小時，在健身室享受他的私人時間，若早上七八點不幸地要開早餐會的話，那五時前就要起床。陳智思說：「最初我開始健身是因為身體問題，我以前比現在重五十磅，最重時是二百零九磅，看到自己愈做愈健美，所以上了癮。」

陳智思所講的身體問題，是在他大學時期發現的，當時醫生證實他患上血管收縮症，令陳智思不能上學，要經常進出醫院，亦令他創出一門秘技——點畫。陳智思本來是讀經濟的，但學分不夠，後來想到藝術科不用回校上課，又可以取學分，於是便於被病魔纏擾的那段時間，努力修讀藝術，後來回校時才可繼續學業，而且也令他對藝術產生濃厚的興趣。

決定轉系之後，陳智思又要面對另一個難題，就是大學畢業禮的展覽。陳智思說：「因為我並不是一個有藝術天分的人，也沒有基礎訓練。如果我做與其他同學一樣的東西，我一定會被人比下去，所以我一定要找一個跟他們不同，且可以突出自己的方法。在一次偶然機會下，我發現好像沒有人畫點畫，也發現塗改液可以塗色，而且效果不錯，點下去會有立體的感覺，最重要的是與眾不同。這樣雖然未必會稱讚我畫得漂亮，但最少會令人覺得很特別。」

## 「人大」父子

雖然身患重病令父母非常擔心，但陳智思畢業後，並沒有即時返港處理家族生意，而是繼續留在美國，於紐約一間投資銀行任職，這是他爸爸陳有慶的意思。現為中國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的陳有慶表示，從低做起，第一可以看到別的機構怎樣訓練新人才；第二不會依賴家庭關係。

除了贊成兒子由低做起，陳有慶亦很鼓勵他多了解中國的發展。後來，陳智思亦步他

後塵，出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陳有慶指出：「在我做四屆人大的二十年中，看到中國經濟增長快速，所以希望年輕人可以多些了解怎樣在國內做生意、投資。因為香港就這樣大，雖然是國際性城市，但發展是這樣大就只有這樣大。若要擴大投資範圍，國內是唯一的出路。做全國人大代表，主要是可以較深入地了解國內的情況，也可以就各方面提供建議。如果做人大，每年就要視察、要開會，可以發表不同意見，這是我參與人大的另一主要目的。」

從商、從政、投身公職，令陳智思有著不同的體會，但他由始至終都本著同一個信念，就是以爺爺和爸爸做榜樣，陳智思說：「我很敬重爸爸和爺爺。他們未必是大企業家，但口碑極好。他們兩位樂於助人，都受人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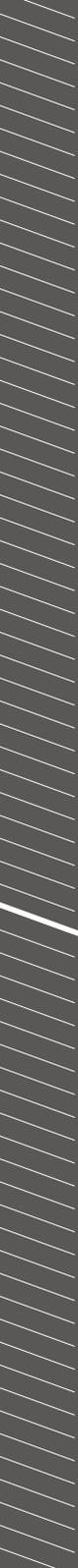
曾經患病令陳智思更珍惜每一天，陳智思透露：「由十幾歲生病時開始，我的心態就是活得一天算一天，所以每件事都要爭取，都要嘗試。我從來沒想過較遠的期望，反而我覺得應該做好每一天要做的事。如果每一天做好自己要做的，我已經覺得很滿足。」

## 稱職丈夫

面對兒子投身公職，又要兼顧家族生意，陳有慶給予無限量支持，但有時亦難免會有擔心。陳智思當年不再競逐連任立法會議員，是希望可以有多些時間陪伴家人，但現在連爸爸都投訴他太多公職。陳智思說：「退下來後要幫政府主持六個不同的會議，難度比以前只是做議員論政更高。不過，因為是主席，所以他們在時間上都會作出遷就，故雖然工作量多了，但是時間卻比以前容易安排。」

陳智思育有兩子，自己會每星期抽最少三晚時間，留在家中陪伴他們，那他認為自己是否一個稱職的爸爸，稱職的丈夫？陳智思笑言：「這倒要看看我太太判斷我合不合格。要做得稱職，真是說的容易，做起來卻很難。我會盡量去滿足更多人的要求，包括家人對我的要求，但我知道很多時候是力不從心，未必能做到，所以我只能說我出了很多力，但絕對不敢說自己稱職。」

最後，他贈送為人丈夫的那些人一個小貼士：「我們要給太太的不只是時間，也要有溝通。我和太太結了婚這麼久，我們之間有個默契，就是每星期都有一晚只得我倆共晉晚餐。當然這是我太太的主意，我們會談談那個星期我們做了甚麼，有甚麼問題，兩個小朋友有甚麼要注意的。這雖然是很簡單的事，但就多了很多溝通的機會。」



第二部分

# 學術教育界



# 饒宗頤

## 香港國學之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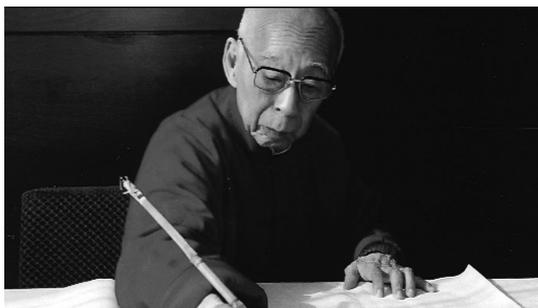
### 北有季羨林，南有饒宗頤

人稱「饒公」的饒宗頤，出生於富貴之家，初名福森、號選堂。當年饒氏家族，被稱為潮州首富，家族擁有四家錢莊發行銀票，家中的「天嘯樓」，藏書量更超過三萬卷，饒公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自小就可以沉醉書海中。

饒宗頤的爸爸寶璇，既是商人又是學者，但在四十二歲時不幸病逝，當時的饒宗頤還未到十六歲。作為長子，他要完成父親的遺作，兩年後完成了《潮州藝文志》，也為「潮學」奠定了基礎。

學術界常說：「北有季羨林，南有饒宗頤」，兩位都是一代國學大師。在 2009 年去世的季羨林，精通十二國語言，在北京大學創立東方語文系，也是著名的翻譯家、散文家。饒宗頤則精通書法、歷史、經學、考古、文學、翻譯，更可說是敦煌學及潮學的先驅，其足跡遍及內地各省市，香港、澳門、澳洲、新加坡、日本、法國等。

現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研究主任的鄭煒明，三十年前是澳門東亞大學（即現時的澳門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饒宗頤當時正是他的老師。鄭煒明表示，饒公是一位很有啟發性的老師，他上課時不是用講義教書，而是取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或是正在研



溫家寶總理讚揚饒宗頤老先生學貫中西，集學術與藝術於一身。有一名日本學者也曾經形容饒公是「導夫先路」，意思即是他永遠走在學術的前面，而且能斷定學術問題，指明一個方向，讓往後的學者照著那個方向走。



究但未發表的東西。

饒公上課時，常強調文史哲藝不分家，即詩、畫、歷史等，每樣都互相緊扣着，要解釋清楚。他對學生要求很高，但就不會給很大的壓力。饒公當時給學生打分，只得兩個級數，一是甲、一是乙，他說難得還有人有興趣主修中文，故此給分比較寬鬆。

香港大學的李焯芬教授，現在是饒宗頤學術館的館長，他於 1994 年從加拿大回香港，加入了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後，才認識饒公的，從此就被他淵博的學識吸引，近年更經常在不同場合代表饒宗頤發言。

李焯芬表示：「回顧過往的歷史，很少學問家能像饒教授的學術領域那麼廣闊，大家都知道他在古文字學、敦煌學、文學、詩詞、古代歷史、中西交通史等學術領域，學問十分踏實。他經常告誡我們，要求真、求實、求是，這都是做學問一個很重要的態度。他寫的學術論文，通常言簡意賅，開始第一、二句，便已帶出問題，之後很深入討論，完全沒浪費筆墨。」

活到老、學到老，用來形容饒公，一點也沒有錯。因為他覺得做學問是很大的樂趣，並不覺得是一份工作，也不覺得是苦差，他的研究，是一做就可做數十年的。

鄭煒明舉了一個例子：「明末清初之間，南明有數個小朝廷，其中有一個人物叫郭之奇，饒公曾為這個人編了一個年譜，但饒公卻把這份年譜放在行李包內，五十年來都不拿出來發表，待到五十年後覺得成熟了，自己做這個人的研究已差不多了，才拿出來發表。」

在現今大學的環境，其實教授都有發表論文的壓力，甚少見到做好研究都不發表，這也反映到饒教授很嚴謹，很認真去求真、求實，如果覺得是有些地方還可以再探討的，他便暫時不發表，他是持一種很嚴謹的態度，也反映出他的學術研究成果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 敦煌學研究成果纍纍

饒公獲得多方的尊重，2009年更被國務院批准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同年，專責醫療、衛生和科技教育的國務委員劉延東來到香港時，也特別拜會饒宗頤。劉延東說：「中國不能僅是一個經濟大國，首先也必須是一個文化大國，經濟的強國也必須是文化強國，所以文化是不可缺少的。」饒公則表示，大家看歷史看得太短，是對歷史的短視，這是因為一個人對歷史的興趣不夠高，他認為首先要改變這個態度。

眾所周知，饒公對敦煌學有深厚的研究，也去過當地無數次，2010年為慶祝他的九十五華誕，香港三百多名學者陪著饒公再次踏足敦煌進行研究，部分人更以敦煌的研究成果作他的生日禮物。

不說不知，原來引起饒公對敦煌的興趣，一切是從英國開始。當時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饒公買到一套流失在英國的敦煌文獻膠片，他自此開始敦煌學的研究。之後數十年來，不斷有重要的敦煌學研究成果。饒公縱使已九十多歲高齡，還有一顆不老的好奇心，對新的課題有探索的精神。此行他更捐出書畫，籌了百多萬元保護敦煌石窟。

饒公曾說過，自己做的學問，要貫通古今及貫通中外，敦煌剛好就是這個位置。他更形容古代的敦煌，就好像今天的香港。

李焯芬補充說：「古代的敦煌，其實是一個邊塞，是當年絲綢之路上一個重鎮及邊塞。商旅經常在西域，經敦煌進入中國的漢地，也有商旅經敦煌去西域。這些商旅帶絲綢出境，帶點陶瓷，也把一點西域的產品，例如寶石或其他的物產如葡萄、酒帶來中國。敦煌其實是個物流中心，物產經敦煌進出口中國。我們今日在香港也是個物流中心，其實功能上可以對比。」

## 不研究近代史

1937年7月，抗戰爆發，其後潮州淪陷，饒宗頤曾記下當年的情況：「潮州淪陷之一大饑，民至拾馬糞，淪其中脫粟而食者，予聞而悲之。」

當時饒公只有二十出頭，被雲南的中山大學聘請為研究員，原本想由潮州經香港再到雲南，中途卻患上惡性瘧疾。饒公當時覺得很奇怪，他平時不生病，為甚麼那次病特別嚴重。生病之後就留在香港，就走不了，因此就沒有辦法到雲南中山大學上任，反而留了在香港。

在香港，饒公有從商的朋友，協助他展開學術之路，從此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之後更在香港大學中文系教了十六年書。隨著名氣愈來愈高，新加坡、美國、台灣的大學，都爭相聘請他。到1973年，回流到香港中文大學授課。

鄭會欣是饒公在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助手之一，專門幫助饒公校對文稿及編輯成書。有趣的是，饒公著重古代歷史，但鄭會欣偏偏只研究近代史。饒公曾向鄭會欣說，他甚麼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近代史，他說因為近代史離我們太近了。

饒公年紀雖老，但鄭會欣不得不佩服他看論文的速度。他每一天看大量的論文著作，他很快就能把論文的精要之處、關鍵之處、重點拿捏到，之後他很快就發現論文存在哪些問題，有哪些令他有所收穫，對他有所啟發。

饒公的博學令人佩服，由 1979 年至今，已發表超過四百篇論文。他為其他學者的著作所寫的序，也足夠編成一本書。他曾為中文大學題過一副對聯：「寶物潛研時有獲，游魚細數意無窮」。這反映了他做學問的態度。

2003 年，饒宗頤獲中大頒發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可說是肯定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 通過「心經簡林」讓旅客感受圓滿智慧

多年來，饒公不斷創作。1979 年，十號風球「荷貝」襲港，造成多處破壞，饒公從家望出外面景觀，即興畫了一幅「得間」，「間」是有空的意思，想不到饒公的畫作也可幫港人記下回憶。

饒公的女婿鄧偉雄，也是學術館的藝術統籌主任，他形容饒公的作品是學術及藝術的結合，書法及繪畫最基本就是線條，饒公掌握得很好，能夠突顯其特點。

鄧偉雄表示，饒公描畫的荷花非常特別，因為是寫在西方繪畫用的畫布上。他經常說寫荷花最難是寫荷莖，幸好他對書法、篆書方面很有研究，所以可以用寫篆書的方式去寫荷莖，可以用寫草書的方法去寫荷葉，才造成他的荷花，形態與他的書法很配合。

饒公的畫風雖然不斷地改變，但怎樣也不會脫離中國的味道。他的寫荷花已經是脫離了古人，因為他沒有拘束怎寫荷花，應該用甚麼顏色，用甚麼物料、紙張，甚至不是紙張，而是絹或是絲，布或帆布，他都嘗試去寫。但是不論變化如何，而一個重要的地方，是他依然保持中國畫的風格，而不是西洋畫。

饒公的足跡遍佈全港，最為人熟悉的是大嶼山的「心經簡林」。事緣 2000 年，饒公取得了特區政府頒發的大紫荊勳章，當時他很想為香港做一些事情，於是找了寶蓮禪寺的釋顯空幫忙找地點，原來最初饒公是想在石塊上刻上心經。但要把心經刻上大石塊，石需要一定的結實度，而香港的石質則不太適合去刻。後來饒公決定將心經刻在木簡上，因為中國的文字，以前都是刻在竹簡上。

籌備五年，「心經簡林」終於在 2005 年開幕。從寶蓮禪寺走過去，見到刻上心經的木雕坐落在鳳凰山的山脈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般若是梵文，中文解作智慧，波羅蜜多解作由此岸到彼岸的圓滿境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釋顯空指饒公希望人對世間的事物，通過心經、通過空的理解，繼而令人的內心世界放得下，對事物不要那麼執著。希望不論是香港人或是旅遊人士，也可感受到那份自在和圓滿的智慧。

饒公已經九十多歲，他曾說過希望將學術上的研究交給年輕一代，讓中國文化好好傳承下去。



# 胡鴻烈、鍾期榮

## 合力創辦私立大學

###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胡鴻烈，樹仁大學校監，是香港早年的十大律師之一，又是大律師公會終身會員，處理過的案件超過三千宗，亦是香港最早期立法局民選議員，並當過全國政協委員及常委。

鍾期榮，樹仁大學校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法官，夫婦兩人一同創立香港第一間私立大學——樹仁大學。

胡鴻烈每天都來到樹仁大學內的校長室找鍾期榮校長，伴著她一起看看報紙、看看學校文件。十年前，鍾校長不幸中風，從此胡校監都伴著校長，為她讀出報紙、文件中的每一字、每一句。

胡校監說：「她一定要我陪她，如果我不陪她，她是不能生活的，所以若我退休就是陪校長，希望校長健康長壽。」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兩老緊握著對方的手，結伴走過六十多個寒暑，一直風雨同路。他們的愛情故事，從 1944 年開始，當時中國正值抗日戰爭，到處戰火瀰漫。胡



曾有人用「獅子山下，有愚公移山」這句說話，形容胡鴻烈和鍾期榮創立樹仁的故事。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政府終於在 2006 年批准樹仁正名為大學。



鴻烈是外交官狀元，1945 年要到重慶訓練六個月，受訓期間遇上當時中國第一位女法官鍾期榮來講課，深深被她的學問、人品所吸引，兩人因而認識，後來更結婚了。婚後，兩個就一起到蘇聯，之後他們又去過法國和英國進修，先後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再來香港。

胡鴻烈 1955 年到了香港，開展他的大律師事業，他一出道生意已不錯，出道一年已經可以買車買樓。鍾期榮則先後在聯合書院、浸會學院等院校教書，開始注意到青年的升學就業問題，她發現有心讀書的人很多，但能接受大專教育的，卻少之有少。

胡鴻烈表示，因為當時可以進大學的人，只有百分之二，而當時香港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才成立不久，中六的學生畢業後，只能進入四年制的中文大學，於是他們就決定加入年輕人教育行列中去。

他們二人原本所賺的錢，大概五十歲已經足夠退休，但兩人甘願散盡家財，在跑馬地買下一棟小洋房，開辦四年制的大學課程，樹仁亦在 1971 年創辦。

## 現代的「愚公移山」故事

教育之路總是不平坦。屹立在寶馬山的教學大樓，由一百九十六條樁柱支撐著，而背後蘊含著一個「愚公移山」的故事。

當年政府所批是一塊大斜坡，地雖然是免費，但光是打樁已花上九年時間，人人都說在這裡建校是「不可能的事」，但鍾校長認為學校一定要有校舍，最後共花了近一億元來興建。為了籌集資金，當時賣了跑馬地的校舍。最後，到了 1985 年才建好。

在樹仁，一磚一瓦都有著胡校監和鍾校長的血汗，兩老事事以校為先。為了讓樹仁學生在大學生涯中擁有宿舍，兩老決定建文康及宿舍大樓。為了籌集資金，當年年屆八十多歲的胡鴻烈仍然進出律師樓，替人「打官司」賺取經費。胡鴻烈感慨地表示，財政問題不是沒有的，但是最後都克服了。

跨過財政困難，卻遇上教育改革難題。七十年代末，政府向樹仁提出「二二一」學制，即兩年預科、兩年大專、一年深造課程。八十年代尾，政府又提出大學改為三年制，樹仁又遇上另一個難題。

胡鴻烈回憶說：「1988 年，政府要取消中六，那時候我們跟中文大學都是四年制，若中六沒有了，就沒有學生源。中文大學沒有問題，但我們當時卻要面對一個很困難的抉擇，我們不收中五，我們收中七。」

無論在「二二一」學制，還是「四改三」學制事件上，只要樹仁答應，便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但鍾校長每次都堅決拒絕，寧願不要資助，也堅持四年制。「所以我們最初就辦四年。樹仁的學生每一個都是讀大學的，你承認不承認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對學生的教育是大學教育。」胡鴻烈堅決的說。

一直以來，樹仁歷盡風吹雨打，胡鴻烈與鍾期榮攜手一一跨過，沒有拿過政府一分錢的情況下，默默為樹仁打下穩固根基。終於在 2006 年，政府批准樹仁正名為大學。大學正名典禮，正正在 2007 年 2 月 14 日。此時此刻，胡鴻烈與鍾期榮二人，一切盡在

不言中，「大學」這兩字是他們的最佳情人節禮物。

胡鴻烈感慨地說：「這條路很長，也很艱苦，這一點也不錯，但是我們從來也沒有放棄，這並不是為我們，主要是為同學，及將來令樹仁發揚光大，這些都要靠校長的精神來鼓勵我們。」

### 樹仁校訓：「敦仁博物」

一直以來，胡鴻烈和鍾期榮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去辦學。胡鴻烈認為，同學的發展是全人的發展，全人發展很重要，努力讀書之外，也要努力做人，服務社會，訓練自己。

他們不會追求要錄取最傑出的學生，只想培養社會上有用的人，令更多年輕人可以接受大學教育。「手種千年樹、心存百世仁」，正正是校名「樹仁」的出處，而《易經·繫辭上》中「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則是樹仁校訓「敦仁博物」的出處，指的是有了敦厚的仁德，自然會充滿愛心，希望學生博學之餘，亦有寬容之心。

胡鴻烈說：「最重要還是敦仁博物，讀書不單要求知識，而且要培養出仁義道德。無論是讀書、做事、服務社會也好，不但要有益於己，也一定要有益於人，這樣你才能興旺發達，將來樹仁也一樣，一定要有益於社會，有益於我們的國家、小孩子，有益於青年。」

鍾期榮十年前中風後，行動不便。以前她天天都會巡學校，看到未關的燈、風扇，她會親手關掉，現在便由校監代勞。

2011年，胡鴻烈與鍾期榮已經九十二歲，但他們仍然堅持每天回校處理校務，雖然現時大部分校政已交由兩個兒子打理，但在一些大事上例如批地仍然會由校監胡鴻烈決定。

政府在2010年正式批出一塊斜坡予樹仁興建研究中心，現正準備圖則，希望在2015

年建成。胡鴻烈表示：「政府現在給予我們那塊地，是作建造研究院之用的，我們是通過辦這個小型的大學，以發揚中國文化，中國精神，愛國家、愛民族，愛自己的文化。這樣一批年紀輕的人，在別的地方，受不到這樣的教育，樹仁可以辦得到，我們希望能夠完成這個使命。」

他們一直自給自足，為的是提供全面的大學教育。他們認為若政府能夠提供津貼固然很好，但是卻有很多條件，有時要滿足它的條件是比較困難的，他們說錢是辦好教育的一個重要條件，但不是唯一條件。

一直以來，樹仁跨過一個又一個波浪，財政亦沒有受過影響。他們的方法是穩著，不要亂投資，他們認為辦大學不能亂投資，因為若輸過一輪投資，對社會的信心就沒有了。故此即使在 2007 年樹仁正名的時候，政府給予樹仁二億元作為一次性撥款，他們也沒有隨便動用。

## 以樹仁為榮

「十年樹木、百年樹仁」，樹仁已經踏入第四個十年，一直以來培育眾多的社會人才，胡鴻烈與鍾期榮勇往直前永不放棄的態度，每個畢業生永遠銘記於心。

入境處處長陳國基，也是樹仁大學的畢業生，他說：「在我工作時，我都會覺得盡量做好自己本分很重要，放心思做，盡量做好些，這些其實都是在校長、校監的身上學來的，盡力去做，做好自己，認為對的、應該要做的事，就盡力去做。」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樹仁大學校友李家文則表示：「他們兩老的財產，應該不少，但他們穿衣都很樸素，特別是校長，作為女性，以前又是法官，其實衣著很有品味，但卻常見她都是穿那幾件簡單的衣服。有些老師說，其實她的衣服都已穿了幾十年，可能學生上學時穿的衣服，都比較長的要昂貴。在她身上我們感受到，有錢不一定要外露，且要思考錢到底應該花在甚麼地方才有價值。」

為事業、為樹仁，胡鴻烈與鍾期榮勞碌大半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胡鴻烈也想

過退休，陪著這位一直風雨同路的伴侶。他說過只要有適當的繼承人選他就會退下，甚麼也不做，陪著校長。而鍾校長則希望樹仁學生永遠記著這句說話：「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敦仁博物』的精神。」

# 高錕

## 光纖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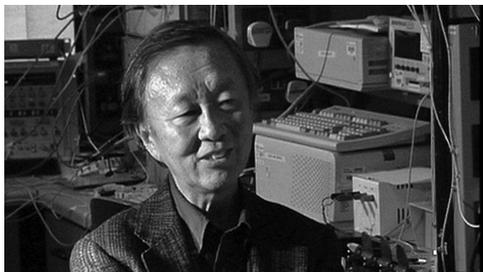


### 唯一有資格與時間賽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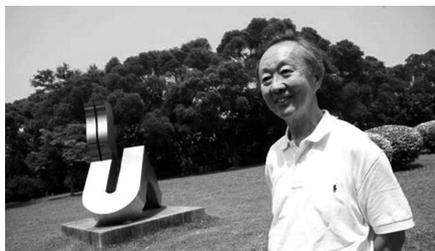
如果說電訊科技是一場革命，它改變了世界，「光纖之父」高錕便是這場革命的幕後推手。他發明的光纖技術，征服了時間與空間，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地理上的距離已變得不再重要。

今時今日通訊這麼方便，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打長途電話給地球另一邊的她或者他，又可以用寬頻上網，在網上看電影、聽音樂，甚至視像通話。這一切一切的方便，全部都是由 1966 年這篇〈光纖通訊〉的論文開始。高錕在論文中提出，以石英基玻璃纖維進行長距離的信息傳遞，亦即光纖通訊，世界就在那一刻被徹底改變。無論你與她的距離有多遠，中間隔著高山還是大海，一條比頭髮絲更細的光纖，便可以同時傳送三萬多個電話通訊，將無數人的心連在一起。

光速一秒可以走三十萬公里，成功駕馭光，令高錕成為這個世界上唯一有資格與時間賽跑的人。高錕獲獎無數，曾獲得的獎項及獎狀包括：菲利普親王獎章、愛迪生電信獎、馬可尼國際科學家獎。每一個獎項都是世界級的榮譽。



高錕發明了光纖後，並沒有為光纖技術申請專利。這種不問回報，默默貢獻自己的態度，才是最值得人尊敬。



高錕三十多年前提出的理論，直至今時今日，仍然是很多科學家的研究對象。可見，高錕在世界科學界有很崇高的地位。日本東京大學先端科學技術研究所的薛世榮博士便說：「我知道高錕教授在很久前已有『光纖之父』的稱號，他相信他從事的工作，他相信光纖終有一日會成功。那時候沒有人真正相信他，他們認為光纖太昂貴，不可能在應用方面達到低成本的要求。不過高錕則堅信自己可以做到，最後他也證明了他是可以做到的，將不可能變成可能，高錕教授絕對是成功的典範，而且並不局限於光纖等工程方面，對每個人而言亦是典範。」

在 2009 年，高錕獲得他人生中最高的榮譽。是年 10 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向高錕頒授諾貝爾物理學獎。由於高錕在得獎前，已證實患上腦退化症，故此由她太太黃美芸與香港中文大學四名教授，根據他的自傳代他撰寫得獎演說詞——「古沙遞捷音」，並由他太太代他讀出。

患了腦退化症的高錕，更獲得特別安排，免除走到台中間鞠躬三次的禮儀，瑞典國王更親自走到他面前，將物理學獎頒給他。

## 不折不扣的「土產科學家」

成功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今年七十七歲的高錕，自小便對科學著迷。他於 1933 年在上海出生，小時候住在法租界一棟三層高的房子內。小時候他已經對科學很有興趣，喜歡躲在家裡做實驗，曾經自製氯氣、滅火筒，甚至是煙花。年紀小小已經懂得自己用電子零件「砌膽機」聽歌。

高錕之後來了香港，1949 年開始在聖若瑟英文書院讀書，當時校內很多學生都是來自上海。在這班「上海幫」的眼中，高錕是一個異常勤力的學生，溫書時甚至會忘記吃飯，成績很好但絕對不驕傲，是典型的模範學生，也絕對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並很珍惜時間。

高錕高中畢業之後，立志要往電機工程方面發展，他本來考上了香港大學，但當時這一科在香港的發展仍未成熟，高錕於是毅然離開香港，去了英國的格林威治大學攻讀電子工程。1957 年畢業後，去了英國頂尖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 (ITT) 出任工程師，期間繼續讀書。1965 年在倫敦大學取得電機工程博士學位。他在英國的舊同事都對他讚不絕口。

雖然高錕同時擁有英國及美國國籍，但他同時亦擁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與香港淵源很深。香港的學術界人士都認同，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土產科學家」。

天賦是上天給一個人的禮物，你與我都控制不到，擁有天賦並不偉大，但得到這種恩賜後，不問回報，默默地貢獻自己，才是最值得人尊敬。高錕發明了光纖後，並沒有為光纖技術申請專利。試想一下，現今世界有哪一個人可以不用通訊設備呢？即使不上網，都總會使用電話。光纖已成為每一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放棄專利，選擇將技術開放，造福世界。他沒有得到財富，卻為世界帶來貢獻。

高錕曾經說過：「香港首富、全球首富，對我來說完全沒有意義，我無後悔、也無怨言，因為如果事事以金錢為重，一定不會有今日光纖的成果。我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我在做光纖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工程師或者一個科學家應該做的事，應該是他的責任。」

光纖科技何時才會被後浪淘汰？高錕很幽默地說：「我想沒有甚麼系統能代替光纖，光纖是最好的，在一千年內，我找不到一個新的系統可以代替它。我這樣說，你們應該不相信我，因為我本來也不相信這些專家的說話。」

## 為香港教育作出很大貢獻

提起高錕，很多人知道他是「光纖之父」，知道他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其實高錕對香港有很大貢獻，特別是教育方面，創立大學學分制及多元化的大學教育，在 1997 年前更做過港事顧問，為中央政府提供意見。

高錕雖然不是在香港讀大學，但當他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曾經返回中文大學教書。1970 年他應邀到中大擔任電子系教授及系主任，協助中大成立電子系，即現時的電子工程學系。在電子系四年期間，他為中大發展電子學課程，成為中大首位電子學講座教授，在這段短短日子內為中大帶來很大的貢獻，大大推動了科研風氣。

高錕更加在 1987 年成為中大的校長，兩年後高錕著手創辦訊息工程學系，成立網絡訊息研究中心。另一件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一手改變了香港學者「為飯碗而寫論文」的科研風氣，要求研究要深入、要有意義。

高錕亦以他獨特的思維方式解決了很多具爭議性的問題。例如在 1988 年 6 月中，港英政府發表的《第三號報告書》，建議將所有學位課程由四年改為三年。雖然面對各界激烈的反響，但當時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在五個月後，將報告書內有關「四改三」的部分，原封不動呈交給政府。中文大學上下對「四改三」的反應非常激烈，曾經多次發起示威、靜坐。中大副校長楊綱凱指出，高錕當時亦以校長身份帶隊示威。

正當中大內部為此而爭拗不休的時候，高錕以另類的思維，解決了這次危機。他為中大推出了學分制，只要學生修讀足夠的學分便可以畢業，很聰明地解決了「四改三」

的爭拗。

他對中大的貢獻並不限於此。高錕在位期間，對本科課程進行了全面檢討，親自拍板創立了日本研究、藥劑學、小學教育及建築系等十一個本科課程，令本港的大學教育更多元化。

## 任港事顧問引起激烈迴響

在 1993 年 3 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當時是中大校長的高錕出任港事顧問。港事顧問當時是被視作北京政府用來抗衡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政治工具。事件引起中大學生的激烈迴響，學生會更在烽火台擺下公開論壇，要求高錕出席交待事件。學生在論壇上對高錕作出很多辛辣的批評。例如有同學批評道：不希望高錕校長犧牲特定原則，參與不民主的政治把戲，向權勢靠攏，來保證中大或中大同學將來的幸福。」

但高錕並沒有發怒，仍很寬容回應學生的質問：「我在中立的立場裡面，先說幾句話。在這個實際情況下，不可以說中國政府不會聽，甚至於做政府把戲把我利用。」不過學生仍強烈要求高錕校長，立即放棄港事顧問一職。

幾個月後中大舉行開放日，高錕更被反對他做港事顧問的學生「搶咪」。《中大學生報》的記者問他會不會罰「搶咪」的學生，高錕說了一句：「懲罰？我為甚麼要懲罰學生？」

高錕在校內受到很多人尊敬，他得到諾貝爾獎後，中大更將他的銅像豎立在中大校園。

特區政府為表揚高錕對香港及世界的貢獻，在 2010 年 11 月，向他頒發大紫荊勳章。

高錕證實患上腦退化症後，已經再沒有做研究，甚至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光纖之父」。他退休後大部分時間都是與太太在美國居住，過著簡單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樣忙碌，可以多些時間與結婚五十年的高太相處。最高的榮譽，高錕已經有了，如果給他們一個願望，他們會要甚麼呢？高太表示，希望能找到方法醫好他這個病。

正因為這個願望，高錕及高太積極投入，協助腦退化症病人的工作。高錕將部分諾貝爾獎的獎金捐給聖雅各福群會，又成立「高錕慈善基金」，協助香港的病人及提高各界對這個病的認識。

卸下科學家的沉重擔子，高錕用另一個身份，透過大愛，繼續為香港、為世界作出貢獻。

# 周兆祥

## 第一代環保先鋒



### 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怪人」

繁華的香港，到處都是高樓大廈，人煙稠密。城市人的生活忙碌緊張，香港人已習以為常，甚至樂在其中。不過也有人選擇在城市當中尋找僅有的大自然，過著「桃花源」式的生活，周兆祥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過去十多二十年，周兆祥不開車，在家不看電視，夏天不開冷氣，甚至連手提電話都沒有。他又提倡自耕自足，素食、甚至生吃。他的生活方式總是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不少人都說他是「怪人」。

Club O 創辦人周兆祥說，三十年前，香港絕大部分吃到的東西，是在香港種的，多於百分之九十是自給自足的，現在卻只有百分之二；現在香港人吃的東西，百分之九十八是要從外地運來的。香港其實可以種很多的東西，只要有規劃、使用適當的辦法，以及改變大家的飲食習慣，隨時可以種到五成的食物，去餵飽香港七百萬人。

周兆祥近年在大嶼山的大壆村苦心經營一片新天地，推廣有機耕作。該塊田有二三十年沒有種過東西，所以十分肥沃，又沒有甚麼蟲害，要用來種東西是很容易的。現在他也希望多一些的人來這裡耕田。



不少人說，周兆祥是香港第一代推動環保的先鋒，而他就覺得自己只是在宣揚一種生活概念。

周兆祥認為，要人們山長水遠來這裡耕田，比較困難，所以很多人租了田，但都是由他們代為耕作，租田的人經常都是一家大小來這裡，來到就是摘東西。周兆祥覺得最有價值的，就是帶他們去看蘿蔔是怎樣拔出來的，花生是怎樣種的，他們會知道這些東西得來不易，這是很好的教育。

要城市人租田來耕，在二三十年前的香港，簡直是匪夷所思。在那個時代，「環保」還未成為政府政策的宣傳口號，亦沒有人理會我們的生活環境到底有多污染。周兆祥在1979年到英國讀博士，在此之前，他從來未聽過甚麼是環保，香港也沒有人說環保。當時香港推動環保的團體，就只有一個由學術界組成的「長春社」。周兆祥想普及推廣環保觀念，於是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綠色力量」，宣揚外國盛行的綠色概念。

周兆祥說：「綠色力量最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希望不只是談環保，而是全面地談綠色醫療、綠色建築、綠色教育、綠色的人際關係、綠色的家庭生活等等，甚麼都是綠色，這是一個大包圍的概念，即是說我們要由整個社會的制度、文化、生活習慣著手。人們日常一談起環保，就想起污水處理、怎樣解決垃圾、噪音及空氣污染的問題等，這都是環保署做的事情，都是『補鑊』性質的。但是如果你說綠色建築、綠色的法律、綠色的文藝、綠色的藝術創作，這些是很生活化的，還有是綠色的飲食，這些都與整個環境，以及人的心態是息息相關的。」

八九十年代，周兆祥成為了環保界的代表，不過很快他就退下火線。原來他後來走的一條路，是愈來愈傾向是從心靈方面去工作，於是就離開了社會運動。他認為更值得去做的就是改變人的想法，清淡一點、清心寡欲，不要想太多物質的東西，以及要有愛心，愛這個地球、愛自己、愛我們的社區，香港最需要這東西。

周兆祥認為綠色生活要由衣食住行開始，於是他推廣改變飲食習慣，開了一個烹飪班，教的除了是素菜，還要全部都是生吃。來上課的人，老中青都有，每個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他說：「香港被譽為是飲食天堂，其實香港是飲食地獄，香港人吃得非常之差，不負責任，而且吃到自己很傷。所以近幾年我們就想盡我們的能力，去教大家吃得好一點。」

一般人說的健康吃法，我們都覺得不夠健康，我們想做一些比別人的那些更健康。」

## 將外國最好的東西引進來

周兆祥由衣著以至他的想法，和一般人都很不同，不少人都覺得他「很怪」。他從不用手提電話，家裡沒有冷氣機，從來不看電視，很多人都難以想像。表面上他好像很落後，但他思想的步伐，總比其他入走得前。在二三十年前開始，他已鼓勵大家少些開車，用單車代步。他又開始回收廢紙，購物不用膠袋。這些今時今日看起來，已經是普通不過的環保概念，但當時就被認定是「怪人」，不過他從來都不介意其他人的看法。

人人都覺得他是環保專家，但其實他在大學修讀的，和環保一點關係都沒有。周兆祥在港大中文系畢業之後，曾經當過中學教師、大學助教及研究員，又在電視台擔任美術設計、編輯、電視監製及節目主持人等等，之後又去到英國修讀語言學，取得博士學位，並且是英國語言學會及香港翻譯學會會士。

周兆祥道：「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我的博士學位是研究翻譯理論，為何會無緣無故搞環保？現在又搞甚麼健康、飲食、療愈等，有甚麼關係呢？其實是有關係的，就是很想將外國最好的東西引進來香港，繼而輸入內地。」

外界對他的不了解，令他總是被人誤會，不過他一點都不介意。他說：「二十多年前，我剛剛在香港搞綠色運動的時候，很有趣，傳媒談起關於祥哥，他們說周博士是全香港最讓人誤解的人，我想我太太都會很同意。傳媒總要說我是環保先鋒，我偏偏就不是，我都不是搞環保的，環保不是這樣做的。」

不過無論如何，他對大自然總是有一份執著、一份感情，自小他就已經如此。和香港的小朋友有一點不同，他是在香港的郊區鄉村長大，當時所謂的郊區鄉村，就是現在的沙田大圍。雖然有自來水，但是他們仍都是在井打水，在門口洗碗，有一塊田種種東西，飼養雞隻。而且他曾經當過童軍，做童軍的時候經常都會到郊外參加營火會、露營、看星、在山坑玩，習慣了與大自然生活。

他大學畢業之後，看到當時開始有些英文著作說地球不行了。現在說來是四十年前、1970 年的時候。他對此很懷疑，因香港從來都沒有人提過這件事，是否真的呢？後來去到英國，看到英國已經在搞很多環保的事情，例如 1980 年英國已經在回收廢紙、回收玻璃瓶，而且很多人都騎單車上班。在 1984 年他回來香港，為何仍然沒有人做呢？於是他想沒有人做便由他開始做吧！

作為一個語言、翻譯的學者，他認為他的專業範疇並非只是將文字和語言轉換，而是將資訊傳播給更多的人。周兆祥說：「我們做翻譯，其實就是一種資訊傳遞的工程，我們有責任將真相傳播給世界知道。前幾年有一套電影，叫《絕望真相》，就是說出一些不方便說的話，我們也就是要說一些不方便說的東西。」

## 幸福生活不是由 GDP 界定

即使有很多人不了解周兆祥，但是身邊的家人多年來一直都很支持他。他覺得自己很幸運，認識到一位女朋友，不喜歡打麻將，不喜歡看電視，不喜歡逛公司、商場，所以要適應就很簡單，不用她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家人的支持，周兆祥能夠一直堅持自己的理想，用行動實踐對生活的理念，並且希望將他的理念推廣出去。過去幾十年，越來越多人認同他。不過他亦都知道，要其他人完全學習他的生活方式，並不可能。他說：「保護地球人人有責，過綠色生活，不是全都要學祥哥。我做 ABC，你可做 DEF。現在我經常叫別人不要坐飛機，如果你要坐飛機，可以，你在其他地方節省一點，坐飛機的話，你素食吧，一樣可以節省很多碳排放；如果素食又不可以，那麼便不要開車。你總有方法，以你的方式去對這個地球減少破壞，不一定要學我，學我沒有用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周兆祥給予人與世無爭的感覺，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用生活態度去表達自己的理念。不過很多人都不知道，周兆祥年輕的時候，亦曾經投身社會運動，就和現在的八十後青年一樣，站在抗爭的前線。當年反對殖民主義、反貪污捉葛柏、爭取艇戶權益，都有他的身影。

周兆祥回憶道：「1967、1968年時，香港剛剛暴動完，全世界都在烈火暴潮，學生搞很多暴動、起義，他們對建制提出了很多批判。這一場火影響到我們，讓我們接觸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甚至是托洛思基主義，即是梁國雄先生相信的那一種。我們覺得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為何會有壓迫？為何會有階級鬥爭？為何要壓迫沒有能力的人？所以我大學畢業之後，便馬上加入了一些非常激進、反建制的組織，其中一個拍檔，大家都聽過他的名字，他就是劉千石。」

去完英國回來，眼界不同了，見到全球發生的事，環境污染又存在很大問題。今時今日的周兆祥同樣關心政治，關心香港的發展，不過重點已有所不同：「我們怎樣去界定幸福的生活？香港人界定的幸福生活，就是GDP，就是我們賺多一點，稅收多一點，樓價高一點，這就叫幸福生活，香港人是這樣的。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幸福指數完全是另一回事，即是完全令到大家快樂、開心、幸福，我們看通這件事，錢便不是一切了。」

# 徐立之

## 從基因研究學者 到港大校長



### 破解囊狀纖維症的基因密碼

在我們的身體裡，有近三萬個微細至肉眼都看不到的基因，這些基因背後，隱藏著人類遺傳病的病因，不少科學家都希望破解基因之謎，徐立之是其中一個。

徐立之的大學時代，在中文大學攻讀生物系；碩士畢業後，先後到美國和加拿大做研究。1981年，他到多倫多開始做遺傳生物學研究和人類基因疾病研究，直至2002年。

徐立之自認讀生物學並非讀得非常好，因為讀生物學有很多東西要靠牢記，但後來做研究時，很多時都是分析實驗結果，用設計的實驗來找出答案，他對這些事情則有較大的興趣。

囊狀纖維症是白種人最常見的遺傳病，由於外分泌運作異常，影響呼吸和新陳代謝。科研成果往往都是從無數次實驗中反覆驗證得來，徐立之就花了七年時間「大海撈針」，從過萬個基因中，確認這個病的病源是因為人類第七條染色體出了問題，才誘發病症。

徐立之把研究結果在科學界權威雜誌刊登後，轟動了學術界。他回憶說：「這是最開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最開心的時候，就是坐在實驗室裡做研究。他雖然在基因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但原來他最初的志願是成為建築師。

心的研究工作，當時發表的三篇文章，在科學雜誌中連續刊登，同時還刊登了新聞及評論報道，是當時最感到興奮的發現。」

論文獲得世界注目。不過，當中有他覺得更加值得留意的部分卻沒有刊載在論文之中。原來該期科學雜誌的封面是他設計的，該封面是包含實驗概念或科學意義在內，是一個很先進的遺傳基因學觀念，但他在文章中無法解釋。他雖然嘗試去解釋，但編輯卻說，這個與他的發現及工作無關，留待下次才發表吧。但他並不服氣，於是就將這個概念放在封面上。

這一個研究成果，不單令徐立之在學術界取得榮譽，亦好像指南針一樣，引領學術界循著這個方向繼續解開其餘未知的基因密碼。當時甚至有人認為，徐立之會是未來十年最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徐立之說：「有人說我可以得到提名，取得諾貝爾獎，但這並不是我們做研究的人所重視的東西。我們做實驗時，最重要的是找到答案，最害怕是自己的解釋有錯誤，因為我們觀察一個結果後會作出分析，是為了解釋事情背後的原因，有時是會解釋錯的，

我最怕就是做錯。所以一篇文章的發表，其實是經過其他科學家的審查，他們都看不出破綻，大家對這個工作才有所認同。最後是否得獎，只是次要事情。當然，自己的工作受到認同，又獲獎，是對自己一個很大的鼓勵，但我從來不會放在心裡。」

## 當大學校長要懂得面對傳媒

科學可以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教育亦有同樣的影響力。在 2002 年，徐立之從加拿大返回香港，放下老本行的研究工作，擔任香港大學校長，成為傳媒的焦點。他憶起當時的決定：「或者是一個抱負，我經常返港，看到香港有發展機會，而且是在一個關鍵時刻，所以就願意回來試一試。」

當時大學界正面臨削減開支的壓力，八家大學的校長多次開會商討對策，怎樣在有限的資源下令大學持續發展，這也成為他上任之後的第一道難題。

從科學家搖身一變，成為大學領導層，處理行政工作的時間，比留在實驗室的時間還多。對這個轉變，徐立之有一番體會：「實驗室是由自己一個人開始，慢慢增加人數，有助理、研究生，又有研究博士生，愈來愈大的團隊。當你只有幾個人時，你還可以自己坐著做研究；但當你有很多人時，你的時間就不是坐著做研究，而是想想如何申請更多研究經費；取得研究經費，得出結果後，要寫報告，怎樣發表文章；還要開始管理財政，這麼多人，要買甚麼儀器，買甚麼試劑，全部都要花時間處理，到最後便有人事的管理。」

「我常說有『人』便有『事』，與實驗室的人相處，少不免有磨擦、有爭執。這些我都要管，變了一個小型機構。到了差不多的地位和經驗後，當在做一些國家級事情或世界級統籌工作時，根本沒有太多時間真的坐在實驗室中做實驗，或研究分析性的結果，其實到最後都是做行政工作。不過，這些行政工作是實驗方面的，而不是那種含有管治架構在內的。」

走出實驗室，要面對更多的人，亦要學懂面對傳媒。徐立之感慨的說：「來到香港大學後，很多時候我說的話，便是代表學校的言論，我說話要更加小心，所說的話不能

直接表達自己的所想，可以說是官方答案。這當然沒有辦法，因為現在我的地位不同了，我说的话很容易變成學校說的話。即便我說這是我自己的意思，但翌日報紙都會說是香港大學校長說的。」

## 藝術天分應用在生物研究上

徐立之出生於一個上海家庭，家境不算富裕。小時候與一大班小孩子在山上到處跑，就成為他人生第一堂生物課。

他回憶道：「我小時候家裡環境不太好，搬過很多次家，有一段時期我們住在大磡村，附近有很多小孩。我們經常到溪澗玩，那時候已對生物、大自然很有興趣。池塘內有蝌蚪可以捉，捉了蝌蚪回去後，聽說會變成青蛙，我們便把牠們放進瓶裡，打算看著牠們變成青蛙，但多數都變不了，很快便死去，因為牠們沒有東西吃，就在瓶內浮起來，死了。」

遺傳基因，可以說是與生俱來，不過徐立之的爸爸就不希望自己的藝術天分傳給自己的子女。徐立之說：「我父親畫畫、寫字、作詩都很好，但他沒有教我，我只學到畫畫寫字的神情，字就學不了，畫畫我雖有用心畫，但卻畫得不太好。我每次畫畫都被爸爸罵，說是浪費時間，應該讀書，所以每次畫畫我都很害怕。」

不題字、不作畫，藝術天分在生物科上原來一樣大派用場。徐立之覺得，因為他懂畫畫，所以對生物的構圖、結構就很有感覺，他的幾何是不錯的，對三維觀念非常清楚。建築、幾何、畫畫——這幾樣東西都是有連繫的。

從小對生物有興趣，但徐立之表示，小時候的志願反而是希望成為建築師。他說：「我喜歡做建築模型，夢想自己將來做建築師。還記得小時候，中秋節很開心，因為可以和隔鄰的小孩一起造花燈的，就不用去買，只買一些竹篾和蠟紙來自己做就可以，造完之後拿著花燈四處走，雖然不夠買的漂亮，但很開心。之後還有月餅吃，吃完月餅後，我就用月餅的紙盒做建築模型。有時又會將家中破爛的東西拆開來看。家中鬧鐘有時被我拆開來看，但通常都裝嵌不好，所以我雖然也對科學和研究都有興趣，但一

直都沒有想過當科學家。」

雖然如此，但是徐立之最終還是朝著科學家的方向進發。

徐立之記起當時的情況：「因為我當時是讀中文學校，又不是學校裡的高材生，沒有辦法讀香港大學建築系，曾經想報考理工大學建築，但都已經報名了。當時報考了中文大學，報考了不同學科，因為讀理科，所以考了物理、化學、生物，結果生物考得很高分，於是就收了我讀生物。」

## 帶領香港大學邁向一百周年

徐立之自言不喜歡死讀書，考試往往不是考得最好，雖然每次都明白老師說的東西，有時還比老師更快找到答案。做實驗時，他分析能力比較強，凡事都想問原因，想找出事情背後的原理，有很強的好奇心，但自己能力卻有限。

後來讀生物學，其實是偶然的機會。多年後的今日，他才發現自己的確有這方面的才能：「很多奇形怪狀的東西我都記得，別人會忘記，但我會記得，例如基因研究時，基因有很多密碼，我會記得這些密碼代表甚麼，亦的確對生物科情有獨鍾。」

放下實驗多年，回想當年，徐立之依然覺得埋首在實驗室的日子，是最開心的時光：「最開心的時候是讀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的時候，因為是可以真的理解細胞結構原理或背後的道理。後來再做研究時，當然是做最尖端的分子生物學，而後來又有機會做疾病、遺傳病研究，則是一個偶然，也是順其自然的發展。」

徐立之表示他最開心的時候，就是坐在實驗室裡，對著桌子上的試管、吸管做研究。做研究的時候雖然是很枯燥、很煩瑣，動作或工序重複，每一件事都很細微，但當所有實驗結果加起來，就會出現一個很有意義的結果。

大學校長每四年續任一次，徐立之 2011 年會帶領香港大學邁向一百周年。他覺得如果能夠支持校內出色的教授，給同學機會學習，加上其他配套和足夠的人手，學校便會

發展起來。

徐立之在香港大學的任期會在 2012 年屆滿。科研發展一日千里，徐立之表示日後即使退休，也未必可以做回自己的老本行，但就會用自己的能力，繼續推動科研發展。

# 詹志勇

## 樹博士



### 與樹木的不解之緣

每當香港樹木出事，他就會出來告訴大家這些樹木有甚麼問題。傳媒尊稱他做「樹博士」，他就是香港大學地理學系講座教授詹志勇。由於在香港研究樹木的人不多，所以詹志勇就漸漸成為了樹木的「代言人」。

詹志勇跟香港大學校園內每一棵樹，就如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一樣，有很深厚的感情，因為他在港大畢業，又回到港大教書，一教就教了三十年。至於是甚麼令他和樹木結下不解之緣？就要由他童年歲月講起。

詹志勇回憶說：「小時候就讀的小學在山腳附近，我經常都在山腳找些草或蟲來玩。走上山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很快就離開了繁囂的城市，從山上望下去，覺得城市很寧靜。到達山上，除了覺得山景非常優美之外，樹的形態也很美，當時見到大樹都會爬一下。望著樹林，心境就覺得很舒暢，覺得與大自然很接近，令人感到舒服。」

詹志勇自小就很喜歡大自然，讀書的時候，他最喜歡的有兩個科目，一個是地理科，因為地理科學既有人文又有大自然；另一個他特別有興趣的科目就是生物，因為覺得動物、植物很多元化，而且那種變化非常有趣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於是這兩個和

近年香港接連塌樹，令到詹志勇從校園走到事發的現場，為樹木「把脈」看病，傳媒更加尊稱他做「樹醫生」。



大自然有關的科目就取得較好的成績。

七十年代要考入大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夠考入港大就更加「光宗耀祖」。當時他就選擇了入讀地理系，繼續他的興趣。作為父母當然希望子女可以找到一份較穩定的職業，或者收入可以接受的職業。他當時生物成績很好，父母就想他當醫生，但幸好詹志勇決定選讀甚麼時，父母沒有對他多加左右。

## 回到石屎森林

地理系畢業後，詹志勇拿到獎學金，決意去英國的雷丁大學深造，修讀農業土壤科學，對當時的香港學生來說，這科相當冷門，那為甚麼仍要往那裡闖？

詹志勇笑說：「我這個人比較理想化，我一直都是只希望求學，或者只考慮對知識渴求的那種慾望，就怎樣去想職業的問題，到畢業後才想到職業。畢業之後下了很大決心，要回到大學教書，當然就要找工作，大學招聘的要求通常很清晰，列明要聘請某一個專業的。那時，我四處申請工作，包括美國、澳洲、英國等，最後香港大學願意聘請我，而且是我畢業的地理系請我回去教書。當時是 1981 年初。」

研究土壤、植物，在香港這一片「石屎森林」的確是相當冷門。他所學的東西究竟有沒有「用武之地」？學成歸來前都還是有疑問。不過詹志勇決定回到香港，利用自己的專長來改變這一片「石屎森林」。當時是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地少人多的環境，一切都以發展為主，綠化幾乎沒有人重視，亦沒有人察覺身邊的樹木有多麼重要。

詹志勇表示：「在英國讀書三年之後，習慣了那邊的生活。那邊空氣好、綠化好、環境質素高，後來回香港工作，在啟德機場剛踏出機場大樓的第一個印象我很深刻，到現在仍歷歷在目，為甚麼這麼灰？由機場大樓出來，全部灰色，一棵樹都沒有。我覺得我們這個城市發展的過程，就一味建樓和建路，忽略了綠化這個元素。建完了樓，建完了路，原來沒有樹，那時才找位置種樹，後果就是會找來一些比較劣質和不足夠的空間來種樹，這樣種樹。這樣綠化，根本不會做得好。」

面對這樣的都市發展模式，詹志勇認為作為學者不可以單單躲在學校教書，於是立志研究城市生態和城市綠化的發展。不過當時香港大專院校不重視學術研究，更何況一般人眼中認為冷門的項目，單單要籌集經費和人手，就已令他頭痛。雖然如此，但大學就可以給他很大的自由度，做甚麼項目，從來都無人指指點點。所以他說香港大學是一所學術絕對自由的大學，但學術自由卻沒有經費，那就要自己想辦法。

## 阻止不了悲劇的發生

近年香港接連塌樹，令到詹志勇從校園走到事發的現場，為樹木「把脈」看病，傳媒更加尊稱他做「樹醫生」，所謂「預防勝於治療」，香港的樹木保育方法，究竟有甚麼問題？

2005年2月13日，林村許願樹因為長期掛滿了寶牒，引致樹枝倒塌，壓傷了兩名擲寶牒的市民。早在出事前，詹志勇就曾經多次透過傳媒提出警告，不過他說當時沒有人理會他，阻止不了事件的發生，他感到很心酸。

詹志勇憶述：「我每一次都呼籲不要再擲寶牒，這已經是第三棵，之前已經殺了兩棵，不要繼續這樣傷害村裡的樹了。如是者說了幾年，也沒有人理會，終於在2005年年初二，就有傳媒打電話給我，說許願樹終於出事，有條枝節塌下來，壓傷了人，我馬上去看，覺得很心酸。當時，我還記得和傳媒朋友講過十個八個為何我們不要再擲寶牒上去的理由，傳媒也登了出來，但是市民和政府都選擇不理會我的呼籲，終於就出了事。出了事之後，當然就作出很典型的香港反應，立即開始做一些措施，而出事之前就不願意做。」

政府亦亡羊補牢，禁止市民再擲寶牒上樹。不過，事後的補救永遠不及防患於未然，他認為政府部門缺乏專業樹木護理知識，塌樹事件仍時有發生，甚至犧牲無辜生命。

2008年8月27日，在赤柱大街屹立了過百年的刺桐樹突然倒塌，其中港大醫科學生莊頌賢送院之後傷重不治。

詹志勇感慨道：「那棵樹在倒塌之前，已經有大量的病徵、大量的身體語言告訴我們，它不行了。但是我們並沒有作出適當措施，以致這棵樹的一截大枝幹斷下來，壓死了這個港大的學生。」

死因庭事後就莊頌賢的死因展開聆訊，當時以獨立專家身份作供的詹志勇在庭上指出，政府負責樹木護理的人員知識水平不足，沒有足夠專業知識護理樹木，是間接導致塌樹的原因。死因庭最終的裁決指事件是一宗意外，但是人為的因素是可以避免的。事件暴露了政府對樹木保育缺乏完整的機制，政府相關部門亦痛定思痛。事件也令公眾開始反思，重視身邊樹木的保育。

詹志勇表示：「作為一個學者，以及一個科學研究的人員，我很努力想將這些科學的知識普及化，以致除了市民之外，有關政府的官員都可以對樹木有多一些認識。香港的發展，不是沒有種樹，只是往往種不得其法，種的品種也不太適合香港這個環境；種了之後，又不懂打理那些樹，或者種了樹之後，便由得它隨著環境惡化。樹亦隨著環境的質素漸走下坡，變得愈來愈不健康。」

## 致力天台綠化

近年詹志勇被政府委任多項公職，例如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委員會、樹木諮詢委員會、城市規劃委員會等等，讓他能夠在樹木保育和城市綠化等問題上，向政府提出專業的意見。

在香港這一片石屎森林當中，以樹木點綴繁囂鬧市，透過光合作用，為市民帶來新鮮的空氣，而在人煙稠密的香港，綠化亦不再局限在地面。港大圖書館的天台，是詹志勇近年研究的基地，這裡種滿了不同品種的植物，用來試驗天台綠化的成效。

詹志勇覺得香港這個城市，地面的綠化空間嚴重缺乏，而長遠來說，要很大規模地增加地面綠化空間，沒有太大可能，因為城市土地缺乏，而且價值太高，政府和發展商捨不得拿出來做綠化。而天台綠化除了提供一個額外的休憩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綠化的天台可以阻隔陽光，有助降低天台下層的室內溫度，減少使用冷氣，達到節能的

效果。

當年詹志勇在香港提出這個新概念，很快就得到政府的關注，更加列入 2006 至 2007 年度施政報告的環保措施之一，日後新落成的政府建築物都要進行天台綠化。此外，商界亦贊助詹志勇研究經費，為十多間學校展開天台綠化，教育下一代。

詹志勇表示：「我們自小也是受害者，我們在學校長大，大部分小學、中學校園都沒有草地。我就利用這些捐款，製造一些草地，屋頂的草地給小朋友，讓他們有機會在草地上坐、跑、玩耍，亦可以利用屋頂綠化，提供一些學習機會。」

詹志勇無論做人處事，一直忠於自己的興趣，堅持理想。他曾經比喻自己為「榕樹」，生長力強盛，不怕障礙、勇往直前。

# 梁紀昌

## 兩次成功「救校」 的校長



### 鮮魚行學校「一夜成名」

要數近年來香港教育界最具爭議的政策，很多人都會認為是 2004 年因為適齡學童人口大幅減少而推出的「殺校」政策。大角咀有一間名為鮮魚行學校的小學，2004 年初亦因收不夠二十三人而面臨「殺校」，這間小學的校長梁紀昌，為了百多名清貧學生，站出來挑戰政府的「殺校」政策。

自從政府在 2004 年推出「殺校」政策之後，在電視、報紙、雜誌都會時常見到梁紀昌，而他領導的鮮魚行學校，亦「一夜成名」。梁紀昌披上戰甲，帶領百多個清貧學生，還有老師及家長，打了一場漂亮的「護校保衛戰」。

梁紀昌 1972 年中學畢業後，到銘基書院報讀預科，他當時只交了第一個月的學費，不夠錢交第二個月，結果讀不到這間預科書院。1972 至 1973 年他出來工作，但覺得這樣下去會浪費了自己，因此下定決心再讀書，到一間培正中文中學讀中六。接著考進了葛量洪師範學院。投考師範學院的原因，主要是只需讀兩年，可以早點出來工作。當時他並沒有甚麼教育理想，只希望盡快找到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

1976 年畢業後，梁紀昌到上水一間村校教書，1982 年進入政府的教育署做學生輔導

梁紀昌披上戰甲，帶領百多個清貧學生，還有老師及家長，打了一場漂亮的「護校保衛戰」。



主任，一做便做了二十年。近年來，香港的社會結構急劇改變，新一代的香港人不再信奉「多孩政策」，很多家庭都只是生一個小孩子，甚至決定不生。而內地來讀書的學童人數則遠少於政府的預算，再加上其他經濟及社會因素的影響，香港自從踏入 2000 年，便出現小學學額嚴重過剩的問題。

教育局在 2004 年推出「殺校」政策，所有在自行分配學位及中央派位兩個階段小一收生不足二十三人的學校，將要「被殺」。梁紀昌便是在這個教育界多事之秋，加入鮮魚行學校做校長。

他回憶道：「我來到這裡的時候，真的嚇我一跳，由最基本的校舍設備到教學情況，以及學生的家庭背景，較我想像中的複雜很多。我來到時，學校像一個廢墟，很殘破，廁所閉塞，百葉窗也是破的，文儀設施十分落後。」

鮮魚行學校先後在 2004 年及 2007 年兩次因為收生不足面臨「被殺」，但梁紀昌兩次都要與政府「對著幹」，政府要「殺」，他出手相救：「2004 年 2 月底，學校收到『殺校令』，因收生不足，三年後要結束。我收到這個消息後很氣憤，我來這間學校一年

多，做出來的改革是有目共睹的，改變了學校的殘舊狀況，我來之前學生對學校沒有歸屬感，但一年後有所改變了，學生變得喜歡上學了。為甚麼要一刀切『殺』這間學校呢？我感到不忿氣，決定要同政府抗爭。」

梁紀昌在做公務員時，做過工會成員，於是他利用工運的方法「救校」，第一步是要爭取曝光：「當時來說我好像打仗一樣。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時候，我曾當過工會的外務秘書，我有工運的經驗，於是套用工運的經驗，向政府抗爭。在我抗爭的策略裡面，我覺得一定要取得社會輿論的支持，才可以對抗那麼強大的政府，而要取得社會的支持，一定要取得傳媒的堅密合作。我當時與傳媒方面緊密合作，很僥倖第一次救校能夠成功。」

## 教育熱誠打動身邊的人

2004年這一關過了，2007年學校又再因收生不足，再次被列入「殺校」名單。今次的難題是要籌一百八十萬元，用「私營小一」的方式「救校」。

鮮魚行學校的辦學團體，很多理事都是靠賣魚為生，當年發生了「孔雀石綠事件」，很多理事自己都失業，但為了一班來自窮困家庭的小朋友能有書讀，他們決定將最後的「棺材本」都拿出來救校。

梁紀昌說：「我們是全港唯一一間學校遭到兩次『殺校』，2007年那次『殺校』，我們得到港九鮮魚行總會的強大支持，該會把所有儲備都投進去，當時來說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因為鮮魚行總會的經費不只是用於學校，還用於會務發展，但會長對教育有很大承擔，說如果這間學校沒有了，這個會生存下去也沒有意義。」

兩次護校成功，梁紀昌指所有的護校行動，學生及家長都是自願參與的。他以教育的熱誠打動了身邊的人，老師、家長都願意為學校站出來，做他的「戰友」。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抗爭，鮮魚行的學生學會了出身雖然沒得選擇的，貧窮並不是罪，但不懂得珍惜、不去上進，才是最大的罪過。

除了學生及家長的支持，舊同事亦暗中給予支援。鮮魚行於 2004 年第一次「殺校」，梁紀昌透露，很多在政府機構工作的舊同事在事件中向他作出提示：「我與政府抗爭期間，我與舊同事的關係很微妙，我收到很多的資料，他們的部署我是知道的，因為是舊同事私底下告訴我的。不過大家兩陣對懸，各為其主，是可以理解的。」

經歷過兩次「殺校」，走過那麼多年的艱苦歲月，鮮魚行學校這幾年的收生人數逐年上升，暫時可以舒一口氣。除了學生、老師、家長及社會人士的幫助外，梁紀昌還要感謝一直在背後支持他的賢內助：「我太太時常取笑我，叫我搬床回學校睡。但我覺得沒有所謂，老夫老妻了。」

梁紀昌有一個花名，叫做「校長爸爸」，鮮魚行學校內的所有學生他都視如己出。每天早上他都在學校門口等學生回校。每個學生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每當小息、放學時，都會有一班學生圍著他，向他索取簽名，因為學生的功課若取得「A-」、「甲-」以上，又或是 100 分，他簽過名後便送一份禮物給他們。

不單這樣，他有時間便會進行家訪，每個學生的家庭狀況他都瞭如指掌。梁紀昌時常取笑自己，說自己不單是當校長，亦是當社工：「做事不再局限在教育，連社福界的範圍也做，這是社會趨勢來的。我覺得沒有問題。作為校長去家訪，學生很受落，覺得有學校的最高領導人去探望他，重燃他生命的希望，覺得受人重視。」

## 家庭收入與學校成績是掛勾的

只有窮過，才會明白窮人之苦。梁紀昌出身基層，明白到生活比任何事都重要，而他坦言當年他加入教育界，只是為了穩定的收入：「我出身基層，家境較窮，我十三歲時爸爸已經不在，一直都是半工半讀，日間上課，晚上上班，星期六、日也要出來工作。我曾與記者一起去家訪時，打開那學生家的雪櫃，雪櫃內只有四隻雞蛋，一雙臘腸，一隻臘鴨腿。而我知道一雙臘腸與臘鴨腿都是學校送的，四隻雞蛋則是他們自己買的，很慘。於是我成立了一個校長基金，就是我在外面演講收回來的錢，全部投入這個基金，用以幫助學生。」

鮮魚行學校的學生，大部分都是來自低收入家庭，有些學生甚至連三餐都成問題。梁紀昌忙完學生的功課與學校的發展，又要四出為學生的生活奔波，因為他明白到最基本的是要令學生得到溫飽，才能令他們用心繼續學業。

他把以前校長室專用的洗手間，改建為食物銀行，裡面儲存很多食物，包括午餐肉、油、米。這些食物是用來幫忙家長的，如果家長生活突然出現困難，沒有錢開飯，便送一些給他們。另外，他又鼓勵學生交齊功課，每完成一星期功課，沒有欠交的話，便送一份食物給他，裡面有米、麪及罐頭。

梁紀昌這幾年在校內推出了很多具創意的計劃，其中「交齊功課獎食物」最受爭議，有人擔心這樣會令學生功利，但梁紀昌並不是這樣想：「透過自己的勞力做齊功課，換取食物，一定要自己付出，不可以說我很窮，攤開雙手問別人拿。至於會否令孩子變得功利？做功課是基本責任，透過做齊功課，給他們一些獎賞，令他們得到食物，而且我經常教學生要有感恩的心，將來要十倍回饋社會。」

曾經做過官，離開建制後，又與政府就「殺校」問題交過手，身份特殊的梁紀昌，見證著香港近二十年的教育改革，他如何看香港現時的教育制度呢？

梁紀昌回應道：「當你還是官的時候，你真的不知道實際情況是如何。舊同事都很脫離實際，不明白前線發生甚麼，亦不明白困難在哪裡。在教育局裡做的官員，很多都把子女送去外國讀書。香港本身的教育制度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問題在哪裡呢？我出來後發覺，因為香港的學校，又或者教育局的看法，純粹是看成績的，而成績是與家庭收入有關的，這是我感受來的。在香港，你看那些傳統名校，又或是直資的貴族學校，學生家庭的收入都是很高的，所以他們的成績是高的，是很合理的。而所謂的薄弱學校，收的學生大部分都是來自基層，可見家庭收入與學校成績是掛勾的。」

便是這種想法，令梁紀昌更加確定自己的路，希望透過教育，去讓他的學生能夠脫離貧窮，在社會有向上游的機會：「我覺得徹底解決貧窮，其中一個方法是提供教育，令小朋友有向上游的機會，不然他們真的會跨代貧窮，一直窮下去，好像以前封建時代有些人要一世做奴隸。」

梁紀昌認為，鮮魚行學校能夠生存到現在，絕對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他很感謝這麼多年來一直支持他的學生、老師、家長，還有很多捐款給學校的香港市民。現時學校已經漸回正軌，梁紀昌正在為接班人的問題煩惱。

# 沈祖堯

## 從「沙士英雄」 到中大校長



### 香港才是我落腳的地方

1959年出生的沈祖堯，陪伴著香港走過高低起伏。六十年代香港最艱難的時期，是他的童年時代。沈祖堯憶述道：「我的童年是六十年代，當時的香港資源匱乏，製造業主要是做塑膠花、紡織業。我在此土生土長，香港對我來說，是我的家，當然有很多回憶。四天制一次水、十號風球香港『亂得一團糟』，這些都在我童年的經歷。我也經歷過香港的暴動。我小時候住在外公的舖裡，他開車房，做汽車噴油、修理的工作；爸爸、媽媽都是由打工仔做起，就學亦是由很普通的小學一直升上去。」

人生有很多抉擇，你選擇了甚麼，其實都表達了某種潛台詞。九七回歸前，香港前途未明，很多香港人都對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失去信心，甚至選擇離開。但香港的一事一物，又是如此令沈祖堯難以忘懷。那麼沈祖堯是如何面對九七回歸的問題？

「九七對於我們家庭當然有很大的衝擊，有一段時間，我全家人都去了加拿大，我自己亦曾在加拿大住過三年，讀博士學位。當時有想過會不會留在那邊不回來，不過始終覺得住在外地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香港，始終是屬於自己的地方，無論在事業發展或人際關係方面，都覺得這才是我落腳的地方。當結了婚、有了小朋友後，亦希望子女是在一個中文環境裡長大，所以完成博士學位回來之後，便沒有想過要離開。」

2003年，沈祖堯獲《時代周刊》選為「亞洲英雄」；2010年，沈祖堯決定離開醫院，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透過教育，繼續貢獻香港。



## 獲《時代周刊》選為「亞洲英雄」

2003年的沙士，香港又再一次面對艱難的時期，疫情令香港人的信心跌到谷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中間隔了一層口罩。沈祖堯當時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內科部主管，他面對著死亡，踏著未知的路，陪著香港人摸索前進。沈祖堯是如何經歷這段艱難時期？

「當時我是部門主任，大家都擔心每一日會不會有同事病了，或者入了醫院，我每天六、七時巡整間醫院，由頂樓巡到樓下，到深切治療部，心情很緊張，每天都需要知道感染數字如何？上升還是下跌？有沒有人去世？有沒有醫護人員離開或者入深切治療部？然後當我巡完房，每晚八至九時，會向整個部門匯報今天的數字，告訴同事關於有事的同事的情況。若情況今天好一點，他們會很開心，一起拍手。每日都承受著很大壓力。」

「真的很累，但那種累不是精神上的疲勞，不是很想睡的那種累，而是心態上很累。每日有很多事發生，每日有大批人入院，或者病人情況有好轉，有的情況則差了。每天都要穿著保護衣，洗手間也不太敢去，因為脫掉保護衣會有危險。當在這工作環境下工作幾個月，心態上會很累。」

「最難受的時候，是見到同事在深切治療部，這裡插一條喉，小便處又插一條喉，吊著幾袋鹽水，又要洗血，而且知道他隨時會離開，而當他的家人、太太，或小朋友在病房詢問你時，每次都不知說甚麼好。我自己也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丈夫，故你會體會到她的心情，那些時候最難受。」

他帶領全醫院上下投入抗疫工作，最終都擺脫黑暗，身上保護衣終於可以脫下。經過這一役後，香港市民都稱他為「沙士英雄」，他更獲《時代周刊》選為當年的「亞洲英雄」。

香港在沙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近三百人感染沙士死亡，單單是淘大花園的大爆發，便已經奪去了四十二條人命。但沈祖堯認為，這次疫情令香港人找到自己的核心價

值，面對逆境的挑戰，已經有了「抗體」。

沈祖堯說：「在沙士時期看到香港人互相幫助的一面，我覺得香港人平時雖然有很多爭拗，但是在有危機的情況下卻很齊心，很多歌星出來唱歌籌款，很多不同的組織都走出來，鞏固了大家對香港的信心。我覺得像身體對傳染病的抵抗能力那樣，當你感染了一種病，便會出現很多抗體，很高水平的抗體；當病過了，抗體的數字便會下降，雖然水平很低，但不是失去了，下次再有同類型的病菌出現的時候，抗體數量很快便會上升。」

## 未上任校長已面對挑戰

2010年，沈祖堯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他決定離開醫院，出任中文大學校長，透過教育，繼續貢獻香港。

沈祖堯是傑出的腸胃病專家，是腸胃病研究的世界權威，他率領的研究團隊，證實了幽門螺旋菌感染與胃潰瘍的關係，並率先採用內視鏡來治療潰瘍出血，減少了動手術的需要，改變了國際上醫治腸胃科慣常的做法。

1985年他開始在中大的教學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1999至2010年間出任中大醫學院內科學系主任。2010年7月1日，他正式接任中文大學校長。為何他會作出這個決定？

「我們需要栽培下一代的年輕人，不單是要從專業知識上去充實，還是給他一個正確的做人價值觀及方向；不止是醫學院的學生，就連唸法律、經濟、科學的學生，都要對整個人類、整個社會有一個承擔，不是只顧自己賺到錢，可以發達、可以享受，所以就決定在教育上去盡力。」

但在未上任前，他已經要面對來自中大學生會及社會的挑戰。2010年6月，距離他正式上任還有大約一個月，便發生了「民主女神像事件」。中大學生會連同其他社會團體，要求在「六四」燭光晚會後，將曾經被警方沒收的「新民主女神像」，永久安放在

中大校園內。但是當時中大的管理層以大學應該「政治中立」為由，拒絕學生會的要求。當時身在外地的沈祖堯意識到事件已不會單純是「民主女神像」安置在哪裡的問題，而是已經發展到政治層面，他十萬火急透過電郵提醒管理層「政治中立」這個理由會引起反彈，但管理層並沒有理會。

沈祖堯當時以中大候任校長的身份回應有關事件時，語出驚人，令學生另眼相看。當時他說：「中文大學絕對尊重言論自由及各種不同意見、不同政見的表達，我們絕對沒有意思禁止或者打壓任何的表達方式。以後神像擺放的方式、地點、時間，會繼續與學校的同事與學生繼續商討，達到一個大家都能滿意又覺得合適的方法。」

結果中大學生會在校方未答應的情況下，晚上將「民主女神像」運到港鐵中大站對開的空地，不少同學夾道歡迎。

## 被學生喚作「親民校長」

沈祖堯上任中大校長後，做了很多前任校長不會做的事。他會放下身段，與學生、同事一起過新年、過中秋，世界盃的時候又會穿上荷蘭足球隊的球衣與學生一同看球賽。在中大發出的新聞稿中，你可以見到貴為校長的沈祖堯會舉起「V」字手勢，與學生一起拍照。很多中大學生都忽然感覺校長「原來這麼近」，而沈祖堯在上任短短幾個月之後，已經被學生喚作「親民校長」。

校長與學生的關係應該如何？沈祖堯做校長有自己的一套哲學，首要切忌「高高在上」：「我覺得校長不應該只是行政人員的身份，坐在辦公室內開會、看文件，我覺得我需要走出來，走到人群中間，與他們交流，所以很多活動的參與，不是為了親民而親民，而是覺得我要在他們中間，令他們覺得我是他們的一份子，願意聽他們的聲音，然後有時他們有好意見，應該要採納，他們有不同的看法，應該去聽一下，亦給我去解釋為甚麼我會這樣看，為甚麼方向會這樣走。我在遴選時，我跟他們說我不想做一個在辦公室內的校長。」

學生參加學生運動難免激進，沈祖堯是一個思想開放的校長，他認為有不同的聲音是

正常的，但即使激辯，也要理性和尊重：「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大學內有不同的知識份子，因此有很多不同的見解，可能是政見，可能是人生看法，或做人道理。在社會內沒可能所有人的聲音都一樣，沒可能所有人的看法一樣，一定有不同的看法。大學應該存著包容、開放的態度，讓任何聲音發聲，不會偏幫任何一方。在過去這段日子，我與同學、老師接觸多了，我看到有一部分學生意識到社會有問題，他們用不同方式表達，其實是一件好事，但我們希望他們對問題能有更多深入的認識，從不同角度去看這問題，而不單是一種抗衡的聲音，並且想一下如何令社會改善，如何令問題得以改善。」

# 任詠華

## 「女性諾貝爾獎」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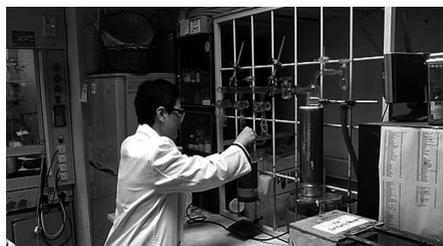
### 做科研沒有捷徑

入夜後的巴黎鐵塔，發放著璀璨燈光，令人陶醉。不過在任詠華這個專門研究發光分子的香港女性科學家眼中，卻有不一樣的體會：「看到燈光，想到現在大部分燈光是用鎢絲燈泡，這種其實是很舊的科技，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能源都是用來做熱能，很少部分用來做光能，這變成是一個很浪費的能源。」

任詠華是香港大學化學系教授，在 2011 年 3 月到巴黎，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頒獎禮每年舉行一次，專門由五大洲挑選五個有卓越科研成就的女性科學家，任詠華是亞太區的代表，而這個獎亦被公認為「女性諾貝爾獎」，地位崇高。

任詠華說：「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由小學直至博士學位，我都在香港讀書。後來獲獎就如為香港人打了一支強心針，對本土的教育尋回點信心。其實，這不只是對我一個人的工作認同，而是對香港整個科研界很大的鼓舞，因為這是一個國際性的認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一個女性諾貝爾獎，背後付出多少汗水、多少個晝夜，不為外人道。這個獎座由巴黎帶回來香港，任詠華並沒有選擇放在家中，而是獎座放在辦公室裡，她說獎項是屬於全組研究人員努力得來的成果。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任詠華，不著重金錢的回報，她由自己的興趣出發去做選擇。然後，她專注地默默耕耘，最終在喜愛的化學領域中創出驕人成績。她認為自己能有今日的成就，有賴身邊眾多人的支持。



有機金屬發光材料，其實就是任詠華長年累月開發及測試出來的成果之一。相信複雜的分子結構圖，很多人都看不明白，但它們的結構，便是由任詠華重新把金屬原子及有機分子結合，組成這個有機金屬配合物，亦即是一些會發光的液體。它們不單可以直接塗在膠片上或者玻璃上，然後發光。環保省電之餘，還改變了一向的傳統發光模式，那就是燈泡的固有形狀。任詠華在研究上的最大成就，便是發現到這些發光液體原來可以有效地吸收及儲存太陽能，然後轉為電能，之後用來製造出太陽能電池，長遠來說可以幫助解決能源短缺問題。

任詠華經常強調自己的科研是屬於基礎研究，即是由完全不存在的東西，透過基礎研究變成對人類影響深遠的發明成果，她說：「基礎研究，一般人看來好像沒有用處，但是很多東西若沒有一個很好的基礎研究，根本就不能再進一步，得到更好的應用前景。其實，很多發明和科研成果，都是在無意中發現的。而且，有很多重要的發明，都是源自好奇心的推動才研製成功的。因此，並不是每一樣發明，都是有目的才做的。其實一個國家的強與盛，與基礎研究是有很大關係的。」

專注是任詠華做科研的座右銘，她表示：「做科學不只是為了發文章，而是有一個想解

決的問題，於是就很系統性地專注研究，當你在某範疇取得好的成績後，別人就會覺得你在某方面是有貢獻的。在我看來，當進行一項工作時，若滿腦子都在想怎樣去走捷徑或計算回報，心存雜念，以致不能專注地去做科研，最後反而得不到成效。」

## 當選為最年輕的中國科學院院士

四十八歲的任詠華，形容自己非常偏愛化學，所以同化學結下不解之緣。在拔萃女書院的中學時代，最喜歡就是到實驗室做化學實驗。任詠華成績彪炳，會考考獲 4A、4B 佳績，高考考獲 1A、2C，考取 A 級的正是她最愛的化學科。當時，學校為她分別報了香港和英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大學，這些學校全都回覆收取她讀醫科或者藥劑學。不過，任詠華當時並沒有選擇「可以賺錢」或者被視為「前途無可限量」的醫科，反而是選了自己最有興趣，但有些人會認為是「賺不到錢」兼「不太好前途」的化學系。

選擇在香港升學，沒有去外國讀書，任詠華並沒有後悔：「我覺得如果無心向學的話，就算將你送到全世界第一的大學去讀，也是沒有用的。其實，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心去做，所以不可以說在香港培養出來的學生就一定好或者不好。凡事沒有絕對，即使是最優秀的學校都有不好的學生，不好的學校亦會有優秀的學生。」

1985 年，任詠華在港大化學系一級榮譽畢業，之後留在港大化學系做教授，兩年間已經榮升為系主任。在擔任系主任期間，以三十八歲之齡當選為最年輕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又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以及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被問及每天工作多少小時，任詠華表示：「我沒有計算過，但肯定超過十三、四個小時。若不工作的話，我會渾身不自在，有時一放假我便病，家人有時會嘲笑我，叫我回去實驗室嗅一下化學物，就會回復精神。」任詠華形容，她能夠放這麼多時間在科研上，做到今日的成绩，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丈夫的體諒：「丈夫很了解我，思想較為開放。我也是一個非傳統的人，我們都覺得不一定要是男主外、女主內。」

任詠華和丈夫以及兩個女兒，一家四口，生活樂也融融。作為一個女性科學家，又自稱工作狂，原來連生小孩的前一刻，都仍然留在實驗室內，為事業拚搏，她憶述：「我

第一次懷孕時，身體初時不太適應，但過了首幾個月，就又可以全身投入工作了。我生第二個女兒那一天，我仍然留在實驗室工作，然後自己駕車去醫院。我未生孩子前，我在星期日都是在工作，後來有了小朋友，因為覺得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媽媽，需要與小朋友多些溝通，趁她們還小，仍肯跟我共處時，花多些時間陪伴她們，所以，星期日就選擇留在家裏，不回實驗室了，不過還是會帶工作回家做。」

## 受中學老師啟發

在家教育小朋友，上班就教授學生、研究生。任詠華說，對於學生的犯錯，她會作出直接的批評。在著名的巴黎景點凱旋門前，任詠華就以拿破崙作為比喻，指出做科學家就要學懂如何接受別人的批評：「我想不要過份自信，凡事應該從多方面去想，不要偏向一邊去想。做科學亦要思想開明，接受不同的意見和批評。我會跟學生說，我不是一個轉彎抹角、說話婉轉的人。我覺得別人對你有批評，一定是有緣由的，研究一下如何改善才是更重要。所以一個人肯接受批評，才會有進步，我一向深信這個道理。」

做事認真、嚴謹、追求完美，任詠華說是受了中學時代教生物科的簡老師的影響，簡老師對她往後的人生有深遠的影響：「她是嚴謹的老師，對我們要求很高，所以上她的課，每個同學都有點害怕，都會溫習她之前教過的東西，因為她會隨時叫你起立，問問題，所以上課一定要留心，知道她在講甚麼。因此，我覺得只有要求高，才會有進步，才會做得好。那時，這位老師到了快要臨盆的時候，她仍在教學，而且因為要應付中學會考，她還為我們補課。我記得讀中六、中七時，她講過一句說話就是『敬業樂業』，這句說話我一直都記得，也成為我的一個座右銘。你既然喜愛一樣東西，就要盡你全力去做，做得好與壞並不是問題，最重要是不要苟且地去應付。」

「女性諾貝爾獎」的國際殊榮，對她來說，並未到終點，她說：「我不覺得我自己很成功，我覺得這只是我的起步，我對自己仍未滿意。」任詠華的目標，跟全球所有為了解決能源問題的科學家一樣，希望最終能找到一個方法成功分解水的分子，可以得出氫氣這種乾淨的能源。



# 陳易希、李安琪

## 香港之星

### 星之子獲國際科學大賽二等獎

有夢想就要去追，那麼你就會成功，聽起來好像很簡單，要成功是靠天才，還是後天的努力呢？

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回到中學母校，竟然有「粉絲」，還有中學生也以他為榜樣。其中一位同學黃深銘說：「見到他有這樣的成就，我也會更加努力，希望可以如他一樣得到粒星星。」

這位師兄的魅力，就是來自他有一顆「陳易希星」。

陳易希成功摘星，源自他對機械人的好奇，他說：「透過科幻片，我產生了一個想法：機械人在未來應該會被經常性且普遍地使用，再加上見到網絡技術的發達，估計很多年後，無線網路一定是一個大趨勢，所以開始從網絡、影像識別，以及機械人這三方面出發，希望可以做到一些比較『未來』的東西。最初甚麼都不懂，全部都是靠嘗試，全部都是碰碰撞撞做出來。例如我的第一個機械人，當中有很多問題，仍是不穩定。」

陳易希的英文科老師陳明姬憶述：「他一邊翻開一本又一本厚厚的關於零件和電子的



成功的人沒有地域界限，只要肯努力朝著理想進發，每個人都可以像星星般燦爛。



書，一邊做實驗，找不到答案他不會停下來，或者會打電話看看有沒有人在那一刻可以教到他，之後他又再翻書繼續做。我覺得在中三這個階段，很難得有小朋友可以做到這個程度。每逢晚上，我們留在學校工作，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每當他得出一些答案，他就會跳出來很開心地說：『我做到了』，真的是跳出來的。」

憑著家居智能保安機械人，他在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擊敗一百四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獲得工程學二等獎。

陳易希憶述獲獎的一刻：「當宣佈二等獎時，我沒有想過自己有機會得獎，因為我並沒有概念，也不知道甚麼標準才可以得獎。當宣佈我的名字時，全部香港代表隊的人都很開心地跳起來，上台時我仍是呆呆的，都不知如何去面對，真的是在意料之外的事。」

他的機械人獲得評判肯定，得到二等獎，可以在銀河系中，有一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編號 20780 的小行星，這顆星位於木星和火星間的小行星帶，繞著太陽行一周要四年時間。得到一顆星，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 破格取錄入讀科大

一顆星，帶給陳易希更多意想不到的經歷，與中國航天員見面，設計發射水火箭程式，出版《摘星少年》，亞運會時負責傳第五十四棒聖火。

之後更獲得香港科技大學垂青，破格取錄入讀電子及計算機工程系學士課程，是科大首次取錄中五畢業生，不用考會考和高考就直接入讀大學的基礎課程。不過，他會考最後只得十二分，這引起社會上不少爭議，質疑他的能力，但他的中學校長方順源卻認為跳級無問題：「每個人的潛能都不一樣的，是否一定硬性要他們完成會考、高考，才花時間發揮潛能呢？如果是這樣，陳易希肯定不行。」

陳易希說不喜歡考試，認為發明的過程中獲得的知識更為實在。他說：「你問我有沒有想過循正常途徑考試入大學？如果在兩者中選擇，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訴你，當時我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如果有機會，我都不會選擇考試進來。我也有一定的壓力，第一就是不知道傳媒、外界怎樣看呢？第二是我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處理？當時仍就讀中學，會不會有很多東西跟不上？其實我也有很大壓力，很害怕。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既然都已經進來，選擇了這條路，那就只得一條路可以走，就是做到最好。」

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客座助理胡錦添教授說：「現在陳易希造一架直升機，他希望用 iPhone 去控制，作為直升機的主腦。他比較主動去發掘身邊的事物，而且都與科技有關，例如有一些新科技出台，他就會思考這件新科技有沒有即時的應用。」

陳易希雖然長大了，對科研仍然是充滿熱誠，對身邊的事物仍是充滿好奇心：「我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天才，只不過我投放更多時間去處理一些問題、設計和研究。我很喜歡接受新挑戰，其實科研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可以時常去創新，製造出特別的東西，過程中會給我帶來很大的成功感，因為過程當中需要解決很多問題。我天生很喜歡研究，鑽入問題然後去找出解決方法，由小時候開始就覺得研究很好玩。由小到大都很想做一些研究或一些發明來幫助這個世界，影響這個社會，而這並不是一個職業。」

陳易希對科研的熱誠，就好像他的小行星一樣，會繼續發熱發亮。

## 天水圍之星

不少人把天水圍形容成一座圍城，有一天城內突然出現了一顆李安琪星，照亮了這個圍城。李安琪星距離地球二億五千多公里，同陳易希星一樣，都是觸摸不到，肉眼亦看不到的，但李安琪覺得小行星十分實在，她說：「覺得很驚訝，得到消息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努力終於有人肯定。」

李安琪的爸爸是地盤工人，媽媽由內地來港之前，是幼稚園教師，但來香港後只可以當保安員。初來香港時，由於居住環境的改變，以及擔心新移民的身份會遭人排斥，李安琪很不開心。

談及受歧視的問題，李安琪的媽媽回憶說：「我和她去找學校時，學校聽到她由內地來港，初初都不肯接收，後來我拿了她的成績表去，幸好她在內地讀的那一個學年成績很好，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見到她的成績就立刻取錄她。我覺得很欣慰。」

找到學校後，又要加把勁讀英文。因為在廣州讀幼稚園和小學，都沒有教英文。李安琪說：「一來到香港，那時是一年級下學期，老師已經開始教英文生字，也有教一些簡單句式，當時我剛來到香港，連英文字母都不能分辨，完全不懂得英文，英文成績十分差。」

苦追英文幾年，之後就年年全級考第一。安琪除了成績優異，還有一份好奇心，安琪好奇的是茶。而淡淡的茶香，亦代表著她對祖母的思念。安琪的祖母患肝癌離世，看著親人被病魔折磨，安琪希望找到方法幫助患病病人對抗病魔，抑制癌細胞增生。

於是她開始閱讀與茶有關的書，從而得知茶含有抗氧化劑，加上得到學校的支持，她中四的時候開始在這方面做研究。她先是發現烏龍茶含有六點五毫克茶多酚成份，之後她繼續研究，發現烏龍茶在抑制前列腺癌或肝癌癌細胞活性方面是最好的。

她憶述當時的情況：「第一次做到烏龍茶真的可以抑制癌細胞的活性，當時覺得很開心，因為自己做了研究這麼久，終於都有成果了，很快又會覺得不能開心得太早，因為才是第一次有成果，要反覆做很多次，才能確定自己的研究是否成功。」

雖然她未能在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獲獎，不過她的發現得到醫學界的認同，她的論文最近更刊登在一本國際醫藥期刊上。

## 希望以自己能力考入大學

成果其實得來不易，她曾經花了一段時間在香港城市大學做細胞培植的研究，指導她的張漢揚教授雖然不覺得她特別有天分，但安琪那份毅力和決心，令他印象深刻：「茶多酚是一種抗氧化的物質，對於很多細胞有抗氧化的作用，科學界都略有所知，也有報道過。但一個中學生能夠與一個科學家以科學家的手法、水平，研究它對癌細胞的抑制生長或作用在哪兒，這已是相當深入的研究，差不多是屬於研究院的課題了。其實做科研的人，最重要是有毅力，不怕失敗，其實她一開開始亦曾試過幾次失敗，但她都能重頭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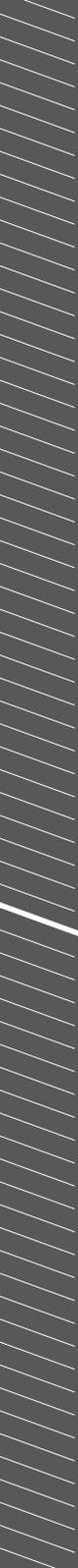
李安琪也說：「其實當時都很辛苦，因為要看很多資料，也要做很多假設，其實不知道整個研究究竟會否有成果，特別是英文的論文，有很多專業用字，自己其實是看不明白的。」

學校老師對安琪的支持，安琪都十分感激：「老師會陪我留在學校，準備口頭報告和準備整篇論文，他們曾經陪我直至凌晨十二時多才離開，我很開心遇到他們，因為他們給我很多支持和幫助。」

雖然安琪讀書成績好，又有名氣，但她沒有因此而驕傲。她的好友許燕華說：「她為人其實很隨和，一點也不像書呆子。雖然由中一至中四，她的成績皆是全級第一，但她並沒有架子，小息時經常和同學玩。」

安琪與其他中五學生一樣，將要應戰首屆中學文憑試。她希望將來可以成為醫生或藥

劑師。曾經有報道指中大校長沈祖堯向她招手，去中大讀醫科，不過被她拒絕。安琪澄清無此事，但如果真的有這個機會，她亦都希望以自己能力達成目標。



第三部分

# 文化藝術界



# 曾灶財

## 九龍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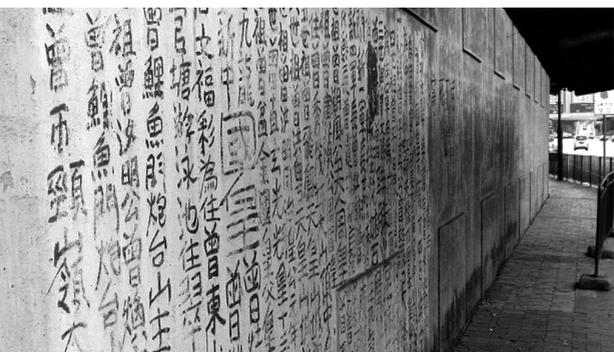


### 甘為皇帝的追隨者

曾灶財的街頭書法，是香港人的回憶。攝影師朱迅喜歡用鏡頭拍下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十多年前開始，便跟著曾灶財去遍大街小巷，將九龍皇帝的行為藝術紀錄在膠捲上，憶起曾灶財，他說：「很多人都認為他精神有問題，其實他是很風趣的老人家。我叫他皇帝，因為我真的當他皇帝般，請他帶我看看他的土地，看看他的領域，看看他的作品。他堅持不懈地寫，希望取回屬於自己的東西，取回一個公道。」

跟朱迅一樣，鍾燕齊在 1992 年的一天認識了九龍皇帝，十多年來更陪著財叔行完人生最後一段路。那天，鍾燕齊碰巧經過旺角彌敦道，見到人群中正在寫電箱的財叔，想起當時的情景，鍾燕齊仍是歷歷在目：「財叔寫到沒有墨水，他就叫『墨水』。前面沒有人理會他，我便從後面擠上前去，幫他倒墨水。當他寫完時，我就走上前跟他閒聊，因他的行動不便，我便提出送他回家。那次，我只問他拿了電話號碼。然後，我就離開香港了，事隔超過四年才再回到香港。突然有一天心血來潮，我給他打了個電話，並前去探望他。雖然他對我不會有印象，但卻吩咐我給他買飯，及其他東西，如是者經過了大約六個月，他才開始問我叫甚麼名字，之後才記得我叫『阿鍾』。」

一天，鍾燕齊來到觀塘翠屏村，重遊財叔的故居，憶起跟皇帝共處的點滴，鍾燕齊



曾灶財自稱「九龍皇帝」，是一名香港街頭塗鴉者，塗鴉創作均用毛筆書寫之漢字。行文講述自己以及家族的過往事蹟，以及「宣示」對九龍的「主權」。他雖然不良於行，然而九龍各區包括觀塘、尖沙咀天星碼頭、坪石邨、翠屏邨等，以至九龍以外的香港島中環和西環等地都可見他的筆跡。

說：「以前都一定會帶汽水、毛筆、墨水上去找他。至於吃甚麼飯，即使你不問，只要一打電話給他，他自己就會吩咐你。早期他通常吃豆腐火腩飯，但後期就吃豆腐斑腩飯，減少了肥肉，可是可樂就是必定要買的。除此之外，他便不會吩咐我做其他事，又不會要我幫他拿東西，走路也不需要人扶，他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即使行動不方便，財叔仍然堅持每日四處寫，但跟著出巡十多年的鍾燕齊說：「他自己也不知道哪裡才是下一站？他一般都是走到一個地方，覺得那個位置好、地方夠大，他就在那裡寫。我最近收到一些照片，發現他最遠原來是去到柴灣及筲箕灣。另外還有赤柱，我也不知道他為甚麼會跑到赤柱，在巴士站外寫字。如果他的精神有問題，去這麼遠他怎麼懂得回家呢？所以其實他仍很清醒。別人經常問我跟財叔甚麼關係，他是皇帝，我為他倒墨水，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開始，我就是他的書僮。」

## 皇帝的身世

曾灶財十六歲時來香港，當過低下層苦力、建築工人、紡織工人，又在元朗的花園當花農。那麼，九龍皇帝是甚麼時候真正開始寫字呢？有人說是在他三十五歲準備結

婚，翻查自己的身世、族譜時，發現根據族譜的記載原來香港有很多地方都屬於曾姓家族的。

「他的墨寶很多都是提及他的族譜，最早期他寫他的太公曾廣禎，曾廣禎是他家族的第一世太公，是以前周朝的丞相，所以他叫他周皇。」對曾灶財作品瞭如指掌的鍾燕齊趣味盎然地分析道：「然後，他又寫一世、二世、三世祖等及以往曾住過的地方，和他經常去的三山國王廟。其餘大部分都是他親身經歷過的事情，也提及他兒子的名字，他住的翠樂樓，最後就是永遠都會出現的『曾灶財國王字』。」

## 九龍皇帝駕崩了

2007年7月25日，九龍皇帝「駕崩」消息曝光後，香港報章均有大篇幅的報導。對於他的死訊，鍾燕齊感到非常突然：「據醫生說，他的去世是因為心肌梗塞，但之前也因為肺水腫而進過醫院。當我確認了他的死訊後，仍不是很相信，因為我覺得財叔的長相，他的五官看起來很像一尊佛，加上他本身開心的造型，我常說他起碼可以活到九十九歲，而他離開的時候只有八十六歲，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很突然。」

這天，鍾燕齊與兩位朋友帶備冥鎚，三罐財叔生前最喜愛的可樂來探望財叔，而且還帶來了親筆繪畫的幾瓶大墨汁以及不同大小的毛筆來送給財叔，鍾燕齊一邊為財叔燒冥鎚，一邊大叫著請財叔來收取，他紅著眼眶說：「財叔離開前，我問過他為甚麼沒有寫『國王』了，他說不做皇帝了。那一剎我覺得很突然，但轉念間我又有點替他高興。他影響了很多人，他為香港人的文化留下了一個永不磨滅的標誌。其實，財叔的犧牲也不少，他犧牲了跟家人相處的時間，為香港文化留下了國際都知道的事情。所以財叔的犧牲很大，他的家人犧牲也很大。」

## 財叔精神的延續

鍾燕齊發起以行為藝術紀念九龍皇帝的行動，對於這次行動，他解釋道：「我們在以往有財叔作品的地方去做創作，其實香港的公共空間，香港市民皆有權使用。我們希望透過公共空間去實施教育，尤其是藝術及創意方面的教育。因為香港人太繁忙，一百

個人之中可能只有兩、三個人曾經去過博物館、藝術館，或者展覽室。可是，這些公共空間他們卻每日都會經過，在潛移默化間，市民就會不知不覺地提升對藝術的欣賞力。曾灶財所有的作品內容，都是來自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本土文化。由 1997 年開始便講到現在的創意產業的重點核心，其實是要保留香港的文化，而財叔遺留下來的正是香港文化中最可貴的東西。橫跨半個世紀，幾個不同年代的人都對財叔有深刻的印象，無論他們喜不喜歡，但都知道財叔的作品，記得九龍皇帝這個人。」

參與這次行動的還有公共藝術家 Thomas，他說：「這次是我的第三輯九龍皇帝的作品，我的作品都是圍繞著他寫過字的地方，這次是界限街火車站橋下。其實這是曾灶財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墨寶，但一個月前卻給塗抹了。不知道為甚麼？自從他過世後，他的墨寶消失得很快，現在已所剩無幾了。這件事提醒了我們甚麼呢？香港有一些價值已經失去了，再不復見，這激發起了我創作的意念。」

鍾燕齊認為財叔的精神是一種自我的堅持：「以前有些人看財叔，覺得他很不正常，但他們有沒有想過自己本身的觀點，又是否正常呢？我的作品將文字反轉，是希望經過的人看到時，可以有多點角度，對各事物存有包容之心。以往財叔在街上寫字的過程其實是很辛苦的，因為當我自己這樣做時我便感受到。財叔平時上街一寫便是數個小時，有時更會有警察來干預，但他大都不會理會，只是堅持寫下去。」

讀大學的 Adrian 跟同學 Chriz 一起用攝影機紀錄九龍皇帝在石屎森林中所剩無幾的墨寶，Adrian 有感而發：「為何不能將這些墨寶保留變成作品，或者變成一個創作平台，帶我們跳出框框，從另一角度去創作？接觸了財叔後，我想再寫毛筆字，我們現在都是打字。」Chriz 也說：「現在，我們想說甚麼，想表達甚麼，就上載至網絡放上 YOUTUBE、放上討論區。但我認識到財叔真的不理會別人的目光，在街上、燈柱上，就連警局外的燈柱上也寫下對社會、對政府的控訴，真的很厲害。」

鍾燕齊說曾灶財的字，有些是橫跨兩行或幾行的，已破了中國書法的行氣，否定了所有傳統的中國書法體，也不會理會甚麼是楷書、隸書、草書、行書，這就是財叔的書法體。曾灶財的藝術竟然可以推至國際，為港爭光，實在是令人欣慰。

# Uncle Ray

## 香港樂壇教父



### 傳播音樂訊息

Uncle Ray 自小鍾情音樂，入行初期在麗的工作，為音樂節目寫稿，他負責寫稿的兩個節目都很受歡迎，然而他心中卻另有打算：「其實，當時我心中更想的是由自己開聲介紹，不是說我想做 DJ，而是覺得我所寫的音樂人都是我很熟悉的，如果由別人來介紹好像不是太好。於是，我自薦開咪，怎料上司爽快地答應了。更想不到的是，我之後竟然開始紅了。每個星期，我都負責介紹一大堆唱片。五十年代，甚麼音樂都有，我覺得這份工作很適合我。」

六十年代的年輕人，喜歡聽歌學英文，這令 Uncle Ray 這個介紹英文歌曲的節目漸受歡迎。直到現在，很多移居外地多年的聽眾都仍然記得六十年代，他們是如何透過電台播放的歌曲去學英文的。

Uncle Ray 認為 DJ 做節目時要以愉快的心情說話，將開心的氣氛傳遞給聽眾。他也會將要播放的歌曲內容向聽眾解釋，盡力讓聽眾明白歌詞的意思，讓他們接收到歌曲所要傳達的訊息。



四十多年來，Uncle Ray 風雨不改，每晚十點鐘準時在電台開咪，透過大氣電波為聽眾放送各類型的英文歌曲。戴帽子、蓄鬍子，是我們認識中「香港樂壇教父」Uncle Ray 的鮮明形象，一見難忘。Uncle Ray 深明 DJ 要有個人風格，他要別人一眼就認出 Uncle Ray，他堅定地聲明：「這個形象我永遠都不改了。」

## 三次親訪披頭四

六十年代，英國樂隊披頭四（Beatles）歌曲盛行，萬千歌迷為之瘋狂，各傳媒爭相採訪，他們的受歡迎程度可謂後無來者。一個 DJ 若能在人生中訪問披頭四一次，已經很難得，但 Uncle Ray 竟然得到三次訪問機會，難怪他憶起往事，仍然難掩興奮之情：「我真的感覺我好像中了馬票。」

Uncle Ray 第一次訪問披頭四是在英國：「那時我到 EMI 唱片公司的寫字樓，見一位香港經理人介紹的朋友。我與他雖然不是很熟稔，但當他知道我想在英國做些訪問帶回香港在節目中播放，他便熱心地替我約見在我訪問名單排第一位的披頭四。我真的想不到我眼前這個人的職位這麼高，他一通電話便聯絡到披頭四經理人艾普斯坦，說有個香港年輕 DJ 想訪問披頭四，然後很順利地約好時間。翌日下午我就出發去訪問披頭四了。」

直至今日，Uncle Ray 仍牢記當日與披頭四見面的每一個細節，他興味盎然地憶述：「我到達訪問地點時，第一個在門口迎接的就是保羅麥卡尼，他對我說『歡迎』，我應了一句『多謝』。當時，我的聲音有點顫抖，披頭四這麼有名，他們錄甚麼歌都是銷量第一，他們會如何對待我呢？心中盡是忐忑。第二天我看報紙，見到披頭四又有訪問，這次是開放給海外記者的，我來自香港，當然也是海外記者。於是，我又逮到機會，拿著 EMI 那部很重的錄音機便又出發了。保羅仍然是第一個在門口迎接，這次他認得我了，更問我從哪裡來。當他聽到是香港時，他告訴我他們將會去香港。及後，在啟德機場，我又見到他們四人，進行了第三次的訪問。」

## 樂在其中

Uncle Ray 形容自己與音樂好像一對伴侶，看他家中收藏著各式各樣的懷舊唱片，就知道他對音樂的愛有多深。

說起 DJ 之道，Uncle Ray 樂於分享：「做這行有幾點要注意，一是要跟隨潮流，如果想做出名的 DJ，一定要令聽眾喜歡聽你的節目，而你也要找出適合你的聽眾聽的音

樂。二是要想辦法將工作與自己的興趣融合，例如我本人非常喜歡民歌，又喜歡樂與怒，所以在做一個無論是半小時或一小時的節目，我就會想盡辦法把樂與怒和民歌混合。最後，選歌首先是要選歌星，歌星要唱得好，他的歌曲才值得介紹。」

多年來，Uncle Ray 聽過及播過無數的英文歌曲，不過在他心目中，至今仍然覺得披頭四的歌曲是最特別的。他強調：「披頭四的歌曲真是很特別，不只是我說，每個 DJ 都是這樣說，甚至很多歌星都是這樣說。披頭四很有才華，約翰連儂和保羅麥卡尼所作的歌，直到今日仍很流行。」

Uncle Ray 曾經組過樂團，亦曾與多位六、七十年代唱英文歌曲的歌星合作。他主持的電台節目開辦至今已長達四十多年，並打入健力士世界紀錄，1998 年獲香港電台頒發「廣播成就榮譽獎」，表揚他在廣播界的貢獻，他說音樂可以令人快樂，令他每一天都樂在其中。

# 鍾偉明

## 播音皇帝



### 風頭直迫明星

七八十年代，香港的小市民經濟緊絀，沒有太多金錢可花於娛樂上，最喜歡就是聽收音機，已故的「播音皇帝」鍾偉明是很多市民的偶像，他的聲音透過大氣電波感染了萬千聽眾。

鍾大哥生動及繪形繪聲的演繹，加上經常擔當劇中的主角，很快成為聽眾的偶像。當時報紙亦會刊登廣播劇的內容，他的風頭與明星不遑多讓，不少聽眾更會特意去涼茶舖收聽鍾大哥的廣播劇，叫一碗一毫子的涼茶然後坐下來聽廣播劇，若交出兩毫子，你想坐到甚麼時候都可以。

鍾大哥當年以講述國術小說出名，但他不懂武術，究竟如何講呢？鍾偉明當時已經開始單人講述廣播劇了，當主任問他有沒有興趣講武俠小說時，鍾偉明亦有所顧慮，他回憶：「當時我是有興趣，但我不懂得武術，如何講呢？怎料主任說不要緊，還帶我去見朱愚齋師傅。朱愚齋師傅就是林世榮的徒弟，即是黃飛鴻的徒孫。他拿出一本《陸阿采別傳》，叫我看看有沒有興趣講，我連看都沒有看，便表示有興趣。只是我不懂得武術如何講呢？他說不要緊，他可以教我。於是，我就開始嘗試講《陸阿采別傳》。」

「香港對越南難民船民，已經實施甄別政策，跟著這段越南話廣播，就是向他們講述這個政策內容。」

在七八十年代，一扭開收音機，經常都會聽到這段講述「越南船民」的聲帶，這把聲音就是來自「播音皇帝」鍾偉明。人稱「鍾大哥」的鍾偉明聲線獨特，加入廣播界時只得十六歲，當時他有一群一起學演戲的朋友，一同組成「山月同學會」，第一次在香港電台演出首個廣播劇叫《復活的玫瑰》。



## 退而不休

鍾偉明曾說：「從事廣播工作可以說是非常繁忙，有時也感到非常吃力。所以我常常鼓勵自己別怕吃苦，也不要怕吃虧。因為如果怕吃虧，會錯過很多學習機會。」

1991年，鍾大哥退休，減少廣播劇演出，不過他仍然在港台主持多個長者節目，包括每逢星期日早上七點至九點的「松柏之聲」、星期三早上和錢佩佩一起主持的「香江暖流」，還有「耆樂無窮」等等。1992年，鍾偉明獲英女皇頒授 MBE 勳銜，在香港廣播界首位華人獲得這個榮譽，這奠定了他在廣播界地位。1998年鍾大哥獲頒「廣播成就榮譽獎」，讚揚他在廣播界的貢獻。

在慶祝鍾大哥入行六十年的晚宴上，鍾偉明在台上說：「這份工作其實很難做，很辛苦，相信在座的老朋友，以及我的良師，大家都認識超過半個世紀，我很多謝你們當年給我的教導，給我的支持與愛護，令我逐漸愛上廣播的工作，愛上了之後更不離不棄，朝著廣播的三大目標——教育、通訊、娛樂去努力，為聽眾製作節目。想不到從此做了一年又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做到今時今日，已經六十周年了。」

## 音容永在

2009年11月27日，鍾大哥上班期間在港鐵站突然暈倒，送院後證實不治，終年七十八歲，一代播音皇帝與世長辭。

鍾大哥對廣播事業熱誠及認真態度成為兒子及同事的學習榜樣，他的一班好友也對他印象極佳。鄒文懷稱讚他：「我對他播音成就是非常敬佩的，他為人一絲不苟，那種敬業樂業的精神，我認為是很值得任何青年人去學習的。」

憶起昔日合作主持的情形，李香琴說：「我與鍾大哥合作做司儀的經驗，我真的會永遠在心裡懷念，因為那時我很懶惰，拿了單張知道歌曲由誰唱就算了，然後出台就臨時即場發揮。可是，鍾大哥不是這樣，他會拿著單張詳細看演唱者是誰，然後不厭其煩

地逐個去問他的歌齡、他的師傅，以及歌曲背後的意思。然後他又會做足功課，在每一個演唱者表演時，記下筆記，構思表演後應該要說些甚麼。」

擁有一位受歡迎的爸爸，鍾偉明兒子鍾仁傑自豪地說：「小時候會因為爸爸很受歡迎，就覺得很開心，也因此對爸爸產生一種偶像的感覺。他不僅是我的爸爸，也是我長大後的學習對象，他的工作和做人態度都深深影響著我。」

曾與鍾大哥合作過的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主持李仁傑，便親眼見證過鍾大哥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幾年前，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一個節目叫『清晨爽利』，是在清早五時直播的節目，大哥是其中一名主持。這個節目開播時，我相信第一日、第二日甚至第三日，大哥都沒有回家睡覺。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大哥從事廣播數十年，經驗那麼豐富，為何不回家睡覺？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怕生活習慣被打亂了，會睡過頭引致遲到。」

鍾大哥人雖然離開了，但是他獨特的聲音，永遠都會留在大家心中。

# 金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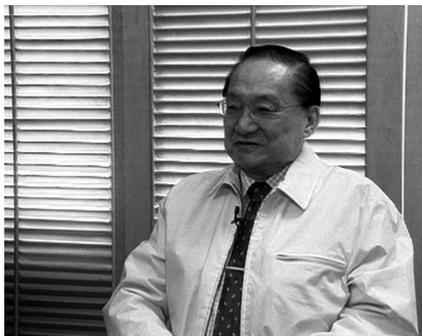
## 武俠大師查大俠



### 浪漫寫實並重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 年出生，祖籍浙江海寧，自小便喜愛閱讀中國傳統章回小說，更鍾情武俠小說。他一生與文字結下不解緣，二十一歲開始從事新聞工作，在報館當記者及翻譯員。到了 1955 年三十一歲時，以「金庸」為筆名創作第一部經典之作《書劍恩仇錄》，在本港報章連載。除了寫小說，金庸在新聞事業亦開創一片新天地，在 1959 年創辦了《明報》，為了增加報紙的銷路，他之後創作的多部武俠小說，都在明報刊載。到了 1969 年，年屆四十的金庸寫完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就宣佈封筆，但查大俠並沒有因此退出江湖。

金庸筆下的武俠小說，不單單風靡中、港、台，就連外國人都愛追看，他的作品因此亦被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由於曾經參與電影工作，金庸小說的表達手法，與當時傳統舊派的武俠小說相比，有很多突破。看過金庸作品的讀者，都會感受得到金庸筆下的浪漫跟寫實，金庸說他的武俠小說根本就是浪漫主義，不過有些讀者要求他用寫實手法去寫武俠小說，他亦覺得未嘗不可，所以他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寫實手法去寫。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主角人物，性格塑造非常鮮明，女性方面皆描寫得十分飄逸，而男性則往往沉溺於權力的勾心鬥角漩渦之中。



金庸只是花了十七年，就有十多部長短篇著作，近年有人更加將研究他的小說統稱為「金學」，提升到更高的層次，究竟金學是研究甚麼呢？

對此，金庸解釋道：「大多數人都對自己的名譽及利益看得很重，但我卻認為感情、友情、愛情比較重要，所以在這個比較之下，女性就顯得重要，只是女性也有一點不及男性的地方，男性可以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羣體，犧牲自己去做很艱難的事，女性就不大會重視這些事情。」

金庸的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風格與之前的作品大大不同，金庸過往塑造的主角都是正氣凜然、剛正不阿，偏偏在《鹿鼎記》中，韋小寶是一個十分世俗化的人物，卻能情場官場兩得意，這令讀者耳目一新，金庸表示這個刻意安排是不想重複以前的小說，希望可以創新：「寫的時候目標是想寫中國人，中國人有一種性格特徵，就是很會適應環境，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不太講原則性，從這角度看是不太講道德的。」

金庸曾經想過，改寫《鹿鼎記》的結局，讓韋小寶七個老婆，各自找別的老公，或找男朋友，不過最後都沒有這樣，究竟為何呢？金庸回答：「這個只是開玩笑的性質，因為有些小讀者說不要學韋小寶，韋小寶是不好的；但也有些讀者很崇拜韋小寶，很想像他。如果我寫個結尾，讓他的下場變得很慘，人家就覺得不值得學了，這是就社會效果而言的。但若從文學層面上去講，這樣子就不好了，所以我還在考慮這個。」

無論如何，金庸還是覺得韋小寶這個角色是現代人的真實寫照：「把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個性典型，就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影響很大，因為他寫了一種中國人的惡劣個性，很多中國人都有例如不誠實、貪污腐化、損人利己等缺點。」

## 投入角色

金庸小說中的角色形象鮮明，全因金庸在寫作時的完全投入，人物是喜是悲都與自己息息相關，好像當年他寫《天龍八部》，寫到阿珠的死就哭了出來：「男的、女的，甚至是壞人，我都會投入角色，想像這個壞人在這個情況下會做甚麼壞事，我會盡量投入他的心理狀態。所以我寫悲劇時，自己便很難過，會流眼淚，自己也受感動。」

金庸的武俠小說除了拍成電影及電視劇，近年更加製作成漫畫及插圖。漫畫家李志清在十多年前在一位日本朋友介紹下，認識金庸之後便為他的小說畫插圖，更將其部分著作製作成漫畫。對於金庸對小說角色的投入，李志清說他畫畫時亦有相同感覺：「有時候畫著畫著，身體會感到愈來愈熱，不知是否在練功？好像有一道氣通過。金庸的文筆令讀者很容易便投入他的小說中，甚至乎可以投入在不同的角色中。我覺得每一個角色都有他的成份在內，他可以是黃蓉那麼機靈，亦可以是郭靖那麼樸實，我感覺每一個角色都是他自己。他是書香世家，文學根基很好，再加上他是編劇出身，很懂得編劇的原理，怎樣捕捉讀者的情緒起伏，心理學方面他也很了得，對人性十分了解，再加上他是一個如此聰明的人，故他能夠對整個局面了如指掌。例如他寫楊過與小龍女分開後，有一種似是失戀，又不是失戀，即是失去愛人的那種情緒，好像沒有了靈魂，六神無主，心驚肉跳，感到全世界已沒有希望，於是就創出『黯然銷魂掌』這樣的武功出來。」

## 金庸小說的價值

國際金庸研究會創會會長伍懷璞表示金庸小說有無數讀者，他的中文文筆很值得現代華人去揣摩學習，而他小說涉獵了天文地理、醫卜星相，吸引了不同範疇的學者走在一起，舉辦過無數次的研討會。甚至有人用中醫角度，研究金庸小說中的靈丹妙藥；也有人用易經角度去研究降龍十八掌等武功是怎樣得來的。

其實，多年來亦不乏有人就小說中個別人物的性格特點展開研究，伍懷璞說：「金庸筆下，有得的情況之下有失，有失的情況下有得，在現實生活中很有共鳴。看過他的小說後，亦有一種入世的宗教感覺，即是在這個世界上要看開一點。而且金庸先生的小說在中華文化中稱得上是百科全書，我覺得他是東方的莎士比亞，是一個很大的藏寶庫，著作涉及的範圍包括天文、地理、中藥等等，只要細心去看，便可發掘到一些東西。」

金庸近年著手修訂他的著作，希望減少文字中的沙石，令到內容更為精煉，情節更為合理，伍懷璞認為政府應該將金庸的著作列入中學教材：「他經過多年的修改，現在已是非常精煉，那些文藝腔運用得很好。大家可以用『減肥前』的文章，一句句、一段段地與現在改過幾次後的文字對比一下，那是可以提升中文書寫水平的。」

澳門設有金庸研究館，一班金庸迷都希望香港也找個地方設立金庸研究館，讓大家留下集體回憶。

## 為國家出力

一代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於九十年代尾退休後，一直很少談及政治，最多只是與讀者見面，談談做人處世的心得，不過金庸對國家有著一份深厚的感情，亦因著這份愛國情懷，在香港回歸期間，他亦出過一分力，1985年獲邀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及諮詢委員，又是政制小組的港方召集人，經常往返香港及北京就草擬基本法開會。

當年他與查濟民就本港政制發展，共同提出一套方案，被指為「雙查方案」，其中建

議在 2012 年才決定是否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方案時被指過分保守，部分港人並不接受。在 2007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為本港訂立普選時間表，分別最快在 2017 及 2020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金庸當時認為不會太遲，亦滿意本港政制發展的步伐：「當時我做基本法起草委員時，我寫著的是循序漸進，香港的政治社會要慢慢一路進步。我覺得香港應該要根據基本法來辦事，基本法寫得很清楚，香港的民主推動很圓滿。實際上，我都說香港是屬於中國中央政府之下的一部分，如果中國未實行民主，香港實行民主會比較有點困難。」

金庸說過自己不喜歡做政治家，不過辦報及關心國事就令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即使說不喜歡談論政治，不過金庸對於自己在當年有份參與基本法的擬訂，感到很驕傲：「當年我自己覺得好驕傲，我覺得基本法定得很好，現在實行得很好，如果基本法不是這樣訂，可能香港會亂，當時好在我們有先見之明，將基本法訂得很好。」

## 努力不懈，全力以赴

李志清在未見到金庸時覺得他是神：「我覺得很神奇，十幾歲時，我已經開始閱讀金庸先生的小說，當年看他的小說時覺得查先生是神，與讀者的距離很遙遠，甚至覺得他不是當代的人。但竟然有這樣機遇，我可以畫到查先生的插圖及封面，而且在日本出版，我覺得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李志清認為這一位一代大師做人態度十分值得去學習：「我曾經問過他一次，有沒有甚麼做人的座右銘？他贈送八個字給我——『努力不懈，全力以赴』。在現實中，他做事的態度的確是根據這八個字去做，例如早年辦報，寫評論，或寫小說，甚至後期去讀書，都是『努力不懈，全力以赴』的表現。而這八個字也深深進了我的心坎，警惕著我。」

金庸一共創作了十五部武俠小說，他最喜歡的不是郭靖、楊過，而是《天龍八部》中大理國的王子段譽，段譽的性格單純、和善，而且與世無爭，這些特質與查大俠可以說是同出一轍。活了這麼多個年頭，金庸說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由就自然會活得開心，經歷過無數風雨後，金庸到了現在能夠事事處之泰然，全靠他的樂觀性格：

「我基本上是很快樂的，也是樂觀的。我的人生對我而言，雖然有很多困難及挫折，但仍是很快樂的。」

與文字結下不解緣的金庸勞碌半生，退休後選擇繼續進修，終身學習：「現在，我每天在讀書時會試試寫中文，然後翻譯成英文，將英文稿再寄給我的指導教授，請他批改，他覺得不對不好的，那我便重新再寫。」

# 顧嘉輝

## 粵語流行曲貝多芬



### 學音樂的緣份

顧嘉輝 1931 年在廣州出生，後來遭逢日本人攻打廣州，於是一家人逃走去廣西，後來在他十七歲，1948 年輾轉來到香港，才安定下來。

顧嘉輝小時候喜歡繪畫，讀書時老師常稱讚他有繪畫天分，但音樂分數並不高。後來顧嘉輝會走上一條音樂之路，原來是有一段淵源的。顧嘉輝憶述：「初初來到香港，家境頗為貧困，只能住在木屋區、讀夜學。後來，姐姐（即顧媚）出來唱歌，支撐一家人的生活。那時當她的男朋友為她伴奏，陪她練歌時，我就順便學彈鋼琴，我學音樂是由陪她練琴開始的。初時鋼琴是從琴行租回來的，因為當時的琴很貴，動輒數萬元。」

原來行內人皆稱他為「輝哥」的顧嘉輝是受到姐姐影響才愛上音樂，選擇以音樂作為他的「終身伴侶」的。正所謂「有心不怕遲」，很快他便學懂彈鋼琴了，也嘗試自己作曲。一年後為姐姐作了人生第一首曲，直到現在，由他作的曲已超過一千二百首了，他說：「我為姐姐作的《夢》，是用來參加《不了情》的徵求歌曲比賽的，結果選中了。其實，《不了情》我也有參加創作比賽，不過沒選中，選中的是王福齡那首《不了情》。」



由於小時在內地過著四處遷徙的生活，並沒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因此顧嘉輝並不是從小就學彈琴，而是到了十七八歲才有機會學，所以他特別珍惜，不過他的才華過不多久便綻放出來了。

《夢》雖然未至於令顧嘉輝一炮而紅，但他的才華也開始得到賞識。六十年代，輝哥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在六國飯店的「仙掌夜總會」工作，合作模式就好像「麗花皇宮」裡的樂手般，在這裡的表演機會改寫了他的一生。他憶述：「有一次，美國一間音樂學校叫 Berklee（柏克萊），有位老師來到聽到我彈的琴，認為我有天分，又有心學音樂，於是選了我去學音樂，更有獎學金資助，我很高興。雖然，不用交學費，但也需要旅費。那時，我已有家庭、太太，誰負責我一家的生活費？後來，由方逸華介紹邵逸夫給我認識，邵逸夫資助我旅費及家庭的生活費，才去得成美國。」在美國一讀就兩年，之後回到香港的電視台工作。到了 1981 年，輝哥感到料子不夠，又再去洛杉磯留了半年，繼續學習音樂。

輝哥第一次往美國是學習較正統的音樂，第二次往洛杉磯主要是學習較商業化的音樂。的而且確，輝哥所作的曲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定是電視劇主題曲。

## 最佳拍檔

每次提到顧嘉輝，也不得不提到他的好拍檔——作詞人黃霑。在觀眾眼中，顧嘉輝及

黃霑是絕配，一個作曲、一個填詞，兩人合作無間，無數經典廣東歌就是由他倆攜手創作出來的。

當顧嘉輝憶起與黃霑合作的種種，他仍是一臉雀躍：「我沒有認真算過我們合作創作的歌曲有多少，但我記得第一首和他合作的歌叫做《愛你變成害你》。當時我們合作的方式比較麻煩，因為以前沒有傳真機，只能通過電話給他描述曲譜，逐個音符、逐個小節告訴他，很浪費時間。其實，我們的創作時間很趕，電視台一般只給我們三個星期，兩個多星期的時間都被我拿來創作旋律，我甚至有時是連夜打電話給黃霑，告訴他明天就要用，弄得他罵聲四起。我們就是用這個形式，創作出很多好東西出來。黃霑常常說我用盡他的時間，通常只留下一晚或數小時的時間給他填歌詞。而我就先到錄音室錄好背景音樂，一般都是歌星來到，歌詞才到，根本沒有機會給歌星將歌詞唱熟。一見到樂譜就要立即錄音，一點也不容易。」

而在眾歌星中，輝哥說葉麗儀就是最聰明的一個，她每首歌都很快「上手」，輝哥說：「葉麗儀是參加『聲寶之夜』歌唱比賽的，當時我是評判之一，之後就找她幫我唱廣告歌，有時只是叫她唱是『樣板』。雖然她很忙，但她很樂於幫忙，更忙都願意來唱。」

而最令輝哥最欣賞的歌聲便是葉振棠，他說：「我喜歡葉振棠的聲音，比較中國化，唱我創作的旋律都很配。因為他懂得彈低音結他，而且在樂隊中工作過，對我的音樂要求掌握得很快，因此演繹得特別好。」說起葉振棠的首本名曲《忘盡心中情》，輝哥指出：「《忘盡心中情》因為五聲音階旋律中國化，再配以西化的和音，便衍生出另一種意境來，這是當時粵語流行曲的特色。將這些特色滲入廣東音樂。」有好的曲，再加上好的詞，才能成為一首出色的流行曲。

至於其他的歌手，羅文在輝哥的心目中也算聰明，學得快。相反，羅文生前對輝哥也是心存敬意，十分景仰：「我想全香港沒有一個人能像輝哥般，只要他站在台上，所有樂手都會很聽話，不會發脾氣，每個人都很尊敬他，包括台上的所有歌手、樂師，大家都很尊敬他，很守時，也不敢偷懶。」

## 香港精神——獅子山下

1979年，顧嘉輝和黃霑的一首《獅子山下》唱得街知巷聞，時至今日依然不時聽到這首歌。這首歌一直提醒香港人，要有勇氣及自信，再艱難的困境都可以捱得過。輝哥表示：「《獅子山下》的旋律雖不是五聲音階，但比五聲音階只是多一點，所以感覺也不是太西化，我作的時候是希望有一個香港味道，因為只看歌名便覺得很有代表性，所以作的時候也比較用心。」

1998年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襲港，香港好像跌進谷底，當時顧嘉輝、黃霑再加上戲劇界的毛俊輝，希望為香港人打打氣，於是合力炮製了一套音樂劇《酸酸甜甜香港地》，希望香港人可以步出難關。顧嘉輝早在1997年已取得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即是CASH的「音樂成就大獎」。他的音樂成就，在行內一直得到一眾後輩的敬重，就連黃霑也對他稱讚有加，曾笑說：「最近我給他改了一個很得意的花名叫『貝多輝』，因為他在我心目中根本是流行曲界的貝多芬。」

輝哥得獎之後三年，輪到霑叔得到同一個獎。可惜的是2004年黃霑因肺癌去世，終年僅六十四歲。對黃霑的死，顧嘉輝感到：「很愕然，雖然之前已經知道他有病，經常要到北京看醫生，但想不到那麼快就走了。失去了這個拍檔，就像失去了很多東西，很不開心。以前，我和霑叔經常接觸、合作，一起工作都很投入、很合拍。現在突然沒有了這合拍的一半，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打擊。」音樂令到輝哥發揮到他的天才，音樂也令他認識到黃霑這個絕世好拍檔，假如沒遇上音樂，輝哥的一生可能都要改寫，他總結：「沒有音樂會變得很悶，因為我人生差不多大部分都與音樂有關，可說是沒有音樂就沒有我。當然，沒有黃霑，並不能夠等於沒有我的音樂生命，我仍會繼續，但會感到很失落。」霑叔離開我們已有七年，輝哥也快將八十，但他仍未想過完全退休，而是繼續讓生命綻放光芒，他悠然自得地說：「時時都不想自己到底多少歲，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現在除了作曲，還會繪畫，畫很多畫，希望儲多些時可開個畫展。」

# 李小龍

## 唐山大兄



### 李小龍 + 功夫 = 香港電影

無論是台上或台下，李小龍都是天生的主角，或者這和他出身梨園世家有關。李小龍原名李振藩，1940年11月27日在美國舊金山，即是加州三藩市出生。當年父母怕他養不大，幫他改了一個女孩子的乳名叫「細鳳」，「小龍」是他參與電影拍攝後所改的藝名。李小龍的父親李海泉，是粵劇四大名丑之一，這造就了李小龍自小便展開童星生涯，三個月大已經在三藩市當地的粵語片《金門中》亮相，而他擔任主角的《細路祥》也是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電影。

1959年李小龍到美國升學，1970年回港，先後拍下《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龍爭虎鬥》，以及只拍了一半的《死亡遊戲》，這僅僅四部半的電影屢破當年紀錄，例如主演的第一套作品——《唐山大兄》，此片創香港開埠以來最賣座的紀錄，公映二十三天，票房高達三百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元。《精武門》的票房更超過四百四十三萬元，《猛龍過江》再下一城，票房狂收五百三十萬零七千元。

李小龍風頭一時無兩，他的一生充滿傳奇性，到了現今，李小龍會會長黃耀強仍不禁讚嘆：「李小龍居然只憑四部半電影，便令全世界的影迷為之瘋狂，這真是一個奇蹟。」

李小龍是劃時代的國際巨星，六七十年代開始風靡萬千影迷，他的電影及他的個人魅力，更是席捲所有華人地區，甚至歐美全球。



至今，李小龍已經逝世接近三十八年，但他的名字仍然是世界知名，而由他帶起的中國功夫熱潮，更是從未減退，也影響了歐美人士對香港電影的印象，正如電影節目辦事處電影顧問方保羅所說：「很多年來，如果你問美國人或歐洲人，香港電影是甚麼，他們只知道兩件事：一是功夫，二是李小龍。」

## 天生表演者

李小龍在香港讀小學及中學，成績差又經常惹事，根本坐不定，就像一個頑童，曾試過被要求轉校。他喜歡表現自己，是一個天生的表演者，無論在片場或私人場合都喜歡成為眾人的焦點。亦喜歡說笑，以及玩一些有趣的把戲，詠春師傅溫鑑良便見證過

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表演：「他很活躍，喜歡開人玩笑。若跟他相處一小時，他絕對不會讓你有冷場，只管看他表演，只管笑就可以了。李小龍有一次自編自導自演，一人分飾關德興與曹達華，演黃飛鴻與梁寬，自己導演著整部電影，弄得整個片場的人都捧腹大笑。」

不過，對於李小龍這種永遠的高姿態，黃耀強說：「很多人都說李小龍很囂張，但卻拿他沒辦法。因為他張揚的，他全部都做得到。他便是自信自己有能力，所以自豪地說出來時，會讓人感覺他囂張，但對他來說這些都是事實，但別人聽起來就是不太順耳。要了解李小龍少年時是甚麼模樣，《人海孤鴻》他便演活了他自己，很大程度是他自己的寫照。」

## 武癡本色

李小龍自創的截拳道，以速度、靈活取勝，他的性格亦是快人快語，還有武癡本色。溫鑑良憶起李小龍也說：「他想到甚麼就說，轉數很快，體能很好，有時本來坐著跟你說著話，說起功夫有時突然興起，會按著枱跳過去，跟你埋身過招。」要擁有這些速度及反應，並不是天才就可以做到的，李小龍也下了不少苦功。例如他為了練腳法，便將一個穿了魚絲的實心小球掛在天花上垂到大約眼睛的高度，退至距離小球三呎，一側身飛踢小球，踢到小球不規則的亂彈亂飛，根本不能捕捉它的走向，但他卻可以凌空將腳停留在半空，連踢三下小球，腳不落地。

因為這空中三連踢，李小龍贏得「李三腳」之名。要做到如此爐火純青，快、狠、準，只有不斷地練習。溫鑑良對於李小龍做事的高要求也有一番體會：「他要求很高，一個動作一定要做到他認為滿意才可以收工，不然絕對不會讓你停。他跟我說過當年在美國教占士高昆練腳法，他要求占士高昆在花園踢沙包，他會設定一定的距離，然後跨出一步踢那個沙包，力量要足以令沙包飛開他規定的秒數，若做不到的話他是不會收貨的，占士高昆試過一直練習四個半小時，沒有停過。」

除了體能及技巧的鍛鍊，李小龍亦很注重飲食習慣。溫鑑良透露：「李小龍多接觸西方人，西方人注重爆炸力及體能，所以他也很重視這些，例如每日需要吸收多少蛋白

質，他都會跟到足，他跑完步或練完功後，一定會打開雪櫃，拿隻雞蛋放進盃，就這樣喝下去。」

甚麼叫完美，零脂肪的肌肉，充滿線條的身體比例。黃耀強認為李小龍的身型，就是最完美的示範：「基本上只得一層皮，然後全部都是肌肉，你會感覺很震撼，李小龍稍微一用力，握緊一點，就可看到全身一條條的肌肉，每條肌肉表現出力的美，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龍爭虎鬥》是第一套正式在全世界發行的李小龍電影，很多人都是看這套電影而認識李小龍的。這影片與他之前拍的幾套電影，感覺完全不一樣，片中你會看到那種陷入瘋狂的狀態，也可看到那種肌肉的爆炸性。」

## 截拳道精神

究竟李小龍如何做得到，又如何創出截拳道，和詠春宗師葉問又有何關係。根據溫鑑良透露，李小龍創出截拳道，得到很多不同方面的啟發，例如跆拳道、空手道，甚至詠春及其他門派的腳法，他都有參考，最後得出配合到他的身型及本身性格的拳法。到了美國之後，與外國人接觸多了，發現西方人身型、體重比他大許多，若只用手的話，比較吃虧，就這樣創出出腳的截拳道。

1962年，李小龍在美國西雅圖創立第一間振藩國術館，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是截拳道的核心精神。溫鑑良說：「截拳道是不讓你靠近，與對手保持距離，但出招的速度很快，靈活性很高，轉身很快。要拉近與外國人的體型差距，李小龍以保持身體不斷移動，結合速度與力量，截拳道就以靈活取勝。李小龍的雙腳配合得很好，整體的結構很靈活，我曾在李小龍九龍塘的家中看他練腳法，確實是令人驚嘆。」

要說李小龍學功夫的過程，一定要提「一代宗師」葉問。事實上，李小龍在離開香港去美國定居的前幾年，大約十五歲左右，曾經跟葉問學過詠春。根據葉問徒弟冼國林憶述：「葉問心目中的李小龍，是很聰明，很有學武天分的，他的創新性比葉問更強，就連葉問也需要去適應李小龍的性格，而李小龍內心是很尊重葉問的。可是，因為他有挑戰極限的性格。因此便有人認為他們兩人的關係很差。」李小龍曾經要求葉問拍攝整套木人樁的打法，讓他可以帶回美國學習。冼國林又透露：「聽說，李小龍回到香

港都會去找葉師傅。而且據我所知，葉問宗師逝世後，李小龍有致送花圈，事後亦有去拜祭，證明他是很尊重師傅的，關係並非想像中那麼差。」

## 永遠不滅的功夫傳奇

一代宗師遇上武術奇才，究竟是否惺惺相惜，今日就真的無從稽考。正如李小龍在1973年7月20日，為甚麼突然在女星丁佩家中猝死一樣，至今都是一個謎。

當時李小龍的死哄動整個社會，直到出殯當日，社會的焦點，都沒辦法離開李小龍身上。溫鑑良回憶：「一代武癡就這樣離世，當年聽到時也嚇一跳。報紙爭相報道，他的喪禮上，人多到難以形容，花圈放得滿滿的。如此年輕，如此好的體魄，一切都來得太突然，誰人也沒法預料。」

李小龍是7月20日晚逝世。然後21日、22日、23日，一連幾天，全部報紙頭版都是他的新聞，他出殯時那種萬人空巷的情況，也是前所未見的。當李小龍的妻子Linda，拖著一對兒女，離開九龍塘大宅，回美國的一刻，亦代表著李小龍短暫但光芒四射的人生告一段落。

黃耀強則認為這可能是成就一個傳奇的宿命：「李小龍的傳奇，包括他童年當童星的生涯、在美國的奮鬥史、他在武術上的創立，電影的成就，再加上他的死亡，再說得遠一點，就是他兒子李國豪的死亡，也將李小龍整个人生推向一個傳奇。」李小龍寫下的傳奇不單是聲色畫的影像，他亦一手扭轉全球華人的國際形象。七十年代當你翻看一些外國的舊書舊雜誌，和廣告或插畫中的中國人，全部都戴簷帽，留一條長辮，穿清裝。直到李小龍出現，才將中國人的形象在全世界人民眼中中扭轉過來。黃耀強表示這未必是一個全面的形象，但至少由一個滑稽的負面形象扭轉到正面來。

正如李小龍電影中這一句經典對白——「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堂堂正正的氣勢，配合李小龍爆炸性的功夫演繹，塑造出新的中國人形象。投射個人感情，面對自我身份認同，都促使李小龍在華人社會中走紅，何國良甚至認為李小龍能夠為當時受苦的低下階層出一口氣：「現在我們仍然經常重覆『我讀得書少，你唔好呃我』等經典對白，

這道出了那種代表低下層人民的情緒。在香港成長，在香港成名，在香港去世，但李小龍的成就不止局限於香港，他的影響力足以遍及全世界，歐洲和日本無數影迷都很崇拜李小龍。」

「李小龍」三字包含著民族情緒、愛國主義，他痛打外國人，他出完拳後的那一下充滿自信的叫聲，相信永遠不會有人忘記他，他就是李小龍。

# 鄭國江

## 拼合畫面的音樂裁縫



### 歌詞都是度身訂造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粵語樂壇巨星輩出，陳百強、羅文、林子祥和徐小鳳等歌手均別樹一格，他們唱出無數膾炙人心的金曲，歌詞朗朗上口，普羅大眾至今仍能隨口哼出一兩句。他們的歌曲得以流傳，幕後填詞人的功勞確不可少。當時，鄭國江就經常坐在公園裡聽著卡式帶埋首專注於他的填詞工作，寫下一首又一首的經典歌。

幾十年來，鄭國江創作的歌詞多達二千多首，當中不少歌曲都是根據歌星的經歷度身訂造，由林子祥主唱的《分鐘需要你》便是一例。鄭國江說：「這首歌本是林子祥創作，用來「追女仔」的，已有英文歌詞，當中有一句的大意是希望駕飛機怎樣怎樣的，那個年代飛機已不稀奇，我就想不如『火箭』啦，所以第一句就是『願我會搵火箭，帶你到天空去』。至於『共你相對，好得戚好得意』中的『好得戚』根本是阿 Lam 的口頭禪，交往的日子久，彼此熟稔起來，於是不期然就會將歌星的形象，放在了為他寫的歌詞裡，那唱起來就更為生動活潑，歌手表演時也可以更為投入。」

鄭老師的詞不但令歌星能夠投入其中，演繹得更傳神，而簡單通俗的言詞，亦令聽眾產生很大共鳴。例如「鹹魚白菜也好好味」這一句，其實是由上一輩的口頭禪「鹹魚青菜都一餐」演化而來，不過旋律與「青菜」的音不合，才改作「鹹魚白菜」。



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粵語歌壇的黃金時代，機緣巧合下踏入填詞界的鄭國江，成績驕人，他與著名填詞人盧國沾、黃霑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揸火箭」再加上「鹹魚白菜」，和其他畫面拼合起來就成為一首歌，鄭國江形容填詞就好像玩拼圖一樣：「一千幾百塊的拼圖，要怎麼將他組織成一個完整的作品呢？或者先將拼圖東一塊、西一塊地放置，慢慢地再砌，連接起來。歌詞也是一樣，不一定從頭寫到尾，可能忽然中間出現兩句，然後再根據那句子，橫向或者上下發展成一個段落，跟著再把第二段整理出來，最後將各段落連接，成為一首完整的歌曲。」

除了引起熱戀中男女共鳴的「戀愛拼圖」外，鄭國江亦有一些道出家仇國恨的作品。為了向日本人，表達日本侵華的傷害，他特意為在日本發展的香港女歌手陳美齡，寫了一首《中國眼睛》。鄭國江分析道：「為甚麼寫鳳凰的眼睛？因為鳳眼是中國女子的特色，是中國人代表性的特徵。接著又道出這眼睛是黑白分明的，意即中國人明白是非。你不要問我這隻中國的眼睛，哭過幾多趟，因為我們的國土，水本十分秀，山也十分壯，不過經過了很多很多的殘踏，所以眼中有憂傷。我用中國的眼睛，表達日本人對中國的傷害。」

歌詞除了能夠表達內心的情感，亦含教化作用，翁倩玉主唱的《信》便是一例。原本任職教師的鄭國江，一直懷著一個使命去填詞，希望以歌詞傳達一些正面思想，及積

極的意念和意識，通過潛移默化，去影響聽歌的人。

無論題材是愛情，愛國情懷還是勵志歌曲，鄭國江認為只要經得起時間歷練，就是一首好歌，正如他為區瑞強填的《客從何處來》，區瑞強說年輕時唱，只是嘗試將歌詞的意思演繹出來，直至他第一次回鄉，才真正感覺到「鄉音無改鬢毛衰」的感覺，才能夠體會整首歌詞的意思。可見歌詞的影響力不是一時，而是包含一個很長遠的人生歷程。

## 樂壇並未沒落

每次鄭國江完成填詞後，都會親自將作品遞到唱片公司。但當時的唱片公司，現在都已結業，相比七八十年代，現今唱片業好像一潭死水，但鄭國江覺得科技的發達，對發表作品有很大幫助。

他表示：「唱片業可能已到寒冬的季節，不過在網上平台剛剛是初春，很多創作人都可以通過這個平台去接觸外界。我覺得這比以前單靠唱片有更多的機會，可謂百花齊放，不再需要依賴唱片公司，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鄭國江在七十年代與著名填詞人盧國沾、黃霑「三分天下」。鄭國江多次獲得十大中文金曲獎，更曾獲頒金針獎及音樂貢獻獎，他說這些都是因為三人不斷切磋後所得來的成果：「大家遙遙發功，當有人創了一招，我們就要想如何破解。越南難民來港時，創作人都有感而發，黃霑為電視劇寫了《抉擇》，盧國沾寫了《螳螂與我》，我便寫了《幸福途》，三人對事情的感受都不同。」

風格的不同並無窒礙黃霑與鄭國江的惺惺相惜，黃霑甚至將自己的創作歷程與鄭國江分享。鄭國江透露：「黃霑把《獅子山下》整個創作過程的手稿寄給我，他說希望我能在當中看到他創作的過程，也希望我以同樣嚴謹的態度對待自己的作品。」

黃霑的離世，對樂壇來說是一個損失，但鄭國江說這並不代表樂壇沒落，反而靠著一批新的填詞人，利用現時的社會題材來填詞，更切合這時代。鄭國江說他們出生的年

代甚麼也沒有，要甚麼就得自己去爭取，所以勵志歌容易令人產生共鳴。「八十後」出生時，社會已經比較富裕，他們不覺得要掙扎、要奮鬥。

對比以往的唱片業，現今的歌手多數出道年期較短，因此填詞人較有「牙力」決定創作的題材，當中令鄭國江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夕和黃偉文的作品，例如林夕填詞的《皇后大道東》，鄭國江很是欣賞，他覺得詞曲配合得很好，當中具有很多香港的獨特元素，又帶出很多信息，當中輕微地接觸到政治，而又不令人覺得沉痛，技巧非常高超。

另外的《Shall We Talk》，鄭國江分析道：「歌詞中提及喝湯和月光，而那句『明月光，為何又照地堂』則是來自『月光光照地堂』這首大家都熟悉的民歌，作為引子帶出親情，寫都市人兩代的隔膜，但又不至於如《空樓》那樣傷痛，但又突顯到『隔』的感覺，寫得很好。」

## 為兒童粵劇團寫詞

鄭國江坦言從事創作的工作，未必能夠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但他相信愛創作的人，不會計較，反而會在網上平台，發表更多自己的作品。除了寫流行曲外，鄭國江亦透過寫兒歌將正面訊息傳達給小朋友，他現在亦有為兒童粵劇團寫折子戲的詞。

兒童粵劇班導師劉惠鳴透露：「他小曲填得很暢順，不像其他初學粵曲填詞的填得那麼難唱，他選擇的故事都是小朋友容易明白的，例如《花木蘭》或者歷史人物的故事，絕不會是難明的大人愛情故事。」

鄭國江負責詞的創作，而劉惠鳴就負責教導小朋友做手及唱戲。鄭國江作的新詞，對劉惠鳴來說是新挑戰，劉惠鳴說：「他創作出新曲，然後再加上我的創作，最後才可以成為一套小小的折子戲，因為不是傳統的曲目，所以在表演細節上，我也要花很多心思。」

為了寫好曲目，鄭國江專誠報讀粵劇編劇班，劉惠鳴覺得好驚訝：「其實他在流行樂壇，地位崇高，但他仍然拋下身段，重新去學，和後輩一起上課，這是很難得，我覺

得他是很值得尊敬的老師。」

對於鄭國江來說，上課學習都只是傳承粵劇的其中一步。鄭國江希望小朋友能演適合他們年紀的角色，做適合他們的戲，也希望藉此令小朋友更有興趣去演去唱，真正接觸粵劇，將來可以成為懂得欣賞戲曲藝術的新一代，否則沒有新一代的觀眾，就不會有新一代的演員。

## 裁縫般的填詞家

鄭國江活躍於七八十年代歌壇，雖然在九十年代開始減產，但至今「鄭國江」這名字仍然有叫座力，令不少人報讀他執教的填詞班。

面對學生，鄭國江只是希望將自己幾十年來的經驗和他們分享。他說：「我跟填詞班的學生，其實並不是師生關係，我們一起探索學習，一起解決問題。有時他們交來的功課，當中有些很精彩，就連我也未必做得到。」

鄭國江填詞的功力，不單懾服了一班後輩，亦令他多年前的拍擋——兒童節目主持人辛尼哥哥佩服得五體投地，辛尼哥哥說：「有些媽媽告訴我，我唱的歌對小朋友的成長有很大影響，有些小朋友不肯刷牙，老師、媽媽的話也不聽，但聽完我唱的《刷牙歌》後，他就自動懂得刷牙了。這便是潛移默化，影響力很深遠。鄭老師很厲害，找他寫歌，說出幾個字就可以了。例如只需告訴他這首歌要講親情，他便可以在歌詞中寫出起承轉合，將親情中的複雜關係及爭鬥，都完全寫出來。」

他們在二十多三十年前一起主持兒童節目，將生活的美德例如是儲蓄及節省水源，用輕鬆的兒歌傳播出去。除了偏向生活化的兒歌外，鄭國江亦將歷史簡化成幾句歌詞，令小朋友更易消化，《黃水謠》講的便是五千年以來黃河水患對中國人的困擾，中國人就憑著堅毅的精神，困難終得以克服。

鄭國江用感性的筆觸寫盡人生的循環：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愛、惡、恨。他常常以短短幾句，便將淒慘、悲涼、盼望和勉勵連成一首歌曲，難怪有人會用

裁縫來形容鄭國江的填詞生涯。鄭國江說：「不知道誰開始說我是裁縫，當時我很生氣，為甚麼不是其他，而是裁縫？後來細想，覺得也挺好的。好的裁縫造詣高超，能夠做到巧奪天工，天衣無縫，如果我也能夠做到這個地步，那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 靳埭強

## 香港設計界「一哥」



### 走向設計之路

六十九歲的靳埭強是香港以至華人設計界的「一哥」。靳埭強在廣東番禺出世，自小開始對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但他十五歲來到香港時，做裁縫學徒，滿師之後當了裁縫師十年。雖然心懷從事藝術的理想，但在現實中卻得不到機會，直至他遇到他的伯父，也是他的啓蒙老師靳微天，才開始學畫畫。伯父知道他喜歡繪畫，於是免費教他。然後跟著另一位老師學設計，又碰上一位賞識他的同學，介紹了第一份設計工作給他。這是命運的安排，也從此改寫了他的人生路。

當時香港設計界還未成氣候，靳埭強最初亦質疑：「設計是商業的東西，將藝術商業化，好像很庸俗。後來我讀了設計才知道，設計是設計師利用創意做出一些令人類生活更加美好更加令人滿足的東西出來，是一項可取得滿足感、且有意義的工作，好的設計更可以流傳後世，一樣可滲入藝術元素。」

當時香港設計行業競爭不算激烈，靳埭強在設計這一行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直到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他的公司改組，靳埭強面臨人生的一個低谷：「公司改組，老闆要移民，把公司交給他人管理，我也不知道應該打甚麼工才好。在這一家公司做了八年這麼長的時間，為公司『打天下』，最終甚麼利益也沒有？也沒有補償，只有打擊，

「設計就是我的生命，可以帶給我滿足和快樂，過程中常遇有困難，需要想辦法去克服，而這些就是人生。」靳埭強如是說。



對我及我在這行的事業發展都是打擊。」

靳埭強決定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戰友，自資成立公司，希望利用新思維在行內殺出一條血路：「最初規模很小，只聘請一兩個員工。我們並沒有很有計劃地去發展，而是審時度勢，看看有多少工作量，接到甚麼樣的工作，再決定怎樣發展公司的方向。後來，我們接到市政局的亞洲藝術節，以及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形象設計工作，於是就順理成章用亞洲文化元素做設計，做了些有香港特色的設計出來。」

## 揉合中西的設計

事業上的挫折，迫使他重新思考，摸索自己的創作風格。於是，靳埭強有了新的想法：「我最初是全盤西化，常常感到海外作品和我的作品，似乎水平也差不多，為甚麼我不可以在國際上受到好評，在國際比賽也仍未拿到獎？我試著去思考自己的問題，嘗試學習及理解，又嘗試把中國藝術的特點放進設計之中。」

其實早在六十年代開始，初出道的靳埭強已多次參賽，為政府設計郵票，他揉合中西

文化概念的作品，逐漸贏得好評。包括由 1987 年開始，陸續面世的十二生肖郵票，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不要看郵票面積小小，靳埭強表示設計郵票特別考工夫，亦磨練了他的設計造詣：「在平面設計來說，可能面積最小的是郵票，但要表達的卻又很複雜，因為郵票是代表那個地區，需要詳細精密地考慮每個元素。而且，無論甚麼階層的人，普通平民、貧苦百姓、知識份子、有錢富翁等等都是用家，因此郵票設計需要顧及各個層面的接受程度。」

靳埭強表示要從自己設計的郵票當中，找出最喜愛的實在是難以決定，不過說起最具歷史意義的郵票就非這套香港回歸過渡時期的通用郵票莫屬了。靳埭強說：「這套郵票上沒有女王頭或者王冠，也沒有『中國』字眼，沒有體現地方主權，只是運用一個香港島，香港島的海濱，現代化大都會的形象，並利用中國長卷的概念表達出來。那時，我特意去乘搭不同的渡輪，在海港中取景拍照，然後把它們合成一個連貫性的長卷，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在創作路上不斷摸索，經歷一次又一次失敗，靳埭強都是一步一步的走過，因為他相信做設計就像做裁縫一樣，只要為客人做到「適身合體」，作品一定有人賞識，所以他特別關心別人，希望了解別人的需求，盡量做好設計。憑這份信念，靳埭強以及他的團隊，亦在本港及海外贏得多個獎項。1979 年，靳埭強便成為了首位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的設計師，並在 1984 年獲得前市政局設計大獎。不過對靳埭強來說，這些獎項始終及不上他的代表作——中國銀行商標重要。這個商標，他用了中國的錢幣作聯繫，用條紅繩穿著銅錢，然後用現代化的電腦螢幕般的簡化圖像，做了個「中」字，用的都是最簡潔的圖案。

其後，靳埭強又花了大約十年時間，為全國中國銀行分行統一企業形象。這令他印象難忘：「當時中銀在全國以及世界各地已有一萬多家分支銀行，他們希望不同處境的門面與環境也規劃統一。能夠挑戰並做好此項工作，那種滿足感並不是其他獎項可以比擬的。」

## 薪火相傳的教育

除了做設計之外，靳埭強近年亦花時間投入公眾教育工作，他對年輕人及藝術發展有何看法？靳埭強過去數十年，工餘經常花時間出席一些教育講座，分享其設計心得及經驗。靳埭強指出：「一個社會如果只是經濟發展好，而文化發展卻不好的話，仍是一個不健康的社會。因此應該從該地的市民身上做起，培養他們對藝術的理解及修養，從而衍生出喜歡這方面的人才，將來便可培訓出一些出色的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從而發展這地方的文化。」

二十四歲的 Henry 投身設計行業已有五年時間，他在工餘繼續進修，為自己增值，當他聽過靳埭強的分享後，他表示：「我『盲人摸象』自己摸索了四、五年，現在知道原來靳叔也是這樣出身的，對自己來說像是打了一支強心針，以及會更肯定自己的路如何走？」亦有學生表示由靳埭強身上學到謙虛。

靳埭強明白教育對於設計行業薪火相傳的重要，由八十年代開始，他便投身內地的教育事業，出任汕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又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及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希望推動內地設計界發展，因為他覺得：「香港的發展不應該像一座孤城般自己做自己的事，而是應該與其他地區，尤其是國內大中華區有所連繫，結集一些新的優秀老師，甚至是香港及海外的人才，把傳統的『老師教，學生學』的模式改變為學生主動地與老師互動學習。我想下世紀應該是華人設計師在世界舞台展露實力的時機，這對香港的整體提升也是有利的。」

## 寄語新一代設計師

現今社會互聯網發達，靳埭強認為年輕設計師可發揮才華的平台更多了，不過與每一代設計師一樣，新一代都有他們的困難及挑戰：「我們那一代是沒有前輩留下的經驗給我們吸收，只能自己摸索。而新一代的難處則是因為學位多了，除了自七十年代起便

有設計科目修讀的理工大學外，其他大學也增加了設計相關的課程，再加上以前的工專變成了設計學院，於是有設計學位，有設計知識的人多了，競爭自然也多了，這就是他們的困境。」

面對競爭及工作壓力，靳埭強表示設計意念要歷久常新，關鍵是要保持對靈感的敏感度，他經常到不同展覽或者音樂會吸收靈感，不過更深一層來說，設計靈感其實無處不在。靳埭強認為：「所有的創意都是來自生活，因為生活的需求就是創作的根源，把對生活的感悟及生活的美好細節收藏在心中，作為你的創作滋養。」

經常有人說新一代的年輕人，不及上一代刻苦，靳埭強認為是否刻苦是其次，更加重要的是：「不要計較第一份工的工資是多少。設計這行業，是沒有懷才不遇的，但你就不要計較別人賺一萬，你只賺七千，若你表現出來比賺一萬的人更傑出，之後自然會有人賞識，得到更高的工資。另外，設計是為別人做，而不是為自己做的，所以一定要關心別人。在香港，創作的靈感，發展的空間，有志從事設計之士，似乎源源不絕，但這又是否代表香港的設計前景一片光明呢？」

## 寄語香港政府

香港大會堂在六十年代初建成，剛剛是靳埭強開始思考人生找回自己理想的時候。這個地方可說是香港上一代的藝術及文化中心，這裡的表演及展覽給過靳埭強不少設計意念。今日香港正密鑼緊鼓發展西九文化區，希望把香港打造成為國際文化及藝術都會，不過靳埭強認為在西九的發展中已經看到政府對藝術界的聲音欠缺重視。

靳埭強指出：「我們參與深入討論，也給了很多意見，把三個方案定了優點、缺點，然後也照方案所得分數進行排序，這應該是代表了業界的意見吧！。結果現在選擇方案時，當時我們將之排序在最後現在卻選中了，那即是沒有聽我們業界意見了。」

他希望政府可以更加重視業界的看法，包括加強藝術教育以及訂立全盤藝術政策，以

保住香港的文化優勢。靳埭強堅信：「香港絕對有自由的創意環境，當與大陸競爭時是個優勢，因為香港藝術家非常尊重法律的法治，也有保護知識產權、尊重創意的意識，再加上我們有廉潔的社會。而大陸要處理好這三方面，仍需很長的時間。」

# 水禾田

## 集體回憶的紀錄者



### 以影像串連兩岸

從事攝影藝術多年，水禾田不單只是埋首於創作的藝術家，也對香港及兩岸都有一份感情，表現出一份承擔。八十年代初期，海峽兩岸關係緊張，彼此沒有溝通，水禾田就選擇到兩岸展出自己在北京和台灣拍攝的相片，為的不是錢，不是名氣，而是促進兩岸溝通。

水禾田是第一個將內地風光通過攝影作品帶到台灣展出的藝術家，對於這次展出的成功，他對自己身在香港心感慶幸：「兩岸之間沒有溝通，令兩地從事藝術的人也產生阻隔。所以香港的自由空間，為身處香港的藝術家提供了遊走兩地的便利，讓兩岸進行溝通。我在兩岸展出對方的攝影風光，那麼兩地的人就可以在文化及藝術之中互相欣賞，這樣串連兩地，便可漸漸消弭隔膜，達至彼此間的溝通。」

不過當年他付出的努力，並不是人人能夠領悟，水禾田感到當中的艱辛：「首先要令大家的思想開放，接受對方，最初是很困難的。為何他們要展覽我的作品？原因是甚麼？但當他們一旦接受了之後，就會逐漸發現原來每一項文化藝術，都可表達出不同的意念和觀感，對彼此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水禾田——一個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名字，他奪獎無數，除了兩岸三地之外，在國際上亦享負盛名。對於水禾田來說，攝影是藝術，同時亦是紀錄歷史的方法，他說：「攝影是一種紀錄，拍下的不只是一個影像，將來亦會演變成歷史。」



## 談香港的藝術空間

作為香港的一份子，不單單關心國家大事，水禾田亦非常關心香港的發展。早約於1972年，水禾田推出了第一本關於香港的攝影集——「香港·感覺·感角」，這本攝影集足足用了一年時間去拍攝。他坦言：「我理想維港不要再填海，海港愈來愈窄，將來天星小輪怎樣行駛？我很喜歡天星小輪，以前每日搭小輪上班、下班，下班時很疲倦，一坐上天星小輪就有十幾分鐘的休息時間，看看維港的日落。往昔的事物都面目全非了，唯獨是天星碼頭沒有變。現在雖然高樓大廈林立，但香港人要『上車』（買樓）仍然很難。」

在香港成長，發展事業，並出人頭地。水禾田心繫香港，眼見香港回歸後沒有向前進，他感慨道：「香港回歸十多年了，我覺得它有倒退的感覺，不太著重去推動文化藝術，甚至民生方面亦沒有著力去推動。」水禾田更指出香港是一個大都市，應該可以發掘出更多給予藝術家創作的空間：「因為有藝術，社會才會有進步、有文化，以及在這裡生活的人才會感到活得更有意義。香港是我很喜愛的地方，感覺很有活力，可是藝術家們卻像是『大閘蟹』，被人綁住一樣，空間和機會都太少了。」

## 人生如攝影

時代不斷進步和變化，水禾田不得不跟隨腳步，由以往用大型攝影器材，改用數碼相機。以往不少國際著名攝影師都手執一部名貴相機，動輒數萬或數十萬的相機，不過水禾田只拿著一部普通數碼單鏡反光機就出發。現今香港物質豐盛，不少人都擁有比水禾田更名貴、性能更好的相機。再加上菲林時代不再，現在已進入數碼化、電腦化的世代，以往要影一張相，首先需調校光圈和快門，現在幾乎只要隨手一按快門，就可以拍出有如大師級的相片，效果不佳時還可以用電腦後期製作，加強相片的感覺。數碼化既方便，亦增加了不少人對攝影的興趣。

不過，對此水禾田卻有另一番見解：「現在攝影太過方便，反而失去了攝影的『心』，以及一種建立信心的過程。以往我們很珍惜每一格菲林，拍攝後要等候沖印，對於拍攝成果滿懷期待。可是，現時科技一直改進，想不到時至今天，我自己也會使用數碼相機。可惜，在使用數碼相機攝影的方便之中，年輕人好像對攝影輕視了，因而對自己個人亦輕視了。即是因為攝影變得很『容易』，便以為不用學習便可以做得到。而且拍得不好時，可以隨時將它取消、刪除，再來多一次。這會令人慢慢失去信心，忘記攝影的意義。因為攝影的意義，在於真實地紀錄當下情景。」

對水禾田來說，菲林與數碼並不存在太大的分別，只要我們懂得珍惜，就算是一部陳舊的相機，一樣能夠拍出令人欣賞讚嘆的作品：「因為新科技，我們會用數碼相機，但數碼只是一剎那間的事物，裡面的相片隨時可被取消，一按錯了鍵，可能會把所有照片刪除，連底片也沒有。若以數碼攝影和菲林攝影兩者比較，我覺得各有好處。對於一部相機，我們要珍惜它的每一個攝影功能，利用這些功能拍我們認為有意思的事物，就如音樂家即使用最簡單的樂器，也可以創造出獨特的韻律。一枝破筆若碰上一個好作家，或好畫家也可以寫出很多好文章、畫出很多好畫。因此，我也只是希望用簡單的相機，去拍到更多我心目中的景像。」

水禾田認為若以廣闊的心胸去看事物，將目光放遠，用腦用心、敢於創造，機會一定會來，並將人生比喻為攝影：「有一種鏡頭叫『廣角鏡』，像『廣角鏡』般看事物，將心胸擴到很闊，視野便更寬闊。人生亦好像長鏡頭，將焦點放遠，有遠見，才有機

會。年輕人最重要的是勇於創造，把握所有，就有機會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 攝影以外

水禾田除了是一名攝影大師外，同時亦是一位著名畫家，又曾經拍攝電影、製作紀錄片，到過內地以至全球多處地方，將事物景物一一拍下。早期他是畫畫的，也從事過設計工作，亦喜歡拍電影，尤其是紀錄片，因為紀錄片與攝影較為接近。

努力了六十多個年頭，水禾田從不言休，仍然不斷學習，希望可以懂得更多，眼見現在不少年輕人對藝術、對攝影都有濃厚興趣，可惜並沒有太多正規途徑可以學習，於是便到大學任教，分享多年來對藝術的心得。他表示：「其實我很早之前曾教授兒童畫畫。我喜歡畫畫，也很喜歡看見小朋友有畫畫的興趣，小朋友的畫很自然沒有拘束，故自己在教學之中可以吸收小朋友的天真無邪、自然豪放的特質。最近，我又在大學教美術及攝影，現在的年輕人看來很聰明，懂得很多，但認真了解後發現他們原來很浮面，我希望在教學之中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早前他在香港，舉辦一個以荷花為題的畫展。展覽中的畫和瓷器，全部都是水禾田一手一腳創作，在他眼中這些都是平平無奇的小作品，但是在其他人眼中卻都是絕美的藝術品。水禾田大部分的作品皆圍繞大自然的主題，他笑說可能和他的名字有關：「『水禾田』，很大自然，字面和鄉間都有關連，有水、有禾、有田。所以，我拍的、畫的作品，大都和大自然有關。」

除了教書、攝影，水禾田一有時間就會回去廣州的畫室畫畫，至於為何選擇廣州而不留在香港，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空間」，水禾田認為香港地少人多：「買樓『上車』很難，搞藝術就更加難。近年，很多藝術家都在工廠大廈創造自己的藝術天地，而我就移師到中國內地，因為空間較大。回想昔日，香港文化氣息很濃厚，不過感覺很樸素，而且報紙、雜誌都有很多投稿園地給予年輕人或喜歡藝術的人士去發表。現在，香港很先進了，但這種先進只止於經濟方面，至於藝術方面的發展空間則不大。現在沒有了文藝雜誌，投稿園地消失了，根本就沒有地方給藝術家立足，去表現他們的藝術。」

# 鮑起靜

## 香港平民影后



### 起落不驚、靜淡人生

「起落不驚、靜淡人生」這八個字道出這位平民影后的人生哲理。面對影后殊榮，鮑起靜以平常心對待：「獲得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那一剎那當然覺得很開心，感覺上天眷顧了我，開心得像飛了起來。可是，這只持續一段很短的時間，很快我就明白到所有的名利，都是暫時的，不要看得太重。」

鮑姐無論鏡頭前或鏡頭後，總是表現認真。拍劇對她來說雖已是習以為常的事，但她仍是時刻劇本不離手，用心揣摩每一個角色，每一句對白。鮑起靜說：「由開劇本會、製作會議開始，就要全身投入。劇本的對白都是編劇寫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說話習慣，演員一旦投入了角色，就要將劇本的對白照自己的說話習慣去修改，根據角色的性格去作口語化的處理，不要死板地跟著劇本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和她同年一起奪得金像獎最佳導演的許鞍華，亦稱讚鮑姐工作認真，有敬業樂業的精神，她曾在亞視的訪談節目中說：「鮑姐的演技令我很驚訝，1998年拍『千言萬語』時，她演李康生的媽媽，她主動去學潮州話，又在劇中扮飲酒，她有一次背著光在說潮州話，我竟完全不認得她是哪一位。」



鮑起靜在觀眾眼中，是一位辛勞窮媽媽，她的純熟演技，感情自然流露，一次又一次感動觀眾。縱使她憑著《天水圍的日與夜》奪得第二十八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一躍而為金像獎影后，鮑起靜仍然散發一種樸實自然，平易近人的感覺。

## 長城第一花旦

生於演藝世家，遺傳了父親鮑方和媽媽劉蘇的演戲基因，年幼時已成為小童星，在片場中穿梭。1968年，她參加當時的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電影公司的培訓班，開始她的星途，雖然有長輩的扶持，入行後平步青雲，擔當女主角，但她說從來沒有將自己定位為大明星，只是希望當一個平凡的演員，一個實實在在的演員。

提起片場，鮑起靜有無限回憶：「年幼時我常來看爸爸拍戲，入行也是因為父母的關係。演戲會接觸到每一個階層的角色，如何能夠體會到一些低下層或勞苦大眾的心理及家庭狀況呢。爸爸看見我尚算有點天分，所以他支持我入這一行，的確我自己演戲也是很熱愛。」

從訓練班畢業後，就成為公司的第一花旦，擔綱主演《白髮魔女傳》。可是人生如戲，必有起伏，鮑姐的演藝事業，亦曾有暗淡的時候。鮑起靜初入行時就做女主角，星途平坦，受到一眾叔伯的疼愛。可是，當時的電影圈比較殘酷，一個女子到了三十歲，年紀已經算大，不可以再當女主角。

不可以當女主角，對演員來講，夢想破碎了，但豁達的鮑姐並沒有放棄，她選擇了坦然面對：「一個演員最難過的一關，可以說是名利，當你是主角時，很多記者會圍著你做專訪，一旦你一轉型，不再是主角，就全盤被忽視。由飾演主角，到做配角的階段，我都能順利過渡，而且過渡得心安理得。因為每一齣戲，除了主角，每個角色都很重要，起著綠葉的作用。所以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就能從中找出快樂和趣味。」

## 百變媽媽

1979年，鮑姐加入亞洲電視的前身麗的電視，成功轉型拍電視劇，主演過多部受歡迎的電視劇，亦為綜藝節目擔當過主持。當中的演出，以媽媽的角色最深得人心。鮑起靜由一開始拍電視劇就已經是演媽媽，對於飾演媽媽，鮑姐有她的自己的見解：「媽媽角色絕不是千篇一律，世上的媽媽有很多相同之處，但每一個媽媽碰到的困難卻各有不同，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可以扮演不同階級的媽媽，令我感受到很多人生的經驗，覺得在這個世上沒有白活。」

《天水圍的日與夜》中鮑姐飾演窮媽媽，她將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最終得到眾人的肯定。這個獎對鮑起靜很重要，她說：「這個獎對我來說是事業上一個很大的肯定。但其實得獎都只是曇花一現，每年都有很多人得獎，千萬不要以為這些光輝是永恆。如果將自己的位置放得太高，最後痛苦的會是你自己。」

## 家人的位置

為人母親，鮑姐無論有多忙，工作有多辛苦，家人都是她背後的原動力，鮑姐對家人心存謝意，在金像獎頒獎禮說：「我要多謝我的丈夫及我最愛的乖女兒。多謝他們對我真誠的愛及支持，使我的生命充滿意義。」現實生活中，以媽媽的角色來說，鮑起靜給自己六十分：「因為我疼愛女兒，是一個慈母，幸好我的女兒沒有成為敗兒。一個好媽媽，我覺得除了關心愛護子女之外，還應該在其他方面對她有所指導，我不喜歡用說話教訓人，也不喜歡與人爭論，所以對我的女兒，我都是身教多於言教。」

要拍劇，又要出席公開活動，但是忙不是一個借口去忽視家人，她認為：「任何人都不能

能說忙到不可以來看父母、忙到不可以照顧子女，或者忙到不可以幫忙丈夫，我覺得這些都是借口。其實無論多麼忙，只要懂得安排，我覺得每一個女人都可以有時間全面地照顧家人。」

## 念舊知足

鮑姐多年來都留在亞視，是因為一份執著，一份感情，鮑姐說：「亞視是我另外的一個家，當我看到當時的亞視熱火朝天，每個人都很投入工作，無論是演員，還是導演、攝製隊，都日以繼夜地在外景拍攝，我覺得很感動，自己也很喜歡在亞視這個環境中工作。現在亞視的工作環境，已經改變了很多，由當時的熱火朝天，到現在的冷冷清清，經歷了很多個朝代，仍留在這裡，這可能與我的性格有關。第一我比較念舊；第二就是仍然有些不服氣，對亞視有種情意結，即始終懷著一絲有一日會變好的希望。」

年過六十的鮑姐，無論外表抑或內心仍然年輕，任何時候都可以見到，她開朗親切的一面，經常在錄影廠，與年輕的演員、工作人員打成一片，亦是他們學習的對象。在亞視演員梁慧嘉的心目中，鮑姐便一個瀕臨絕種的好心人，而鮑姐的精湛演技也讓梁慧嘉留下很深的印象。

身處影圈這個外間覺得是明爭暗鬥、你虞我詐的小圈子多年，鮑姐說並不是要學懂如何不斷向上爬，而是要做好本分，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這個圈是否一個大染缸？其實每個人來到，要變成甚麼顏色都是你自己選擇的，也可以是白色的。所以染缸不單可形容影圈，也可以形容整個社會，社會上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就看你如何去學習。」

一直堅持著，一切隨遇而安，不要奢求太多，就是這一位影后的成功秘訣。她認為人生匆匆，眨眼便過，偶爾回望，如果發現做了有意義的事，對電影界也有一點點的貢獻，便不枉此生了。鮑起靜就是如此知足，她認為：「我覺得有一些人尤其是有理想的人，都會想自己達到甚麼程度，得到甚麼成果。可惜人生的遭遇，並不是如自己想像般理想，但請不要失望，退一步想想，你就會感到海闊天空，得到又如何，反正很多東西永遠都帶不走，所以不要去執著。」

# 李樂詩

## 勇闖地球四極的 第一個中國女性



### 極地征途前的藝術生涯

李樂詩是第一個勇闖地球四極——南極、北極、珠穆朗瑪峰及雅魯藏布大峽谷的中國女性，她在極地工作超過二十五年，南征北討，歷盡驚濤駭浪，希望以藝術包裝科學把一段段極地的美景，以至地球暖化的殘酷真相，帶到大家眼前。

在未踏上極地工作的征途之前，李樂詩從事廣告設計，創作過不少家傳戶曉的商標包括膾炙人口的家計會標語、中電標誌等。憑著過人的幹勁，未到三十歲她已創立了自己的廣告公司。在八十年代初，李樂詩環遊全世界後，趁國家開放開始到中國旅行。李樂詩第一次到中國，有感中國風光實在絕美，另一方面她又為當時中國經濟的落後情況而惋惜，看到人民生活窮苦，她希望中國能在國際上佔有重要的席位。

1980年，當中央批准成立深圳經濟特區後，李樂詩馬上向中國旅行社建議在深圳建小人國，展示中國的名勝，李樂詩認為：「雖然市民去不了，但都可以讓他們見識一下紫禁城、萬里長城等景色的壯觀。後來總經理接納了我的倡議，於是就有了錦繡中華。後來，我又向旅遊局建議建世界之窗，中國年輕的導遊，也可以用來作為訓練的地方。」



明知前往極地，存在生命風險，李樂詩仍然勇往直前：「去極地考察的風險率是未知數，生存機會只有一半，但我願意以生命做抵押，前往極地。不過，每次平安回到香港機場，我會在心中對自己說我又活著回來了，心情也特別開心。」

李樂詩亦曾經是電影界的一份子，在 1980 年憑《撞到正》奪得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李樂詩的事業如日方中，商業藝術創作為她帶來名與利。直至 1985 年，她擔任中國極地考察隊來香港展覽的設計工作，她被南極的景色吸引，於是向考察隊隊長申請，希望到南極拍攝，而這個決定亦改變她的一生。

去到南極洲，感到整個環境充滿藝術感，因此她萌起將大自然的藝術融入科學的念頭。當見到中國科學考察站的紅旗在白雪中飄揚，李樂詩非常激動，覺得：「我定要盡我所能做好這次的工作，每個風景都不能放過，而且要拍得很好。最後一天我要離開時，我整個人深入雪裡面，腳也提不起來，我心想難道它叫我不走，於是我低頭跟雪說，答應它我一定會再回來。南極洲比中國還要大一點四五倍，它對地球的影響力很強，所以吸引我一直追下去。於是，我放棄廣告，開始慢慢淡出比較賺錢的廣告業，而投入這個要投入金錢的義務工作。」

## 推動中國極地科研工作

由 1986 年開始，李樂詩多次自費到北極考察，一開始時是進入格陵蘭的愛斯基摩村考

察北極的環境。李樂詩回憶道：「我們不能良好地溝通，但有些愛斯基摩人會說丁點英語，我便慢慢跟他們學習，終於學會了愛斯基摩人那種堅強及自救能力。有時，我也坐直升機，拍下那裡的地形地勢。我回中國時，呼籲中國科學家去北極看看，告訴他們那裡的研究價值很高。當時，踏入北極的已有好幾個國家，將來這裡的氣候會影響到我們，若討論這裡的能源分配時中國便沒有發言權。後來 1995 年民間組織了一次去北極點，到後期中國就開始北冰洋考察。」

中國在極地的科研工作起步較遲，但多年來急起直追，目前在南極建成了三個科學考察基地，其中第三個建成的基地崑崙站，建於南極冰蓋最高的「冰穹 A」，創下世界南極考察史的紀錄。國家現時在極地的科研工作，處於國際領先的地位，李樂詩認為香港人亦應該加入考察的行列。

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何建宗也是受了李樂詩的鼓勵才去南極的，他記得：「第一次去南極是因為我在 1993 年到北京人民大會堂，李樂詩主動走過來問我是否有興趣去南極做科研？中國特別是香港很需要有科學家去幫忙做多點科研，李博士給我們一個很強的人際網絡，透過她我們可以聯繫到專家。」何建宗表示極地的天氣環境十分惡劣，李樂詩在極地拍攝其實一點也不容易，那裡的風速很強，就像香港的三號，或八號風球，非常寒冷。在雪地，可謂寸步難移，真的要像動物那樣爬，才能前進。

李樂詩至今已八次踏足南極，十次踏足北極，四次進入珠峰雪域，多年來以文字、圖片及影像紀錄全球暖化的痕跡。她記得：「在 1999 年，破冰船只能在北緯七十四度就止步，但現在這裡的海冰竟然完全融化。當時我看到的海水是淺藍色的，因為水下有冰。但現在北緯七十八度的海水卻是深藍色，因為水下面已經沒有冰。在 2003 年再度進入北冰洋時，破冰船已經到達北緯七十九度的區域。再到 2008 年之行，更加可以前進到北緯八十五度。按這個速度來計算，在未來二十年內北極的夏天可能再沒有冰，這是全球一個大警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需要知道全球性的氣候對我們有何影響，未來的農作物要如何適應環境的變化。」

## 孤身與癌魔搏鬥

為慶祝國家南極考察二十周年，中國極地研究所的破冰船——「雪龍號」在2004年10月訪港，停留三天，吸引一萬七千多名市民參觀。李樂詩是活動的主要搞手，在活動中出現的李樂詩看上去比之前瘦削，她向外界表示自己因為工作忙而消瘦。事實上，李樂詩在2004年初，確診患上第三期結腸癌，在「雪龍號」訪港前幾個月前才做完手術，就馬上為「雪龍號」訪港籌集經費。

李樂詩當時為何拒絕接受化療，而是在龍虎山郊野公園，連續三個月行山練氣，慢慢調理身體，李樂詩解釋：「那年剛剛是中國極地科學考察二十年。當時已經做了手術，考慮到如果『雪龍號』真的來到，而我做了化療，一定元氣大傷，我會站也站不到，於是以自然療傷搏一搏。當時我沒有告訴家人和朋友自己患病的事，直至做完手術才告訴兩名女兒。我的身體很虛弱，但我堅持每天正常運作，天天開會，因為破冰船訪港是大事，需要錢，需要泊碼頭，需要安排考察隊隊員來香港參觀，需要安排歡迎會、歡送會。而且我也有了心理準備，即使因此而死了也無悔，我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

李樂詩習慣獨立的生活，不輕易尋求別人的幫助。不過，為她施手術的黃錦權醫生，為她帶來重生的機會，多年來悉心照顧其健康，李樂詩視他為恩人：「去見黃醫生時他說你去南極也不怕，你還怕甚麼。他叫我放心，並說義務幫我做手術，令我十分感動，醫生的話令我對這個病不感到害怕，而且更加勤奮，因為這個恩賜是需要我更努力地工作去反饋。」

李樂詩太喜歡自己的工作，每一年都規劃得滿滿的，即使九十年代已試過排便時出血，但仍因考察工作太忙而置之不理。況且李樂詩早有心理準備：「我早就有預感，因為我們走山野，每次都走危險區，再加上近期環境污染那麼嚴重，所以我預感自己一定會生病。」

李樂詩將龍虎山郊野公園稱為自己的復康徑，對這裡的一草一木相當熟悉，她發現這裡有一個保存完整的炮台，經過她和一班學生的推動，現時炮台附近的郊遊區被列為

「松林廢堡歷史徑」。

## 創立中國極地博物館基金

李樂詩現在不會再到極地考察，但她沒有因此而空閒下來。1997年，她創立中國極地博物館基金，希望成立一個大型極地展館，展示極地科學家搜集的珍貴標本，為科研人員提供實驗室，向公眾推廣極地科學。不過香港寸金尺土，加上籌集經費困難，這個心願一直未能實現，她由極地搜集到的標本，目前散落在科學館及一些郊野公園的展覽廳。多年來，李樂詩為了基金會東奔西跑，她的朋友見到都希望可以幫她一把。

香港插畫師協會會長馬志雄見到她為了籌劃極地博物館而奔波，便自動請纓幫她的忙做擔任中國極地博物館基金的美術總監，運用自己的創作專長，設計一系列卡通人物，作為基金會的環保大使。當中馬志雄以李樂詩為藍本設計出來的卡通，面容上刻意加了一些滄桑感。馬志雄說：「每一條皺紋，都是經驗的象徵。經歷可以由日曬雨淋，而在皮膚上浮現出來。」

觀摩李樂詩在北極的考察照片與錄像後，他又創作出負責拯救地球的「猿人極地探險隊」，李樂詩和這班「探險隊員」，多次出生入死到極地考察，為他們拍照，甚至製作錄像，以更新穎的藝術方法，帶出氣候轉變的問題。馬志雄多年來亦同李樂詩一起為建立極地博物館而努力，他畫下大量博物館的設計圖，希望有機構支持他們的工作。

## 留給下一代

得到馬志雄的幫助，李樂詩的工作量大大降低。不過，她還有一個心願，就是要整理好由1985年開始，每次科學考察拍下的圖文資料，留給下一代，因為教育下一代是他們的共同目標。李樂詩拍下很多幻燈片，她想把這些幻燈片都處理好，把它們全部掃描，再加以組合。她說：「我很喜歡看幻燈片的影像，無論我搬去哪裡，這些都是我的第一財產，也是我的遺產，可留給下一代。」

李樂詩到學校舉辦講座，除了要喚起年輕人對全球暖化的關注，李樂詩亦希望以自己

的一生為例鼓勵年輕人，努力尋找人生目標，爭取時間學習，為達成目標鋪路，擁有豐盛的人生。李樂詩鼓勵青少年有理想就應堅持，因為活著一生，能夠做到自己喜歡的事就是幸福的。

# 毛俊輝

## 香港劇壇教父



### 嚴師出高徒

毛俊輝在上海出生，十歲才跟隨父母移居到香港，他自小就喜歡戲劇，在學校也是活躍份子，常自告奮勇參加朗誦比賽、話劇表演，而且得過不少獎項。毛俊輝目標清晰，長大後遠赴國外修讀戲劇。畢業時，因香港當時還未有專業的劇團，回港根本就沒有實踐機會，於是毛俊輝就暫留在國外發展。

1984年，演藝學院成立，毛俊輝回港擔當戲劇學院系主任一職，展開他的教學生涯，一教就十七年，「毛 Sir」也成為了他的另一個代號，在他的教鞭下出了不少成就出色的高徒。大家常在銀幕上見到的黃秋生、詹瑞文就是他的學生，還有《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劉雅麗，近年用獨腳戲《29+1》說出女士心聲的彭秀慧，中英劇團的台柱之一盧智燊，以及成立了劇團的林澤群，都是他的學生，全都獲取過舞台劇界的「劇帝」、「劇后」殊榮。

要考入演藝學院的表演學系，絕對不容易，每年數百名的申請者中，最後只挑選出廿多名學生。毛俊輝的看法是：「學生若本身有天分，且肯付出努力，肯去追求就已經是最好的學生了，所以我有很好學生。至於可以得到甚麼成就，那便要看個人的緣份及機會。作為一個老師，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去建立信心，建立穩固的基礎，

從讀書到做演員，再到教學、做導演、做藝術總監，接著擔任公職，所有東西都離不開「戲劇」二字。



令他一生受用。」

從學生的角度來看，他絕對是一名嚴師。劉雅麗說：「他很兇。由於太著緊學生，學生表現有問題時會狠狠地、不給情面地罵，有些學生曾給他罵到哭。上課時，常要求我們即興演出，有時我們會做得很差，那他就會立即叫停。有一天，我上他的課上得很害怕，因為總共被他叫停了三次，當時我真的滿眼都是淚。」

盧智樂則認為毛 Sir 教學有他的一套：「毛老師著重因材施教。年輕時，我會質疑毛老師。長大後才明白，原來他是針對每個人當時的情況來給意見。」當見到學生有進步時，毛 Sir 也會給予鼓勵，彭秀慧便得到過極少稱讚人的毛 Sir 突如其來的一記鼓勵，著她要注意到自己的進步，令她感動得忍不住流眼淚。

每年學生畢業在即，毛 Sir 總要和每個學生見面，和他們來一番肺腑之談。林澤群也不例外，他憶述：「我記得我是在飯堂和他見面的，我們單對單，看著格仔桌布，他說『林澤群，你的才華有整張桌子那麼多，但你現在使用出來的卻只是一個小格。』聽到這說話，覺得很震撼，當年我以為自己在一間那麼專業的學院中修讀，以為自己已學了很多，現在卻被形容為一小格。毛老師藉此提醒我學習未完，畢業後出去外面，每一年的經驗都是學習。」

## 生命與戲劇分不開

為了進入戲劇世界，毛俊輝遠赴美國學藝，十七年來付出無數艱辛的嘗試，他回憶道：「在美國，想做戲劇，可以自行到一個教會，一直演至有人看，有人找你做戲，然後才能進入一個較有規模的團體，那你就會有一個正式的身份可加入工會。我就是這樣做起，一直做到百老匯、地方劇團、實驗劇團，各式各樣都做過。為何一直那麼愛戲劇？其實現在我愛戲劇與我初初投入戲劇的心態已不同了，初期很天真爛漫，覺得那東西很刺激及令我開心，但當認識得更深入，以及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時，你開始會更加懂得珍惜它，因為那東西可創造出更多的東西來。」

毛俊輝入行了近四十年，參與超過一百部舞台劇作品，有「香港劇壇教父」之稱，仍

作出多種嘗試，近年更創作粵劇，他形容好像找回自己的初戀一樣：「因為受了爸媽的影響，他們介紹了中國戲曲給我認識，我自小就喜歡戲曲。不過在香港時，雖然很嚮往粵劇，可是學習機會並不多，教育又好、工作又好，都很難認識粵劇。後來我去了美國讀書，十七年後回來香港，我又可以重新接觸戲曲，所以這就是我的『初戀』了。」

業界人士常說毛 Sir 早已與戲劇結了婚，作為戲劇界的重要人物，2010 年年尾西九管理局前行政總裁謝卓飛，邀請他擔當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怎料過了不久，謝卓飛突然辭職。毛俊輝表示期望新的行政總裁 Michael Lynch 用心帶領發展西九。

毛 Sir 現時的公職多的是，2010 年民政事務局成立了「港台文化合作交流會」，毛 Sir 擔任召集人，主要加強兩地創意產業之間的交流。毛 Sir 提出：「我們對台灣的認識不少，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藝術節，我們的文化節目會長年累月介紹台灣的作品。但我希望在台灣可以有『香港周』或『香港節』，以便在台灣介紹香港的文化藝術作品。」

毛俊輝其中一個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香港話劇團擔任藝術總監，過了七個寒暑。他在 2001 年進去時，提倡將劇團由政府機構變作公司化，他想起：「最後一年，我爭取到團員的薪酬可以根據他們的能力及付出以正比例的機制衡量，我覺得很安樂。話劇團以前是和政府機構一樣，根據年資計薪酬的。當然有年資的有些能力很高，但也看到有些年資沒那麼久的天天都要上台演戲，但就因為年輕薪酬就較少，這不合理。藝術團體不應該這樣，努力地為他們爭取的用意，並不是錢，而是對大家的一份尊重。」

公司化後，劇團主要的收入便是票房，即是說推行藝術事業也要學懂推廣，毛 Sir 也認同：「最初在香港看劇沒有選擇，不是香港話劇團就是中英劇團，現在有數十個團都在做，如不懂介紹宣傳自己的作品，則難以與人競爭。所以宣傳推廣在藝術行政上很重要，與藝術創作密不可分。」

要有票房，戲劇就一定要保持好的水準，所以毛 Sir 著緊每一場戲的演出效果，劉雅麗曾有這樣的經驗：「有一次，我自己也知道表演有點失準，果然中場休息時毛老師便來大力敲打化妝間的門，房內都是女孩，他叩門進來問我在做甚麼，沒有一首歌唱得

好。然後，整間房間陷入死寂，接著他就走了出去。到了完場時，我又在技術人員入口見到他，他對我說下半場沒事了。他的脾氣就是這樣。不過，他對我兇了之後，下半場我就會特別小心，打醒十二分精神。」

## 人生的轉捩點

學習表演藝術的人，都懂得這一句說話叫「To Act Is To Do」，意思即是你的戲要真心地去做，而不是演出來，每一齣戲毛俊輝都很用心去做，在 1992 年他依然用心去做一套《一籠風月》，結果改變他的一生。在這套戲中，毛俊輝第一次和胡美儀合作，他說：「我根本不知道誰是胡美儀，胡美儀又不知道誰是毛俊輝，我們就這樣一起排戲，排得很開心、很投入，我覺得她很有心機演戲。」

胡美儀亦對毛俊輝讚不絕口：「我相信這就是一位好老師，他懂得引導我如何入戲。當時我對在舞台上的拿捏不太準確，每一場的表演水準參差，他會遷就我的不穩定，而去做不同的反應，所以觀眾完全看不到我的缺點，後來我得了最佳女主角，他就得了最佳男主角。」

就這樣，毛俊輝及胡美儀在相處了十個年頭，怎料在 2002 年毛 Sir 突然患上胃癌，足足做了十個月化療，在這段時間胡美儀還要擔任電視劇的工作，但她仍堅持在電視台及醫院兩邊走。胡美儀笑言：「在那段期間，他曾經笑我太敏感了，因為他患病時適逢沙士，所以要敏感到所有東西都要乾淨，用酒精消毒。當時他住在醫院，我每一天都悉心打扮自己，才去醫院探望他，盡量不想讓他覺得我負擔很重。再加上他也是唯美派，所以我想漂漂亮亮地在他眼前出現。」

做完手術後，毛 Sir 陷入昏迷狀態，胡美儀描述當時的情形：「當時他昏迷了，說甚麼都沒睜開眼。最後，我說這個社會培養了你數十年，你不可以就這樣離開這個藝術舞台，你忍心就這樣放下學生和未完成的藝術嗎？他睜開眼了，就是因為舞台藝術，他可以重新睜開眼，跨過生死那一關。我才知道原來真的有人如此深愛舞台，原來藝術舞台就是他的生命。」

逃過鬼門關，對人生又有另一種體會，毛 Sir 更學會珍惜，在 2004 年與胡美儀共諧連理。毛 Sir 說：「我現在每做一件事，都一定問心是否真的想做，覺得有價值的就去做，用心地做，因為不知道何時就會完結。」

# 張瑪莉

## 名人幕後的形象軍師



### 視磨練為祝福

張瑪莉的出身很多人都知道，她從來不會掩飾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位處銅鑼灣的保良局就是她長大的地方。

重遊保良局，張瑪莉顯得很雀躍，來到以前所住的宿舍，她滔滔不絕地憶述往事：「當時有很多心事，不知道如何跟別人說，我便合手祈禱，把心中情盡訴。這裡有很多快樂的回憶，人生內最好玩的其實不是玩具，而是可以一起玩的伴侶，我由小到大一向不缺玩伴，常常幾十個小朋友一起玩，真的很開心。我人生最早期的十多年都在這裡渡過，直到二十一歲才離開，所以這是我的娘家。」

孤兒，無父無母，曾經睡過街頭，這些外人眼中不好的東西，對張瑪莉來說反而是祝福。張瑪莉回想六歲時的流浪生活，感慨良多：「那時我看到一些媽媽牽著小朋友去上學，我跟著她們去到學校門口，心想為甚麼他們可以上學，我不能。有時候兩三天沒有飯吃，走在街上，有些店舖東主會給我叉燒飯，當時我覺得叉燒飯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我又曾試過睡天台、樓梯底，打風的時候水會滲進來，那我就到人家家中的二、三樓轉角位睡，但仍會聽到『嗖嗖』的風聲，感到很害怕。後來被社會福利署發現才送進保良局。」



張瑪莉的人生，是無數香港人的勵志故事。別人覺得她無父無母流落街頭很可憐，她卻視之為上天的一份祝福，讓她學懂甚麼是愛，活出美麗人生。

小時候沒有家人照顧，長大後張瑪莉更懂得愛家人。現在，張瑪莉的丈夫逝世了，她最親的人便是兩位子女。她說：「在子女身上，我學到很多，經歷很多我小時候沒有機會經歷的事情，包括上幼稚園、辦生日派對。因此，我覺得神很好，過往雖然有很多所謂創傷或失去的東西，但祂卻讓我在往後的日子再經歷，感覺到真愛、家庭。」

## 開關人生路

1975年獲選為港姐冠軍，後來張瑪莉加入佳視當編導助理，不久加盟麗的電視做節目主持和演員。婚後淡出娛樂圈，1995年成立張瑪莉市場推廣（國際）有限公司並擔任執行董事，曾經幫過不少香港大人物做形象指導。十五年前，張瑪莉用自己的名堂成立的市場推廣公司，只是想幫企業搞好品牌形象，後來發現人才是最需要改善的元素。因為很多內地甚至香港的公司，硬件超出五星甚至達到頂級，可是人的質素還是很低。

由改善公司硬件逐漸擴展到人的包裝、修養、儀態，都要同步改良。張瑪莉的客戶網絡，也由私人企業、上市公司，覆蓋至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學府等，張瑪莉的理念

並不是教人打扮，反而認為無論是企業老闆、員工，甚麼身份都好，都要包裝得宜，這不只有利真正有實力的企業更上一層樓，人生亦會變得不一樣。張瑪莉相信：「人是可以被改變的，一個人會改變是基於愛。愛自己，令自己在各方面得到提升；亦是愛別人，因為這樣別人會更願意去親近你，明白你。」

## 葉劉淑儀大變身

葉劉淑儀的「掃把頭」髮型，是她做保安局局長時人人都記得的硬朗形象，她 2003 年辭職，到 2007 年再出戰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時，形象大變身，葉劉淑儀的「掃把頭」不見了，她當時承認找人包裝過自己。而這個幕後軍師正是張瑪莉。

張瑪莉認為：「不可以強行改變她，她真的捍衛了她的髮型很久了。我們要尊重人，只可以提意見。最後，她選的髮型，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喜歡，她自己也很喜歡，如果她不喜歡，你強迫她，那就好像是迫她接納不屬於她自己的東西，這是不行的。」另外，張瑪莉也幫她挑選了親和力較強的衣服，例如米色、粉綠、粉紅等淺色系列的，再配搭絲巾。絲巾不但可將硬朗的形象軟化下來，也可以點綴整體的美觀。張瑪莉覺得政治人物有了這一方面的形象改變，會令他們在工作上、或者社會上得到尤其是較多選民的認同和讚美聲音。

## 政治人物形象包裝

張瑪莉幫過不少香港的大人物，近年她更進軍到內地，連外交部的官員亦邀請她指點形象。張瑪莉認為：「當政治人物一走出來，我們的注意力就會去了他的形象造型上面。若打扮得太花枝招展的話，聽眾的注意力就不能集中在他的談話上，如果穿衣簡潔，頭髮整齊，那麼聽眾的注意力就可以集中在講者的講話上。例如美國的前國務卿賴斯、現任國務卿希拉莉、中國的前副總理吳儀、德國的總理默克爾，他們都是短頭髮，佩帶簡單的珍珠首飾，穿著淨色套裝。」

中國國家領導人或者外交官，與海外元首有不同風格。張瑪莉認為內地及香港官員的形象給人父母官的感覺，故她會著重提供可以拉近政治人物同群眾距離的意見。張瑪

莉覺得中國的外交官或者政治代表，在與人溝通時皆缺乏眼神接觸、身體語言，以及面部笑容，她指出：「中國領導人很少將手放在桌上，通常都放在桌面下。而我們見到的往往就是正面上半身。外國的領導人則相反，他們的手都會放上桌上，一邊說話，一邊做手勢配合，利用身體語言去增強說話的力量。那麼，對中國領導人，我們會提供一些意見，為他們的形象增添親和力。有時，我會鼓勵一些政治人物去參與音樂或者藝術相關的活動，讓他們與市民來往時，可以表現自己多層面的知識。面對危機處理時，外國的政治人物，很多時都採用四兩撥千斤的方法；而香港和內地的政治人物，一遇有事發生，他們可能會即刻黑面地走去回答。我經常對他們說其實可以先去理解一下事情，等大家安排好了，然後才梳好頭，打好領帶，穿好外套，氣定神閒地去回答問題。這樣對市民，對政府來說，都是好的。」

## 英雄莫問出處

「沒有昨天的我，哪有今天的我。」張瑪莉認為沒有小時候艱苦的日子，就沒有今日的張瑪莉。參加選美奪冠後一夜成名，在 1988 年當選十大傑出青年，之後又獲選為十大傑出女性，十大愛心之星，廿一世紀女性典範，成功女性大獎，中國百名傑出女企業家獎，傑出愛心演藝人大獎等多項殊榮，陸續為張瑪莉的人生進行加冕。

張瑪莉說：「我不敢說自己成功，我只覺得自己一直都很努力，成功了第一步，就發現有第二步要走。依我看，在不斷的成長中，能到達某一個位置，這並不是成功，而是要一直去學習，充實自己，然後又再成功了一點點，跟著又再向前走。」

張瑪莉認為人生不能選擇，人一出生就要接受現實，在甚麼家庭出生，出生時有何缺陷等，都沒得選擇。然而，前面的路是可以選擇的，正所謂「英雄莫問出處」，千萬不要太計算，也不要妄自菲薄。張瑪莉感到不枉此生，她說：「若是叫我重新再活過，我也會選擇今天的張瑪莉。當然有很多挫折，流過很多眼淚，遇過很多失意事，但我覺得所有這些都是祝福，令我今日懂得甚麼叫做愛。」

# 閻惠昌

## 為音樂而生



### 由一支笛子開始

「我為音樂而生，音樂就是我生命中最主要的部分。」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閻惠昌如是說。

由 1997 年起，閻惠昌曾經指揮過北京、上海、台灣和新加坡等地的大型中樂團。他三十三歲便獲得國家一級指揮的名銜，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一級指揮。後來，他更獲頒發銅紫荊星章，這肯定了他對中樂的貢獻。閻惠昌在音樂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但他的音樂故事，卻是由一支小笛子開始的。

小學時閻惠昌的音樂興趣仍未被開發，當時他與哥哥上的是同一家學校，他的哥哥很喜歡音樂，有一次有一個賣樂器的人，背著笛子、胡琴到學校來賣，哥哥便買了一支笛子。閻惠昌當時不以為然，更怪責哥哥胡亂花錢。怎料後來喜歡上吹笛子的卻是閻惠昌，而且把這個樂器佔為己有。

就這樣，笛子開啟了閻惠昌的音樂大門，之後他研習過的樂器例如二胡、三弦、小號、手風琴等等超過十種樂器，除了二胡外，其他都是無師自通。



閻惠昌對每場音樂會的要求很高，即使是表演前的綵排，他都不會放過對每一個小節完美的追求，務求將最好的帶給聽眾。憑著對表演質素的持續追求，他帶領著香港中樂團一步一步走到民族樂隊發展的最高峰。

閻惠昌說：「只有學二胡，跟過一位老師，其餘都是我自學的。有些樂器更是從雜誌上學來的，比如說手風琴，當時有一本雜誌有連載張志強教授手風琴，我就跟著學。鋼琴也是自學的，那時適逢文化大革命，每天都聽到樣板戲，聽多了，我就將那些音樂用鋼琴把它彈出來。」

## 迎接新挑戰

1983年，閻惠昌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後，隨即被分配到每個中樂音樂家夢寐以求的中國中央民族樂團，任首席指揮兼藝術指導，他憶述：「記得我進入中央民族樂團時，有很多團體一直跟中央民族樂團在爭我，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學過五年的，在中樂指揮裡面好像全國招生只招了我一個，正所謂物以罕為貴，再加上我在學校時作的曲，也得了很多國家級的獎項。」

他在中央民族樂團工作了八年，創下一個又一個的紀錄，更曾經成為內地首位由一人完成全場指揮的指揮家。閻惠昌表示這八年，樂團給了他很大的成長空間，提供他將在學校所學加以實踐的機會。

1991年他決定離開中央民族樂團，當時他的決定被稱為「中國音樂界的十級地震」。閻惠昌說：「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因為離開中央民族樂團，就沒有了醫療保險，也沒有了很多國家公務員的條件。可是我覺得我未來的音樂生涯，還是需要有更多的挑戰，我生性喜歡接受挑戰，特別願意去做一些錘鍊。」

離開中國後，他到新加坡一家唱片公司任古典音樂部總監，當時電腦才剛剛盛行，公司以電子編曲，便考起這位對機器零認識的中樂大師。當時，電腦軟件的使用說明，都沒有中文版本的，閻惠昌只記得每天都在查字典，有時也會打電話去問賣電腦的售貨員。

終於，閻惠昌克服了軟件的問題，但卻犯上大部分人初用電腦的毛病。閻惠昌憶述：「有一次公司的老闆要求兩個星期內用電腦編一個作品給老闆娘演奏，我們的老闆娘是著名的西崎崇子，雖然我需要解決語言問題，但是我覺得兩星期我可以完成任務，就答應。那時的電腦未能自動儲存，怎料當我工作了三個小時之後突然斷電，那三個小時所做的工作都不見了，當時真的有一種痛不欲生的感覺。」

當時閻惠昌由唱片封套、文字校對、編曲都從頭到尾一手包辦，差不多一個月做一張，他形容壓力非常大，不過卻很有滿足感。

閻惠昌覺得中國音樂本身所追求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電子音樂裡面，會聽到樂器裡面聽不到的聲音。他說：「電子合成的聲音很抽象，有些是小提琴的聲音達不到，二胡的聲音也達不到，笛子的聲音也達不到，只有合成的聲音，可能是通過你的編輯之後才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音色。」

除了音樂方面，家鄉在陝西，從小在黃土高原長大的閻惠昌特別酷愛中國文化，穿衣也講求融和的境界：「我非常喜歡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就像中國的文化，包含著中國的哲學，而中國哲學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當你穿著某種衣服時，別人會覺得你就是穿這種衣服的，令人感到既莊重又自然，這是穿衣的一種境界，透著一種自然，一種藝術，一種氣質。」

香港中樂團註團指揮周熙杰表示很多對中國文化和音樂的認識，都是從閻惠昌身上學到：「他是一個非常一絲不苟的名師及上司，很願意給機會予有天分的音樂家，對一些有天分的年輕音樂家，不但給予機會，且很願意教授。很多老師十八招只教出十五招，自己藏三招，閻老師是不會的。」

## 帶領香港中樂團走向高峰

離開故鄉陝西，閻惠昌先後在五個城市生活過，從事音樂事業，1997 年來到香港出任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帶領樂團宣揚中樂。香港中樂團是香港唯一擁有八十五位專業演奏家的職業中樂團，所編製的作品超過一千九百首，演出過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

閻惠昌加入這個樂團四年後，不但將中樂團公司化，而且由 1998 年開始便陸續與其他界別進行跨界合作作出多場精彩表演。

閻惠昌表示：「其實公司化的目的就是讓樂團脫離公務員的體系，因為公務員很多制度要按政府的運作，是不利於藝術發展的。脫離以後，便由一個董事會，或理事會來掌握大方向，由樂團管理層來管理，那麼樂團在藝術發展上，便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空間。」

與民同樂，向市民教授中樂，與西方音樂融合，與名人合作，甚至在音樂會中，每演奏一首樂曲前，給觀眾一些講解。閻惠昌希望香港中樂團可以作為香港，以及中樂的文化大使，得以全方位去發展，並將中樂融入多種風格，令其更為普及化，便於向海內外人士宣揚中樂。

在香港中樂團服務超過十三個年頭，閻惠昌是樂團至今任期最長的藝術總監。對中樂團，他以下的期望：「希望在若干年後，人們一提到香港中樂團，會覺得『噢！這是世界級的』。」

## 研發樂器履行社會責任

除了演出，閻惠昌認為要負起更加多社會責任。於是帶領中樂團改革傳統胡琴，研發環保胡琴系列，彌補傳統蟒蛇皮製造胡琴的不足。

閻惠昌指出：「傳統蟒蛇皮製胡琴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們非常受氣候的影響，因為在香港的濕度通常是百分之八十幾至九十幾，帶著這樣的胡琴到北京這種濕度約百分七十多的地方，蟒蛇皮的水分，就會被蒸發掉。那麼，本來皮已經繃得很緊，現在就繃得更緊了，於是它的音色就會變，可能二胡的音色就跑去了高胡的中間，這嚴重地影響了樂團演奏的編制。」

於是，香港中樂團以環保的 PET 聚酯薄膜人造皮代替蟒蛇皮，人造皮不單可以分解，令研發出來的胡琴更環保，而且音色還更穩定。2009 年去比利時演出時，樂團首次全部換上自己研發的樂器。

閻惠昌說：「由歐洲轉到美國，然後再去北京，在北京低溫度零下十幾度的時候，我們的樂器曾在室外放了將近一個多小時，當樂師把琴從樂器盒子取出時，冷得像雪條一樣。如果普通的蛇皮在這種情況下，在低溫的室外環境取出後立刻就進入有暖氣的室內環境的話，蛇皮很容易裂開或是壞掉，甚至產生變調。可是我們研發的樂器，一拿出來，只需稍為適應一下，進到室內後音色仍是很穩定，音色非常漂亮，而且音量的幅度非常大。」

香港中樂團所研發的樂器，更加吸引了各地的中樂團來取經，閻惠昌說：「最早是中國音樂學院，他們的校長，還有學生，曾經有過院團合作的交流計劃，他們來聽了以後就說這個樂器好，希望可以購買，所以在國內最早向我們購買樂器的就是中國音樂學院附中，還有其他的團體，例如山東民族樂團、瀋陽音樂學院。聽過我們的樂器音色的團體，基本上都被樂器的穩定性能、統一音色所吸引，希望可以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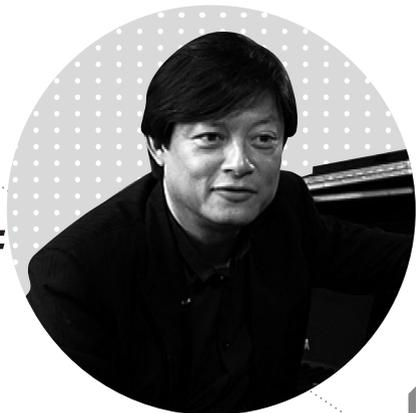
## 擋不住的緣

對於自己的音樂道路，閻惠昌以「緣份」的「緣」來作結。

他覺得：「我來到香港，跟香港中樂團之間有這麼一種緣份。中國人說的隨緣，也是一個很高的智慧。當緣來的時候，擋不住的。因此我要做的就是珍惜這一個與音樂之間的緣，只要我仍有生命，氣息尚存，哪怕只有一天，我都要為中國音樂的發展貢獻我最後的一分力。這就是我的希望，也是對我的生命的最後一個定義。」

# 莫華倫

## 德國首席華人男高音



### 夢想的實現

莫華倫在北京出生，七歲跟隨父母來香港。

1987年，莫華倫考入世界著名的德國柏林歌劇院，並成為首席男高音，參與過多部歌劇，這位華人男高音，從此吸引國際歌劇迷的目光。回到香港，莫華倫與一眾志同道合的好友於2003年成立「香港歌劇院」。在2003年的一次訪問中，莫華倫說：「我的夢想的第一步剛完成了，後面還有很多東西要做，這只是建了第一層的第一步，只打了個地基。有了自己的歌劇院，那麼我們就按傳統一直走下去。」

莫華倫認為歌劇是最全面的表演：「歌劇有舞台、燈光、聲效，舞台上的一切，都可透過歌劇表現出來。歌劇是一種融入國際的文化，歌劇表演可代表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不然，內地北京、上海怎會如此重視？」

回首過去幾年，莫華倫與好友創立的團體已表演過二十七套作品，這對莫華倫來說，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與好友創立這個團體，到現在已是第八年。這八年的經營充滿辛酸，因為我們是非牟利團體，政治資助不夠，每次演出都要四處找贊助，好像乞錢的。我現在的臉皮很厚，打極也不痛。」



三十多年前，他在夏威夷看到了一套歌劇——《波希米亞人》，便愛上了這種不用咪高峰，聲音可傳遍二千多個位置的觀眾席的表演，而這套歌劇也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更令他一把悅耳又洪亮的聲線可以響遍全球。

## 發展歌劇還望政府的支持

一般人常覺得，歌劇都是高高在上，莫華倫的想法剛剛相反，他說：「有一個詞彙，在內地常形容歌劇是『高雅藝術』，我並不是很同意，不要叫高雅，藝術就是藝術，沒有高低之分。很多好聽的民歌，難道要形容為低雅嗎？藝術便是藝術，音樂便是音樂，音樂沒有富貴之分。」

西九文娛藝術區討論十多年，終於「拍板」興建，可惜風波不斷，由設計到重新招標，再到前行政總裁謝卓飛辭職，這使業界人士不得不焦急。莫華倫認為：「拍了板就立即動工動土吧！因為再談下去也沒有意思，談來談去，都紙上談兵，我已很厭倦了。就連大陸周邊的城市，都已快過香港很多了，廣州也有很美的歌劇院了。」

一個城市要發展藝術，單靠團體的努力並不足夠，莫華倫去過紐約、柏林及夏威夷等地，他表示這些地方的政府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這也點出了西九是政府將來要面對的問題：「我覺得歌劇院是需要政府的資助。因為無論在西歐或東歐的歌劇院都是需要政府資助的，文化這東西只怕票房收支不夠，你不可以一部《卡門》一做就做三十場，

好像演唱會那樣，第一觀眾可能沒有那麼多，或唱歌的人也可能沒那麼多，所以這種文化等於一個博物館，每個社會及城市都需要有，但若只靠票房養不起一個博物館的。」

作為資深的藝術工作者，說到底莫華倫最希望西九有多點本地藝術團體長駐表演場地，這才可以有多點生氣：「若西九建了歌劇院，但卻沒有軟件及團體駐進去，也等於廢置。所以長遠計劃的話，政府應該與不同的團體傾談，讓我們長駐那裡。當然，我們希望在與政府溝通時，得到他們的認同。不過，現在說還是太早了，希望建好時我仍未退休。」

## 人生離不開音樂

四出表演多年，畢竟有點累，莫華倫也慶幸，一直以來有家人的支持。

莫華倫回到香港時，就不想出席太多的應酬，只要和老婆兒子聚在一起吃飯，享享天倫之樂，便很開心。他說：「很有趣，我們每次去其他國家及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報紙，看看當晚有甚麼音樂會，有甚麼歌劇可看，這是慣例來的，是生活的一部分，就等於去看電影，即不要將歌劇放在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不可以這樣的。歌劇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其中一個文化，你可以去欣賞。因為歌劇在一百多年前也是流行文化，只是現在人類進化了，有很多不同音樂，有很多不同文化進入他們的生活，歌劇就變成了古典文化。」

莫華倫的薰陶下，兒子莫禮剛一樣酷愛音樂，鋼琴、提琴樣樣皆曉，但莫華倫說尊重兒子的決定，讓他長大後自己決定：「因為他只有十五歲，到了他讀大學，自己再選擇自己的前途。但現在，我最少會製造他接觸音樂的機會，令他以後有多個選擇，但也未必一定要循著我的路去發展這個專業。要成為馬友友、郎朗，或者李雲迪並不是那麼簡單，但作為一個興趣或者副業，音樂對人生是很有幫助的。」

很多人都說，音樂可以陶冶性情，莫華倫相信：「在思維、處事情方面，音樂可令你不會那麼暴躁，也可令你的視野更為廣闊。有時音樂可令整個人放鬆了，不再鑽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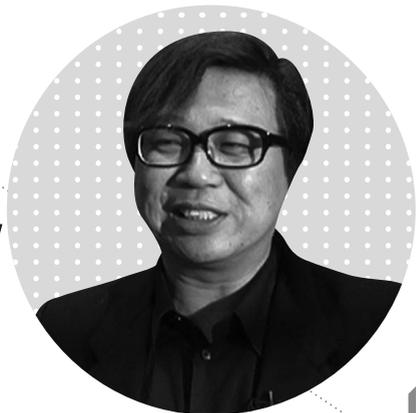
尖。我們的人生是離不開音樂的，任何一個時刻都需要音樂，婚禮、葬禮需要音樂，開心、哀傷也需要音樂。人類需要音樂，因為音樂是人類發明的，也服務於人類，缺少了音樂，人類會很悶。」

如果用「音樂等於生命」來形容莫華倫，一點也沒有錯。他回顧自己的音樂生涯不無感慨：「我唱專業至今年已有二十五周年了，由學音樂到現在也有三十多年了，離開音樂都不知道做甚麼好。現在我只懂做製作，都是與音樂有關的，例如『澳門國際音樂節』，我做總監也做了十年，我很開心澳門政府能夠全力投資這個國際音樂節。我想，我現在已到這種年紀，再走下去仍會是在音樂路上。」

莫華倫實在太喜歡音樂，他的夢想是希望在十年內成立自己的一個歌劇院，也最希望能夠長駐在香港，不用飛來飛去。他說：「有自己的歌劇院，我一年可以做十部歌劇。我可以做監製，以及聘請一些世界一流的演唱家、導演、指揮等等，將香港歌劇院帶上世界級，這將是我最渴望見到的事。」

# 金培達

## 以藝術製造人生時刻



### 根源在香港

2006年，金培達憑電影《伊莎貝拉》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電影音樂銀熊獎，成為首位得到此項殊榮的香港人。金培達除了創作流行曲，亦為多部電影配樂，而且曾經為香港回歸十周年、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及2009年的香港東亞運動會創作主題曲。憑著對香港音樂界及電影界的貢獻，他於2008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然而，這些殊榮皆沒有使他飄飄然，他仍然以創作能夠打動人心的音樂為目標，堅信自己會一直朝著這個方向走下去。

金培達出生於小康之家，十四歲跟家人移居美國後，便開始半工讀的生活，體驗那裡多元化的生活模式。他在那裡工作了三年，包裝、取貨、寄貨、運貨、賣貨、打單、洗廁所、鋪地氈、掛招牌，都做過了。

在美國生活，提升了他對不同文化，生活環境和觀點看法的包容性，以及創作上的開放，他表示：「因為在美國時，我在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方面都採取開放的態度，這對我的創作有極大的幫助，令我不會單一性地去看事物，也不會受某地區的音樂文化影響，或者受到客人甚至自己的局限。其實，很多事情只視乎你能否因應人生變幻，而作出態度上的調整。」



金培達說：「有一點是一定要保持的，就是不要讓自己放棄對生活的感性，如果你是從事藝術的話，那就更加應該要堅持。」

雖然金培達喜歡美國文化，但他最終還是回到香港工作，他坦言：「我十四歲已經去到美國，也頗喜歡美國文化，然而我的根源始終都是在香港。雖然，兩地的文化我都有所吸收，但我相信回來香港對我的音樂發展較為適合。因為，如果繼續留在美國發展，即使我可以做出一些成就，但我永遠都會有個自己是一個外來者的感受。」

回到香港時，他先在廣告公司工作，初次嘗試配合畫面創作音樂。金培達表示：「第一次做廣告音樂很害怕，那時老板給我看他做的廣告，我覺得很神奇，三十秒中每個音符都像打磨得很精緻的鑽石。我真的有點害怕，所以第一次有機會做的時候，我整晚沒有回家。完成了數個工作之後，我突然覺得原來自己對畫面的反應尚算快，看見一些畫面，腦中便會出現可配合的音樂。」

近來，金培達經常穿梭內地各大城市，這陣子正在北京為一部音樂劇配樂。他說：「對我個人來說，北京的地方很大，它與香港最大的分別是若能在香港做出好成績，便會有很多人認識你。但來到內地，你會發覺突然之間範圍大了很多，做出好成績，也未必所有地方的人都會認得你。」

金培達指自己的適應力強，但在工作程序和風格上，亦有不習慣的地方：「在香港，我可以喜歡和誰合作，便和誰合作，班底可因為要達到不同效果而更換，可是在內地班底的概念性就較強。內地地方大，音樂發展的可能性也相對較多，在香港，一個表演常常會受場地、場數和金錢回報的局限，而未能順利進行。然而，若是在內地，即使仍是由香港人去策劃籌辦，但卻可以在全國各地進行巡迴演出，不受金錢回報的局限，整件事情的可能性就變得更大，事情也變得更好玩了。」

## 電影音樂人生

透過廣告配樂，他的工作漸漸伸展到電影配樂，他認為電影配樂是用音樂提煉出人物心情，並以《伊莎貝拉》為例去說明：「這部電影的鏡頭很好看，也有故事性。因為電影有一定的長度，所以看的時候，可留給觀眾不少思考空間。而這部電影最特別的地方，是講述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因為一個過去的秘密愈走愈親近。這部電影的魅力是『一切盡在不言中』，一個眼神便交代了兩人的關係，這就是整場戲的精神。」

2011年第五屆亞洲電影節，金培達獲最佳配樂提名，再次走上紅地氈，雖然是幕後製作人，但曝光多了，面對鏡頭他都能表現自如。回想第一次走紅地氈時，他並不享受，感到很習慣，他說過程中覺得自己好像在慢鏡頭下，走著一條走不完的路似的。」

相對於頒獎禮，他較喜歡出席首映禮，2006年《伊莎貝拉》入圍柏林電影節，他隨隊出席電影節，在現場那感受比領獎更震撼。金培達憶述：「觀眾真的很投入去看那電影，當有些觀眾對某鏡頭，或某個情節有反應的時候，我們是可以感覺到的，就像有一道氣存在。有時突然間靜了，就連呼吸聲也聽到，你就知道觀眾正投入地看。全片播完時，掌聲長達五分鐘。那一晚我感到很震撼，原來一套電影當受到觀眾的喜愛時，我們是可以感受到一種整體觀眾表達出來的喜愛。」

除了發揮空間大的劇情片外，為動作片配樂時金培達也非常認真，例如《臥虎藏龍》、《刺馬》、《投名狀》、《鎗王》等配樂都由他操刀，經驗甚為豐富，他說：「我喜歡變化多端，在三、四分鐘的一場戲中找出當中的起承轉合，這是一個挑戰。當遇一些較長

的動作場面，例如八分鐘，甚至十分鐘一場，這真的是要絞盡腦汁才可以做得好。」

要創作好配樂，除了多看電影外，他指更重要的是要用心感受人和事。無論看新聞，或聽別人說故事，金培達覺得都是要放鬆自己，去感受事件中的快樂與傷痛，讓事件來浸透自己。生活在現代的城市中，很多人都會感到很壓抑，感情的敏銳度會因而降低。

## 藝術是一種對人生時刻的記錄

金培達由大學修讀音樂開始，一直離不開音樂，近年他喜歡上另一種藝術創作——攝影，原因是：「照片比電影和音樂，帶給人更多聯想空間。從一個人的表情，去猜測這個人在想甚麼，拍攝的時候他的狀態是如何的，周圍正發生甚麼事。為何在這一瞬間，他有這樣的表情？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我都很有興趣。對於這個人背後故事的想像，便是照片產生的魅力。攝影是一種把時間凝固的藝術，捕捉時間，記錄時間，以一種流動性的時間觀去欣賞，因為時間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你可以花一個小時去看它，也可以只花五分鐘，甚至五秒鐘去看。」最近，他正忙於籌備一個攝影和音樂結合的展覽，希望用自己擅長的兩種方式，展示生活中所記錄的瞬間。

有人問他在工作上涉及作曲、電影監製、舞台劇配樂等崗位，現在又熱衷於攝影，究竟他會如何為自己定位呢？

金培達認真地回應：「從職業上看，音樂可以說是我人生的全部，但我並不喜歡留給人局限的形象，所以在自我介紹時，我總說自己是多元化音樂人，就是因為不想規限我的位置。我貪心，覺得樣樣都很好玩，不同風格的音樂我都想嘗試，我不想被人定型，只做某類型的音樂，我喜歡嘗試不同類型的音樂，希望自己有更多不同的面孔。我很喜歡一個英文字——moment（時刻），我覺得其實無論是音樂、電影、攝影，甚至所有的藝術，都是在製造人生的moment（時刻），將我們人生的一些細節時刻留在記憶中。我覺得我很幸運，可以經常嘗試新東西，我覺得很滿足，我希望我的藝術創作永遠都在進行中，我不想它有停止的一天。」

# 李雲迪

## 年輕的鋼琴大師



### 與香港結緣

現在持有香港身份證的李雲迪，1982年在重慶出生，現在已是一名蜚聲國際的年輕鋼琴家。李雲迪四歲開始學習彈鋼琴，得過大大小小的獎項。十七歲時，得到波蘭的蕭邦國際鋼琴比賽金獎，音樂成就更進一步，去到高峰。

這一首蕭邦作品——《編號 66：幻想即興曲》，令李雲迪知名度大增，也使他成為在香港無人不曉的鋼琴家。

李雲迪第一次與香港結緣應該是 1995 年，他憶述：「那時我的老師和媽媽，帶我去美國參加比賽，途中在香港停留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在朋友家裡暫住。那時的香港，飛機場仍在九龍城，印象中起飛時很緊張，因為很接近地面，我以前從沒見過這樣的狀況。」

1996 年，李雲迪再來香港比賽，認識了本港著名鋼琴家，現任香港演藝學院鍵盤樂系主任的郭嘉特，郭老師有不少得過獎的徒弟。1997 年，在深圳音樂學院，李雲迪也曾在他的教鞭下學習。郭嘉特對李雲迪評價很好：「音樂感好、技巧好的人很多，但李雲迪有一種獨特的氣質，彈出來的琴音很吸引人，音樂有感情、有訊息，感覺到他有話



李雲迪放棄內地戶籍，毅然成為香港居民。若要數他與香港的緣份，就要由他十三歲時說起。



要說，所以能夠吸引聽眾去聽。而且，他學東西速度很快，做事目標清晰，對音樂有追求，很刻苦耐勞。我記得有一天，他早上又練、下午又練，全日都在練。即使我已經聽得很累，但他仍然不停地練習，練至汗流浹背，我感覺他已經很累，但一句聲也沒哼，可想而知他是很吃得苦的。」

李雲迪自己也感到彈琴對他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說：「我確實很喜歡彈鋼琴，每次坐在鋼琴上都很興奮，有一種很自然的感覺，這種自然感是天生的，也是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我有些同學，一坐在鋼琴前就覺得很枯燥，而我就可以長時間坐著練琴，至少兩個小時不會離開座位。」

就是這樣，過了三個寒暑，直到蕭邦國際鋼琴比賽之前，郭老師一直指導李雲迪。天賦加上努力，令國家在 2000 年挑選他參與波蘭蕭邦國際鋼琴大賽。要勝出這場比賽一點也不容易，因為這是古典音樂界中最權威的比賽之一，每五年才舉辦一次，評分標準也非常嚴格。李雲迪得獎的前兩屆，都沒有人拿到金獎，而指間非凡的琴聲除了令他得到金獎，他也頓然成為全球焦點，從此踏上巡迴演奏生涯，香港更成為他第二個家。

## 香港印象

李雲迪經常來香港演出，不論是商場或是政府舉辦的一些活動，原來他自小對香港已有好感。例如根據 2006 年的一個訪問中，李雲迪說過：「我喜歡香港的食物，也喜歡這裡的生活方式，我覺得是較接近年輕人的那種感覺，非常有動力、有活力。」

因此，他最終在 2006 年決定透過優才計劃，申請成為「香港人」，這樣除了多了一張香港身份證，還多了一份責任感，李雲迪說：「這樣覺得跟香港的感覺及關係更接近了，也感到責任更大了。因為我希望在到香港後的這一至兩年中，與演藝學院合作，透過自己的一些能力去推動鋼琴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給香港在鋼琴方面有才能的小朋友一些協助，能夠幫助他們，與他們分享一些經驗，所以舉辦了大師課，每年都會有一到兩次的交流。」

所謂「玉不琢不成器」，即使有潛質，也需要訓練，只是香港對音樂方面的發展，往往不太重視。李雲迪希望可以成立一個自己的基金：「我可能會成立一個自己的基金，來支持有才能的、有音樂的的小朋友或學生，讓他們得到一個更好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可以支持社會上發生的各種災難。我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希望可以通過自己的能力，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香港地方雖小，但資訊流通，算得上是一個國際的著名大城市，這也是李雲迪喜愛的香港特色之一：「香港是很多人喜愛的一個城市，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買到你想買的、看到你想看的。香港的優勢便是選擇性非常多，生活相當便利。就以機場為例，因為我經常會到全世界去表演，非常熟悉各地的機場情況，而香港的機場在我的心目中是排第一的，因為它不僅方便，而且設施非常齊全。」

## 音樂願望

李雲迪曾多次來港宣傳他彈奏的蕭邦作品大碟。的確，自從贏得蕭邦國際鋼琴比賽之後，李雲迪幾乎與蕭邦這位「鋼琴詩人」畫上等號，李雲迪透露：「從九歲開始，我睡覺前就會聽蕭邦的音樂。當時是磁帶，還未有輻射光碟。聽蕭邦的前奏曲，天天晚上

從頭聽到尾，但總是還未聽完就睡著。」

蕭邦是生於古典音樂中浪漫派的時期，當時波蘭正處於戰亂，故在蕭邦的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對波蘭的那種愛國情懷，李雲迪說：「在蕭邦比賽中獲獎，再到現在不斷地去研究，去表演蕭邦的作品，這個體驗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蕭邦一生都在寫鋼琴作品，這是多麼的偉大，試想像一下每天都在做同一樣的事情，在同一個圈子裡，同一個領域中去發揮。我覺得這種專一的人，是非常值得崇拜敬仰的，因為他能夠把畢生精力全部投入其中。」

李雲迪說要彈一首出色的作品，必須要多了解它的歷史背景及民族性，但願中國也可以有這類出色的作品：「今年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繼承蕭邦，做一個愛國主義的音樂家，繼承他的思想及精神。作為一個中國人，還有一件事情是我非常期待去做的，就是希望能夠彈奏、演奏中國的一些經典的作品，像西方有貝多芬、莫札特，中國過去也有很多經典，代表著中國的發展經歷的音樂或鋼琴作品，譬如《黃河協奏曲》，以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品，我覺得是有需要讓大家再次欣賞到的。」





誰令葉劉淑儀改變「掃把頭」髮型？  
誰是首位華人大律師？  
李小龍如何創出截拳道？  
誰是第一個驅逐議員出議會廳的立法局主席？  
鮮魚行學校如何成功避過兩次「殺校令」？  
國學之寶饒宗頤為何不研究近代史？

亞洲電視新聞部的大型重頭節目「香港百人」，選取了超過一百位對香港有貢獻的人物，以一人一故事的紀錄片形式介紹他們不平凡的人生，現結集改編成書，當中有個人的奮鬥歷程，亦有對社會無私的奉獻。他們能夠於各界取得成功，憑的就是一種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刻苦耐勞、勤奮拚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

現今，整個社會結構已改變，對於什麼是「香港精神」，本書亦帶出另一種解釋，正如張敏儀所言：「現今年輕人的出路少了，一般人都缺乏機會，如果再用獅子山下精神，來叫人忍耐等待已不是一個公道的方式。今時今日的香港精神，是表示在忍耐的同時也要去爭取應得的合理社會環境。」

© 亞洲電視有限公司正式授權



ISBN 978-988-8148-19-6



9 789888 148196



聯合出版集團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98元

建議上架分類：香港專題 / 傳記

高錕  
光纖之父

周兆祥  
第一代環保先鋒

徐立之  
從基因研究學者到港大校長

詹志勇  
樹博士

梁紀昌  
兩次成功「救校」的校長

沈祖堯  
從「沙士英雄」到中大校長

任詠華  
「女性諾貝爾獎」得主

陳易希、李安琪  
香港之星

曾灶財  
九龍皇帝

Uncle Ray  
香港樂壇教父

鍾偉明  
播音皇帝

金庸  
武俠大師查大俠

顧嘉煇  
粵語流行曲貝多芬

李小龍  
唐山大兄

鄭國江  
拼合畫面的音樂裁縫

靳埭強  
香港設計界「一哥」